2025 年第 5 期

新闻界

5

2025

总第 386 期
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资助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ISSN 1007-2438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川观新闻
—看四川，观天下—

新闻界 宣

欢迎订阅

《新闻界》杂志

思想影响传播　媒介推动文明

240元/年（12期）

《新闻界》近年荣誉

-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 201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2016年、2017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8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9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20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21年、2022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22年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7-243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1-1046/G2
编辑部电话：(028)86968603　(028)86968876
发行部电话：(028)86969774
刊期：月刊（每月10日出版）
投稿渠道：www.ixinwenjie.com
电子邮箱：xinwenjie66@163.com

目 录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P4 构建同心圆：以共通视角推进宣传调适
文 | 吴飞 梁轩

前沿视点 • 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

P16 制造“亲密饥荒”：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异化与突围
文 | 张雪霖

P25 团结“亲密公众”：智能算法与数字生活秩序重建
文 | 田浩

新闻学研究

P35 域外智库涉“一带一路”文本的叙事时间焦点与情感表征
文 | 宣长春 侯雨飞

编委会主任 谭江琦
编委会副主任 徐文礼
总编辑 段吉平
副总编辑 杨国庆
执行副主编 李韵奕
编辑 孙尚如 徐秋染
编委 王炎龙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张志安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刘海龙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常 江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曹 晋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冯建三 /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
李天铎 / 昆山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讲座教授
李金铨 /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教授
Christian Huchs / 希腊雅典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Graham Murdock /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Jlises Mejias /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传播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栏目主持 常江：前沿视点 蒋晓丽：博士生新论
学术顾问 尹 鸿 李良荣 陈力丹 杜骏飞 郑保卫 童 兵 喻国明 蒋晓丽
前沿视点栏目支持 全媒体技术与传播认知实验室（四川日报社）

传播学研究

P50 赋权与负能的张力：再思深度媒介化语境下的数据殖民主义
——基于主体性视角
文 | 朱亚希　姚俊臣

传播与社会

P61 “在断裂中纠缠”：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考察
文 | 宋思茹　洪杰文　常静宜

P73 技术与文明：作为文明传播实践的华夏航海活动及其叙事逻辑
文 | 王婕　谢清果

博士生新论

P83 数字化生计：县域平台劳动者的生计转型及家庭化实践
文 | 辛昌泽

编辑出版　《新闻界》编辑部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
电话　（028）86968603　（028）86968876
投稿渠道　Http:// www.ixinwenjie.com
电子邮箱　xinwenjie66@163.com
邮编　610012
刊名题写　甘惜分
封面图片　C 视觉影像数据库 | 田相和
刊号　ISSN 1007-2438　CN 51-1046/G2
发地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阅　全国各邮局（所）
邮发代码　62-334
发行部电话　（028）86969774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广字 002 号

印刷　成都鑫达彩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25 年 5 月 10 日
定价　20 元 / 期
法律顾问　曾兴圣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028）85350935]

版权声明

凡本刊所刊登稿件，即视为作者授权本刊拥有网络传播、图书出版等再使用权，本刊有权决定是否以某种纸质出版或互联网出版形式进行二次出版。作者对此有异议者，须在来稿时特别注明；未经本刊允许，其他刊物或网络不得转载本刊作品；获本刊允许转载者，须注明转自《新闻界》。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5 期

构建同心圆：以共通视角推进宣传调适 1)

吴飞　梁轩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发掘中国宣传的特殊性，发展中国特色的宣传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文章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通过历史回溯、实践分析与理论建构，提出中国宣传的同心圆理论，旨在突破西方劝服宣传的理论桎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宣传理论，推动中国宣传调适。同心圆理论认为，当前中国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主流媒体为中介层、人民群众为基础层、国际社会为拓展层的同心圆宣传结构，并发展出以通促治的治理型宣传体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以真诚为前提，增强媒体调节功能，践行群众路线，以及培育非体制化宣传主体是宣传调适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共通；同心圆；以通促治；劝服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梁轩，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58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宣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受”关系的角色融合、传播“权势”的去中心化、线上线下的双层互动，使得政治宣传“一元主导”的“一”对“多”传播模式效果弱化，难以承担现代政治对政治传播的基本要求[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2]，为宣传调适提供了方向。目前，在业界实践方面，有学者依托 2024 年中国新闻业重大事件、典型案例和相关行业数据，发现智能技术正在重塑新闻生产流程，媒体也通过新闻产品适配平台逻辑、客户端整合、集团化运作推动内容供给侧改革等方式调适与平台的关系，新闻业也逐渐构建起基于流量和效果的评价体系[3]。政府管理方面，“网络舆论治理已被纳入新闻宣传的工作常规，并逐步走向专业化”，“新闻宣传工作和舆论治理积极合作，逐步趋近管理上的一体化”[4]。由此可见，系统性变革和一体化管理的宣传调适正在发生，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如何在理论层面深入理解中国宣传调适仍然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 [2023]49；编号：202306320173）。

题。“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新时代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也为我们在学理上研究和阐明新闻传播活动与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5]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同心圆，强调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6]。对于当前的宣传调适，同心圆这一隐喻也具有潜在的解释力。系统性变革聚焦“从分块运作各要素转向系统性盘活各功能，以实现对主流舆论阵地的有效占领，并以整合性框架把握主流媒体发展全貌”[7]，一体化管理旨在“为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规范”[8]，两者实质上是以党的领导为圆心，主流媒体为中介层，逐步向外延展至网络舆论，通过层级辐射和协同作用形成有机整体，构建同心圆。系统性变革侧重“强心”，使主流媒体真正成为具有中介功能的关键圈层，有能力将意识形态层层传导至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关注“画圆”，通过管理使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形成层层嵌套、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系统性变革和一体化管理的宣传调适过程，正是构建同心圆的过程。

因此，研究力图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发掘同心圆隐喻的理论潜力，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同心圆宣传理论，以期理解中国宣传并为宣传调适提供引导。具体而言，研究首先以西方宣传理论与实践为参照，阐明中国宣传注重共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得研究有必要基于自身的政治现实、文化资源和实践经验，发掘具有理论潜力的本土概念，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宣传理论。以此为起点，研究引入同心圆这一模型，梳理其当前的理论意涵，进而通过回溯中国宣传理念与实践，发现中国宣传的共通取向，深入阐释中国宣传的同心圆理论，并据此提出中国宣传调适的具体路径。

一、 中国宣传的独特性：以聚焦劝服的西方宣传为参照

回溯西方宣传理念和实践，是理解中国宣传独特性、发展中国宣传理论的前提。西方学者将宣传定义为“一种蓄意的、系统的尝试，旨在塑造感知、操纵认知和指引行动，从而获得能够达到宣传者期望的回应”[9]。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宣传是被特定机构赞助的信息，在和平时期被视为一种将大众态度同质化的方式，诉诸恐惧等情感而非理性来进行说服，以此单向操纵大众来服务于赞助者的根本利益[10]。

这种对宣传的理解，与西方早期的论坛式政体和宗教息息相关。古希腊的政治是典型的论坛式政体，政治权力自下而上赋予统治者，政治过程依赖演讲和修辞等手段来劝服大众[11]。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当时罗马天主教会面临维持其在非天主教国家控制地位的挑战，因此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成立了旨在向异教徒传播天主教教义的机构红衣主教委员会（commission of cardinals）。该机构于 1627 年发展为宣传学院（College of Propaganda），成为西方第一个宣传机构[12]。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宣传从起源上来说就是以劝服为核心的。从古希腊到宗教改革，宣传是在与他者斗争中获取胜利的手段。

与这种长期以来对宣传的理解相伴，如何劝服大众接受宣传者所希望传达的观点进而“操纵”大众成为西方宣传研究及实践的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通过广播等大众媒体展开前所未有的战争宣传，使得宣传在西方的合法性尽失，成为具有强烈负面色彩的词汇[13]。随后的二战推动了宣传研究的科学化，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霍夫兰（Carl Hovland）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如何通过宣传改变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帮助宣传者和管理者改善传播技巧，制造同意[14]。二战后，宣传“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依赖社会科学的指导”，新的总体宣传（total propaganda）正在形成[15]。目前，西方宣传进入一种避宣传之讳而行宣传之实的状态，劝服机制已深度嵌入社会系统，形成媒介化社会的隐性控制网络。

乔伊特（Jowett）与奥唐纳（O’Donnell）提出的宣传目的模型（图 1）揭示了西方宣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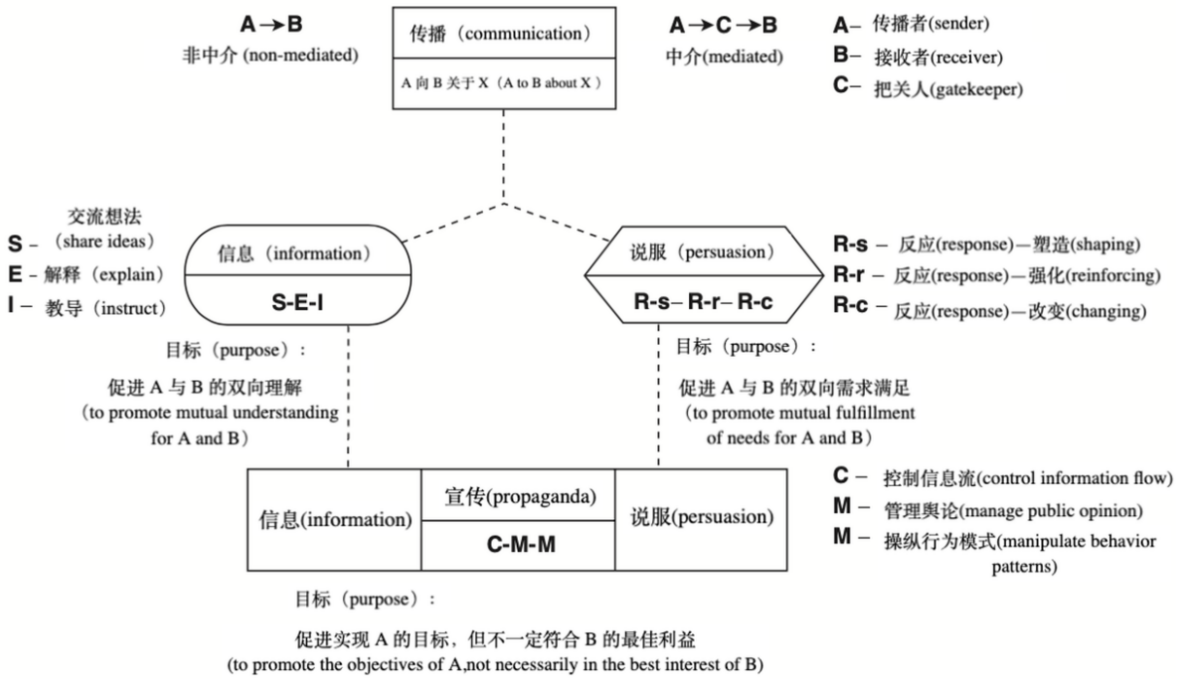

图 1　宣传目的模型（The Jowett/O’Donnell purpose model of propaganda）

理论张力：在信息沟通、劝服与宣传的三元关系中，宣传虽借助前两者的技术手段，却背离了互惠性传播的本质，沟通属性成为西方宣传的盲点[16]。这种价值断裂导致西方宣传陷入合法性困境——当劝服沦为单向度操控工具时，其与民主价值的根本矛盾便难以调和。拜登政府将宣传作为政治话语武器的实践[17][18]，恰印证了该概念在西方语境中成为西方所倡导的新闻自由和信息透明的对立面，呈现极端负面化趋势。

然而，“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我们要认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19]。对于西方所倡导的新闻自由本质的揭示，使我们有必要重思被西方视为新闻自由对立面的宣传。西方将宣传塑造为所谓新闻自由的对立面，使其完全聚焦于劝服，阉割其沟通属性，赋予其极端的负面色彩，实质上正是为了掩饰其所谓新闻自由背后所存在的意识形态操纵。这种以劝服为核心的理解和对宣传的污名化，正是拒斥沟通，以新闻自由之名行劝服之实的体现。

与西方将宣传异化为单向度劝服工具不同，中国宣传传统始终蕴含着“通”与“治”的双重基因。当西方在政坛政治与宗教改革中将宣传窄化为与他者斗争的武器时，中国古代的“宣”展现出独特的文明智慧——不以消除差异为旨归，而是通过德性教化建立“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当现代西方宣传深陷科学化劝服与民主价值撕裂的困境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发展出“群众路线”这一双向互动范式，使宣传成为执政者与民众开展交往的方式。这种植根于文明连续性的宣传思维，在数字时代进一步演化为关系调节的动态机制：通过多元化的互动形式调节党群关系，促进双向理解和需求满足。以“宣”促“通”、以“通”促“治”的理念，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更广泛的实践与拓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宣传不仅是为了传达信息或改变态度，而是成为一种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交往方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宣传哲学与实践转型。

也正因如此，宣传在中国语境下具有正当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可见当前宣传工作的受重视程度以及鲜明的正面色彩。中西宣传的显著差异，根源在于中国宣传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党性与人民性是相统一的，这使得中国宣传能够以共通为手段构建同心圆，以期实现相互理解和需求的相互满足。与西方宣传以劝服为核心的宣传不同，共通已成为中国宣传的重要取向，并由此形成了与西方宣传的根本区别：宣传以共通为手段构建同心圆，以期实现“治”的目标。因此，回溯当前同心圆这一概念的理论发展，深入发掘并理解长期存在于中国宣传传统与当代实践的共通维度和同心圆意象，正是突破西方宣传理论体系桎梏、构建中国宣传理论体系的可行路径。而如何通过共通的理念来构建同心圆，也成为当前宣传调适中的关键议题。

二、多元一体：作为交往模型的同心圆

同心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关涉到不同的研究领域。费正清提出同心圆理论以描述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汉字圈（The Sinic Zone）、内亚圈（The Inner Asian Zone）、外圈（The Outer Zone）为由内至外三个层次的同心圆。这一同心圆以农耕文明为圆心，距离圆心越远，交往越稀疏，朝贡体系是其他国家与中国交往的基本方式[20]；沟口雄三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为同心圆的连续体，对滋贺秀三的理论进行了拓展，提出其“在传统的中国民间社会并非只是被国家权力支配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的完整的秩序空间，民间社会和国家体制是两者共有的秩序观念的同心圆的连续——由这种连接的连续体来进行控制”，即“公”的普遍性原理将各圈层连接起来，使之成为连续体而非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分[21]；费孝通则用同心圆的波纹结构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即中国人以自己为圆心，推己及人、由亲到疏构想社会关系[22]。

如果以交往的视角重新思考这些研究，可以发现费正清所论述的是中国以农耕文明为核心，与周边国家及游牧民族交往的方式，沟口雄三表述的是国家体制与民间社会的交往方式，费孝通所论述的则是中国人推己及人、亲疏有别的社会交往方式。而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使用了同心圆这一意象来描述交往方式的形态，都涉及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同心圆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是对中国交往形态的准确描述，是理解中国主体间沟通的重要模型。

同心圆作为一个隐喻，从统一战线领域的论述逐渐拓展到宣传领域。从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点明中国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形成统一战线的规律，到197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将统一战线定位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再到2011年提出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同心圆的表述逐渐成型[23]。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24]，论述了同心圆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具体含义；之后提出“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25]，进一步将同心圆由统一战线领域拓展到宣传领域；2021年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通过对话、包容画出同心圆，从而将同心圆理论拓展到国际领域：“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26]作为隐喻，这个同心圆的圆心是中国共产党，同心圆的内圈是中国国内的统战对象，致力于民族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圆的外圈是全球进步力量，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27]。无论是统战领域、宣传领域还是国际领域，作为隐喻的同心圆，实质上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他者进行交往的理想模型。

基于作为学术概念和作为隐喻的同心圆，可以发现同心圆模型的关键在于：其一，同心圆是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交往模型，在国家、政党、个人等不同交往层次都有所体现；其二，同心圆的圆心具有主导地位，能够发挥主动性将自身的观念和诉求向外层层推进；其三，越是靠近圆心的圈层，与圆心的同质性越高，表现为同一性，而越是远离圆心的圈层，与圆心的异质性越高，呈现出多样性；其四，尽管存在不同圈层，但同心圆结构遵循相似的构成逻辑（交往逻辑），这使得不同圈层之间能够互相沟通，并且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其五，同心圆的形态实质上是能够包容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共同体，多元一体是同心圆模型的显著特征。

那么，对于宣传这一特定领域，作为交往模型的同心圆具有哪些特质？基于同心圆发展而来的宣传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什么？依据同心圆宣传理论，宣传又应当如何调适？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对中国宣传理念与实践的回溯。

三、以通促治：同心圆宣传理论的核心理念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28]“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为本研究发展同心圆宣传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回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宣传观念与实践，论证了中国宣传以通促治的理论核心，旨在为宣传调适的深入探讨奠定基础，构建中国宣传理论体系。

（一）宣德教化：中国古代的宣传传统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9]因此，要想理解当前中国的宣传调适，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宣”这一传统的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宣传观念起源于政治。据潘祥辉考证，中国古代的“宣”发端于王权政治，是一种由王室垄断，自上而下、单向传播的政治传播活动[30]。而中国最早强调统治者需要控制和规范语言以确保其权威的思想，当属孔子的“正名”[31]。作为政治家，孔子意识到“名”作为明确是非、建立标准之手段对社会政治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32]。而统治者之所以有“宣”的权力，是因为天子以君为“名”，具有君的品德和行为之“实”，名实统一。天子有“德”成为其可以“宣”的前提条件。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的“宣”以“施文德行教化”为核心，通过显示王权的礼德、威仪或恩泽，来实现对子民或边民的“教化”，达到“以德服人”的效果，而并不采用劝服、传递信息或灌输某种思想观点的方法[33]。这种不同于西方宣传的实践受到儒家名实统一思想的影响，也反映出道家主张通过统治者的实际行动而非空洞说教来感化百姓，“行不言之教”的哲学智慧。

更根本的是，发端于王权政治制度化传播实践的“宣”，其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以“正名”为核心的符号系统维系“天下”体系。“天下”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观念。据赵汀阳所述，“天下”的其中一个含义即“民心”，所谓得天下，并不是指获得了所有土地，而是获得大多数人的民心[34]。天子的德行和作为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才能够得民心。而在世界观方面，“天下”所认定的世界是一个概念上已经完成的世界，因此更注重维持良好的存在状态，“治/乱”模式可以判断一种存在状态是否良好。而共存是存在的先决条件，足够多样的存在方式是生活意义的基础，只有多样的和谐这一模式才能够同时满足世界的完整性和生命力的双重要求。在这种思维方式下，重心就不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上，而是在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和社会和谐的最大化上，因此总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冲突和规避冒险性发展作为基本原则[35]。

在“天下”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宣”的目标在于获得民心、进行教化、建立秩序，维

持一种多元和谐共存的“治”的存在状态。其深层逻辑在于以“宣”促“通”，以“通”促“治”，以“治”促“统”。“一个社会机体只有沟通与交流的机制和渠道‘通’了，才能呈现出和谐的、和平的景象”[36]，即所谓政通人和。当“宣德教化”的单向传播网络与“采诗观风”的民意反馈机制形成循环，“通”便转化为“治”的实践效能。因此，“宣”的目标达成有赖于“通”，“通”是实现“治”的途径。而“‘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37]，则成为多元和谐之“治”的自然结果。反言之，正是因为存在明确的、强而有力的中心，并且中心通过“宣”进行教化向外拓展，才能够产生“向心力”，形成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天下体系，最终使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因此，中国古代的宣传体系与天下体系实际上是同构的，均为同心圆结构，两者互为表里，共同型塑着政治秩序。

中国古代“以德服人”的宣传方法和“多元共存”的宣传目标，反映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38]而“宣—通—治—统”的底层逻辑，则蕴含着墨家的“尚同”思想，即主张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协调一致，形成政治合作关系。正是得益于百家争鸣的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的宣传理念得以实现多元与一体的平衡，在尊重多元差异的基础上仍追求以“宣”促“统”，形成了迥异于西方修辞劝服传统的治理型宣传范式，初步构建了中国宣传的同心圆模型。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存在“名实统一”的约束和“采诗观风”的民意反馈机制，但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宣”仍是不平等的，是以王权为中心、上位者对下位者进行教化的单向宣传，百姓的意见和诉求无法通过“宣”的方式为君主所知，处在无法言说的状态，因此也难以实现真正的“通”。此外，“宣”高度依赖统治者个人的德行，一旦统治者德不配位，“宣”就失去了法理基础，宣传的同心圆也就随着圆心的弱化而瓦解，社会也会随之由“治”到“乱”，这也造成中国封建王朝长期陷入治乱兴衰的循环之中。

（二）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

“中国现代宣传话语的产生，与中国政治文化精英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目标，不断唤醒民众的过程息息相关。”[39]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早期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将宣传与运动和政治联结在一起，强调宣传的组织和动员功能[40]。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提法影响了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版，最终形成党报理论。[41]党报理论所强调的党性原则，意味着党报成为党的喉舌和进行斗争的武器，“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仿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42]，“应当在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43]。由此可见，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使得现代中国的宣传超越了古代中国以德化人的传统，与中国古代墨家“尚同”思想和“宣”的统一性追求汇流，并以苏联为媒融入了西方劝服的意涵，以期“组织起来”形成共同的态度和行动，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通”的观念失去了影响。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阐释，清晰反映了党的宣传理念中“通”的维度：“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4]。据李海波的研究，群众路线在宣传实践上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报社方面，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是为群众代言”，报纸要发表群众的意见“替百姓言传”，通过这种方式促进问题解决；二是“群众方面，鼓励和帮助群众自己发言”，打破知识

分子孤立办报的幻想，组织群众通讯员，发动群众写稿，并“大力推动夜校、冬学、识字组等社会教育”；三是“管理方面，实行首长负责制”，“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负责同志，对辖区的新闻通讯工作直接负责”；四是“报道内容和形式贴近群众”[45]。

由此可见，与中国古代的宣传观念相比，党的宣传理念将“通”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具体而言，在群众路线指导下的宣传过程中，人民不再无法言说，而是由新闻工作者通过报纸等媒介言说；组织群众通讯员、发动群众写稿、推进社会教育等举措，则旨在提高人民自己言说的能力。理想状态下，宣传内容实际上是人民想要言说的内容。通过群众路线，执政者与群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得以在最大程度上发生，以此促成两者之间持续的相互理解，实现宣传的“通”。这从根本上反转了中国古代“宣”的权力关系，即宣传不再是掌权者对子民进行教化，而是人民通过宣传进行表达，从而将想法凝聚为共识，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的合法性，也不再是君主“正名”，德行高于民众，而是党能够让民众言说，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在这种宣传观念下，人民成为宣传的主体，宣传则成为党了解人民所思所想、凝聚共识的重要工具，党群一体，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可以说，共通成为这一时期宣传理念的显著特征，党代表人民利益构成宣传的合法性来源，“宣”与“通”呈现相互促进关系，并且共同发挥凝聚力量、救亡图存的作用。就宣传模型而言，同心圆的圈层间界限随着宣传的制度化由模糊转为清晰，以党为圆心，主流媒体为中介层，民众为基础层，层层拓展的结构逐渐形成。同心圆整体由相对静态转为相对动态，圈层间传播由核心向边缘的单向扩散转为相互渗透。特别是这一时期，陕北民歌[46]、木版画[47]等民间传播媒介被宣传吸纳，呈现中介层吸纳基础层传播手段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宣传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只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其根源来自“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史观。在此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强调建立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注重通过组织和宣传手段，动员群众参与到政治和社会事务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因此，与古代宣传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具有动员功能，形成了“宣传—共通—行动—共通—宣传”的循环，以此维持政策的科学性与人民性，以期最终实现一种灵敏、动态的“治”的状态。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受限于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报纸单向传播的媒介属性以及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宣传在实践层面仍难以真正达到共通的理想状态。

尽管如此，宣传动员功能的增加，使同心圆圈层间的渗透效率和传播效果大幅提升，从而为中国重塑向心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推动的土地改革、工业化建设、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重大举措，都得益于宣传的同心圆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宣传重心向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转移，其动员机制也由显性组织动员向现代化价值引导演进，但仍保持了宣传的同心圆结构和以通促治的基本特征。

（三）关系调节：因应数字时代的宣传实践

“每一种大众媒体——印刷品、电影、广播，然后是电视——都为新的宣传技术贡献了自己的特性。”[48]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高选择的媒介环境使人民群众回避宣传的难度大大降低，宣传面临难以触达人民群众的危机，从而可能丧失构建同心圆的前提条件。面对这样的变化，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49]。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回应数字时代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情绪和品味，主流媒体正在重塑宣传，软宣传（soft propaganda）在中国迎来复兴[50]。

软宣传的实践使同心圆延续了中介层吸纳基础层有利因素进行弹性再造的传统，并且得到进一步拓展。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推动了宣传的软化，如《人民日报》推出原创动画《新千里江山图》以庆祝党的二十大召开，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而地方政府的宣传账号则通过生产非宣传的软性内容等方式，提升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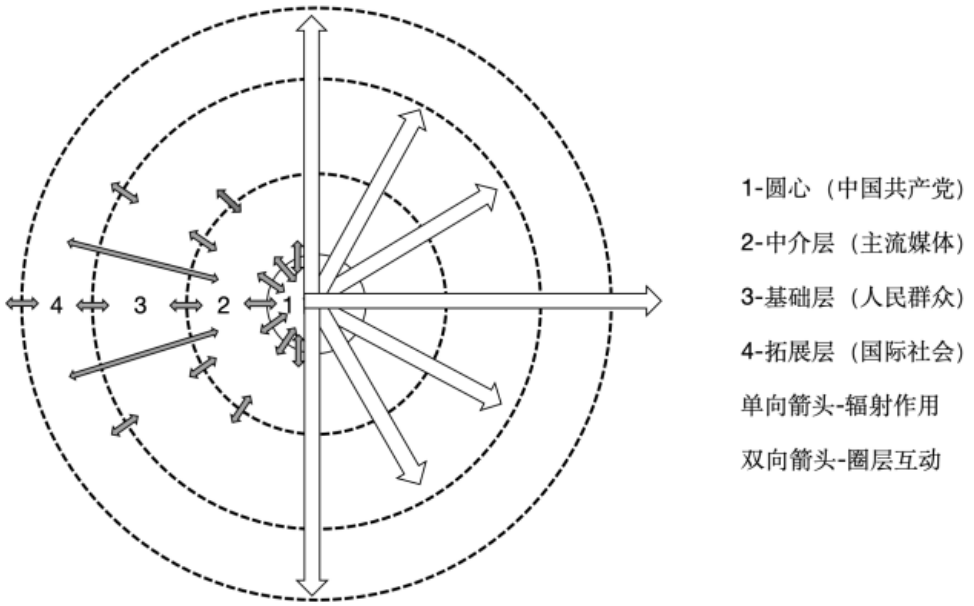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时代宣传的同心圆模型

见性[51]。从本质上来说，软宣传延续了弹性再造的宣传传统。但是，这也并非对宣传传统的简单复制。有学者基于 2009 至 2023 年全国 94 家主流媒体与政务新媒体逾 702 万条微博数据，对中国的软宣传现象进行了全景式分析，发现在叙事话语方面，主流媒体与政务新媒体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交媒体轻松活泼的话语风格。网络亚文化的调用，也使得宣传由“一体化”转向“混合型”，从而在青年网民政治参与、身份认同与网络动员等方面发挥作用[52]。因此，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数字时代圈层间的边界更具弹性，中介层对基础层的吸纳也由传播媒介拓展至语态、亚文化等多个维度。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时代的“流量锦标赛”[53]也可能导致宣传被流量逻辑所裹挟，出现过度娱乐化和“标题党”现象，降低宣传内容的质量引发人民群众反感，反而起到阻塞党群共通，激化社会矛盾的反效果。

调节党群关系的新宣传（new propaganda）也成为数字时代宣传的重要特征。相较传统以信息传达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这一新的宣传实践尝试在执政者与民众之间建立更具沟通性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部分宣传实践以高知群体为重点受众，通过生产深度内容，一方面回应社会关切，揭示地方干部的不当行为与政策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偏差，另一方面则明确表达对中央政策方向的支持，衔接民众诉求与国家发展战略[54]。这种调节功能展现了宣传同心圆的两个重要变化：其一，互联网作为传播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民众不再完全依赖于媒体替民言说，而是可以直接言说。舆论不仅仅是依赖报纸等新闻媒体引导和制造的产品，也是自发形成、需要回应且难以完全掌控的涌现现象，同心圆的外围层也随之产生一定的自主性，甚至出现向内的反作用力量。其二，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数字时代主流媒体作为同心圆的中介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能动性，成为党（圆心）群（基础层）关系的调节者。因此，以通促治的宣传传统在数字时代仍然发挥作用。

另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国际友人为核心的拓展层日渐清晰，成为宣传同心圆不可或缺的外围圈层。促进相互理解是拓展层的首要目标，这意味着国际宣传的宣传者是多元的，甚至任何愿意沟通、了解真相的传播者都可以是宣传者。如中国对部分国家开放 144 小时过境免签以来，大量西方旅游视频博主（Youtuber）进入中国，拍摄中国的真实情况在

社交媒体进行分享，并讲述自己在中国的真实感受与西方主流媒体所描绘的中国大相径庭，进而让世界人民越来越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便是构建同心圆的生动体现。而这种依赖外国友人亲身体验的宣传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古代“以德服人”和“行不言之教”的宣传智慧。值得注意的是，拓展层与基础层并非阻断封闭，而是互联互通的。如之前所提到的外网“China travel”视频被国内博主搬运到 B 站等平台，引发中国民众“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的讨论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自豪感，再如“TikTok 难民”（TikTok Refugee）迁移小红书所引发的“中美对账”，都是两者共通的体现。此外，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也在持续发挥着联通国际社会的作用，促进两者的圈层互动。

（四）以通促治的同心圆理论

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宣”的理念，党的宣传传统还是数字时代的宣传实践，都展现了中国宣传不断丰富的同心圆结构。党的圆心地位源于人民史观，这使得党高度重视圆心与基础层的紧密联系，通过中介层吸纳基础层传播媒介等各种方式，尽可能扩大圈层之间的共通，群众路线即明证，同心圆整体也由中国古代的相对静态转变为相对动态；数字时代，同心圆结构在延续党宣传传统的基础上，也产生了新变化：基础层依托互联网舆论形成反作用力量，中介层的调节功能随之产生，拓展层也逐渐清晰，与基础层互动日益密切。

行文至此，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反思西方宣传，引入同心圆这一理论概念，回溯中国宣传传统与当下，研究对中国宣传对同心圆理论的传承及发展进行了深入阐释，并提出了数字时代宣传的同心圆基本结构。简言之，中国宣传的同心圆理论根植于“天下体系”的文明基因与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融合，是以“通”为媒介、“治”为旨归的治理型宣传范式，其核心理念是以通促治。如图 2 所示，宣传的同心圆模型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圆心，形成以主流媒体为中介层、人民群众为基础层、国际社会为拓展层的辐射式宣传体系。越靠近圆心的圈层，所受到的辐射作用越强（表现为单向箭头的数量），与圆心越同质。同时，宣传的同心圆模型还具有动态特征，圈层间持续互动，相互影响。越靠近圆心，圈层之间的互动频率越高，共通程度越高（表现为双向箭头的数量）。这一模型的核心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化的传播网络，与多元社会主体建立双向互动关系，以“通”的交往实践化解差异张力，将社会共识凝聚转化为治理效能，最终实现良政善治。其核心特征是多元一体，即在坚持圆心权威性的前提下，通过层级化传播网络实现差异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平衡。

以通促治的同心圆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同心圆理论超越劝服理论的工具理性局限，将宣传重构为治理系统的有机组成。不同于西方“信息操纵—大众接受”的线性模式，中国宣传强调主体间的关系建构，以期通过持续互动形成“传播即治理”的共生形态。另一方面，同心圆理论构建起“执政党—主流媒体—民众”的互动框架，主流媒体作为宣传者既非单纯的传声筒，也非独立的第四权力，而是作为“体制性调节者”连接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通过意义协商消解治理张力。这种角色定位突破了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窠臼。

四、如何共通：同心圆宣传理论的实践进路

如前所述，同心圆理论的核心理念是以通促治。然而，共通并非一种自然状态，数字社会的发展也不必然导向共通。在实践层面如何促进共通、推进宣传调适，是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基于同心圆理论，研究提出以下宣传调适的具体路径：

第一，宣传调适应以真诚为前提，彰显圆心权威。宣传并不意味着是虚假和不真诚的，真诚地说出真实的主张也是宣传[55]，而这里的真实指涉的是总体真实。“搞清楚是个别真实还是总体真实，不仅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56]只有宣传实践与群众的生活世界贯通，构建“总体真实－个体感知”的复调真实观，圆心才能

够真正通过中介层辐射基础层，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宣传从执政者的视角看到国家的真实状况，形成超越个体经验但又不与其产生极大落差的“共同”感知，重建对宣传的信任，达成民众对执政者的理解与包容。这对于增强圆心权威、维护国家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儒家“正名”思想的延续。

第二，宣传调适应增强媒体的调节功能，赋能中介层。主流媒体作为“体制性调节者”，需要在话语层面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具象化、情感化的生活叙事，连接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在技术层面延续中介层吸纳基础层传播媒介的宣传传统，通过算法推荐等技术适配Z世代的信息接收习惯，实现“软性抵达”；在内容层面既保障政治主张的权威传导，弘扬主流价值，又敢于回应舆情关切，将网络舆情转化为政策调整的治理资源，在争议性议题中培育理性共识。简言之，同心圆的中介层应成为意识形态安全阀与社会情绪减压器的复合体，党群关系的“夹心层”承担价值引领与关系调节双重功能，通过系统性变革实现“硬核软化”与“柔性调节”的统一。

第三，宣传调适应践行群众路线，凝聚基础层向心力。强化一体化管理，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舆情治理体系，通过人工智能工具将民间舆论纳入制度化表达渠道，防止“基础层脱嵌”。但同时，宣传也应在党性原则框架内建立争议性议题的缓冲带机制。通过设置可控争议阈值，宣传可保留一定的弹性互动空间，采取参与式协商机制实现社会共识的梯度化建构，并通过中介层赋予其可见性，促进基础层向中介层的反向渗透，并对合理诉求进行制度化转化，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大众程序”，继而“在数字交往中形成一个新的融合性的‘一’，画出最大的同心圆”[57]。

第四，宣传调适应培育共享意义空间，壮大拓展层。拓展层的核心动能在于培育非体制化的宣传主体，推动宣传在“组织化动员”的基础上扩展“结构性联结”。在数字传播语境下，以短期访华者、外籍在华工作者、国际留学生、海外华人等为代表的跨文化群体，虽未纳入传统宣传系统，却具备自传播、自组织的潜力，构成拓展层中新的连接节点。宣传调适应着眼于构建基于身份认同、技术协同与文化共鸣的跨文化传播机制，使这类主体能够自愿参与共享意义建构，并在中介层的支撑下实现与基础层的互动联通。通过强化结构开放性与叙事包容性，拓展层可逐步转化为宣传系统的柔性延伸，实现从“他者”到“我们”的转变，推动同心圆结构的外延式生长。

综上所述，研究基于同心圆理论，提出了宣传调适的四大实践路径，其内在逻辑关系可概括为：以圆心权威为核心动力，以中介层调节为中枢机制，以基础层参与为有力支撑，以拓展层延伸为战略突破，构成有机统一的宣传实践系统。具体而言，圆心权威为系统运行提供初始动能，使其他圈层能够因受到圆心吸引而产生向心力，形成同心圆的基本结构；中介层调节实现双向的理念传导与压力缓冲，一方面通过促进圈层互动使同心圆处于动态而非静态，另一方面也通过发挥减压器功能增强同心圆的韧性，达到“动而不破”的效果；基础层参与为系统提供稳定的基础和活力的来源；拓展层延伸则推动系统边界的有序扩展。

进一步而言，宣传调适不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更是理念与制度的转向。数字时代的宣传实践需要超越单向灌输模式，转向嵌入协商与互动的多向交流。这意味着宣传应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空间，推动主流媒体走出自我封闭的回路，真正倾听社会的声音、回应现实的关切。宣传调适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能够容纳多样声音、包容理性分歧的协商性传播结构，在差异与摩擦中推动共识的渐进生成。从同心圆结构视角出发，宣传调适的目标并非以“圆心”覆盖“圆周”，而是构建一个具有开放半径、协商边界的共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民群众不仅是被动接受者，更是积极参与者和意义共建者。宣传不应排斥冲突与张力，而应在尊重差异中寻找最大共识的可能性，在人民群众真实关切的基础上推动政治主张的有效抵达。

这不仅契合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也延续了中国政治传统中“民惟邦本”的深层逻辑。

从根本上而言，同心圆宣传理论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和宣传实践促进共通，形成圈层之间的普遍联结，“而普遍联结的终极意义，则是人类、乃至生命的团结（solidarity）”[5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之治。这也使得宣传成为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社会，保持团结与稳定的重要力量。然而，以共通视角推进宣传调适是一项需要执政者投入大量资源推进的有益工作，也是需要多元行动者共同努力的社会工程。那么，从实践角度来说，宣传的共通转型，促进者可能会是哪些主体？动机是什么？作为一种依赖数字平台的社会交往方式，怎样的平台属性和算法设置更有利于实现宣传的共通转型？从研究角度而言，衡量宣传调适的量化指标有哪些？宣传调适可能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共通的程度是否越高越好？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责任编辑：孙尚如）

参考文献

[1] 荆学民，于淑婧．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秩序及中国调适[J]. 政治学研究，2020(2): 14-26+124-125.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 新华网，(2024-07-21)[2024-12-2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lsRedirectHit=11454859.

[3] 张志安，丁超逸．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的新闻生产与融合实践——2024 年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J]. 新闻界，2025(1):51-62.

[4] 李彪，曹时雨．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价值坐标、关键环节与机制保障[J]. 新闻界，2024(12):4-14+61.

[5] 涂凌波，杨靖毅．(2024). 文化的力量：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文化实践与文化精神[J]. 新闻界，2024(8):4-14+33.

[6]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求是，2019(6): 4-8.

[7] 黄楚新，陈智睿．多元考量与多维适应：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J]. 中国出版，2025(1):29-34.

[8] 杨洸．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时代价值、理论基础与规范治理[J]. 新闻界，2024(12):15-26.

[9] Jowett G S,O’Donnell V. *Propaganda & Persuasion*[M]. Los Angeles: Sage,2018:7.

[10] Baines P, O’Shaughnessy N, Snow 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Propaganda[M].Los Angeles: Sage,2019:XXV.

[11]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 古代的王权与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M]. 马百亮，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5-38. 转引自潘祥辉．宣之于众：汉语“宣”字的传播思想史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4): 76-94+127-128.

[12] Cull N J, Culbert D H,Welch D. *Propaganda and Mass Persuasion: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1500 to the Present*[M],Santa Barbara, CA:ABC-CLIO,2003:xvi.

[13] 叶俊．宣传的概念：多维语境下的历史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8): 107-116.

[14] 巴吾尔江丹娜，苏婧．重返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宣传远离传播学的原因和反思[J]. 国际新闻界，2023(7):114-136.

[15]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302-323.

[16] Jowett G S, V O’Donnell. *Propaganda & Persuasion*[M]. Los Angeles: Sage, 2018:33-50.

[17]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EB/OL].(2022-02-24)[2024-12-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russias-unprovoked-and-unjustified-attack-on-ukraine/

[18]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s Annual Days of Remembrance Ceremony[EB/OL].(2024-05-07)[2024-12-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05/07/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u-s-holocaust-memorial-museums-annual-days-of-remembrance-ceremony/

[19]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1-189.

[20] 孙卫国．从“同心圆”论到“两极模式”论——美国中国学界有关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学说[J]. 学术月刊，2013(8):159-170.

[21] 沟口雄三．“公”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区别[J]. 船山学刊，1999(2):48-54.

[22] 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3] 叶子鹏，徐皇冠．使命与复构：同心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场——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维度视角[J]. 理论导刊，2019(9):59-65.

[2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04.

[25]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73.

[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15.

[27] 叶子鹏，徐皇冠．使命与复构：同心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场——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维度视角[J]. 理论导刊，2019(9):59-65.

[2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2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30] 潘祥辉．宣之于众：汉语“宣”字的传播思想史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4): 76-94+127-128.

[31]Cull N J, Culbert D H,Welch D. *Propaganda and*

Mass Persuasion: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1500 to the Present[M],Santa Barbara, CA:ABC−CLIO,2003:73.
[32] 曹峰 . 孔子“正名”新考 [J]. 文史哲 , 2009(2): 61−69.
[33] 潘祥辉 . 宣之于众 : 汉语“宣”字的传播思想史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18(4): 76−94+127−128.
[34] 赵汀阳 .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1:28.
[35] 赵汀阳 .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1:50−53.
[36] 吴飞 , 傅正科 . “数字共通” : 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23(6): 22−35+126−127.
[37] 习近平 .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 2023(17):4−11.
[38] 习近平 .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 2023(17):4−11.
[39] 刘海龙 . 汉语中“宣传”概念的起源与意义变迁 [J]. 国际新闻界 , 2011(11): 103−107.
[40] 马凌 , 刘胜男 .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观念、宣传组织与宣传方法 [J]. 新闻大学 , 2021(6): 31−47+122−123.
[41] 刘继忠 .“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 [J]. 国际新闻界 , 2020(10): 99−120.
[42] 解放日报社论 . 党与党报 .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1980:55.
[43] 王敬 . 延安《解放日报》史 [M].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1998:40.
[44] 毛泽东 .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899.
[45] 李海波 . 党报、列宁主义政党与群众政治参与——延安新闻业群众路线的运作机理分析 [J]. 国际新闻界 , 2018(3): 19−39.
[46] 张姣 , 曹轲 . 从民众到集体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陕北民歌为中心的有声动员 [J]. 新闻记者 ,2024(7):72−81.
[47] 陈佳怡 . 可见的“新生活”：延安木刻版画的视觉宣传机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24,31(7):5−18.
[48] Jowett G S,O’Donnell V. *Propaganda & Persuasion*[M]. Los Angeles: Sage,2018:105.
[49] 习近平 .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339.
[50] Zou S. Restyling propaganda: Popularized party press and the making of soft propaganda in China[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21,26(1):201−217.
[51] Lu Y,Pan J.Capturing Click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Clickbait to Compete for Visibility[J].*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21,38(1－2):23−54.
[52] 涂凌波 . 从“一体化”宣传到“混合型”传播——以中国共青团网络政治传播活动变迁为中心的讨论 [J]. 新闻大学 , 2019(11):38−54+122−123.
[53] 张开平 , 孟天广 , 黄种滨 .“软宣传”的兴起、特征与效果——基于 2009−2023 年主流媒体与政务新媒体的大数据分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23,30(12):86−03.
[54] 李艳红 , 龙强 . 新媒体语境下党媒的传播调适与“文化领导权”重建：对《人民日报》微博的研究（2012−2014）[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7(39):157−187
[55] Stanley, J.How propaganda works.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42.
[56] 习近平 .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181−189.
[57] 吴飞 , 傅正科 .“数字共通” : 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23(6): 22−35+126−127.
[58] 杜骏飞 . 数字交往的观念 [J]. 传播与社会学刊 , 2024(9):179−210.

Constructing a Concentric Circle Model: Advancing Propaganda Adaptation through a Perspective of Commonality

Wu Fei, Liang Xuan

Abstract: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offers cruci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exploring the particularities of Chinese propaganda and developing a propaganda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rawing upon this ideolog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historical review, pract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o propose the concentric circle model of Chinese propaganda. It aims to break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constraints of Western persuasion-based propaganda and establish a local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facilitates the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ropaganda practices. The concentric circle model conceptualizes a multi-layered propaganda structure,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the core, mainstream media as an intermediary layer, the general public as the foundational lay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n outer extension. Within this structure, a governance-oriented propaganda system has emerged,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for governance" (yi tong cu zhi).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sincerity should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propaganda adaptation, which can be realized by enhancing the mediating capacity of the media, revitalizing the mass line, and fostering non-institutionalized propaganda actors.

Key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commonality; concentric circle model; communication for Governance; persuasion

Authors: Wu Fe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Liang Xuan,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制造“亲密饥荒”：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异化与突围 1)

张雪霖

摘要 当人类文明迈入数字时代的深水区，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正在亲密关系领域悄然展开。亲密关系的本质内涵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已从“具身性共在”的传统人际纽带，演变为技术中介的数字亲密系统，其核心特征发生了三重裂变和三大价值坐标位移，这源于技术可供性、个体化需求与资本逻辑的共谋。而制造“亲密饥荒”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情感悖论，表现为关系过载与情感赤字、深度羁绊消解和存在性焦虑，形成原因包括算法中介的信任危机、液态现代性的关系结构，以及认知框架的虚实混淆，更为深层的逻辑恰是现代性困境的数字镜像。情感资本主义的全球席卷促使情感商品化和标准化，带来情感虚假满足、效率主义异化和隐性剥削等问题，造成情感异化、社会不平等和伦理秩序的消解。而中国的在地化经验演化出一种“新家庭主义”，这为对抗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和理解转型期中国式亲密关系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数字时代；亲密关系；亲密饥荒；情感资本主义；新家庭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张雪霖，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一、引言

当人类文明迈入数字时代的深水区，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正在亲密关系领域悄然展开。从各类婚恋交友平台的兴起带来的“缘分媒介化”[1]和“中介化爱情”[2]，到乙女游戏中带来的自我恋爱和新型爱情叙事[3]；从“cos 委托”模式下的亲密关系乌托邦追求[4]，到虚拟偶像和 AI 伴侣构建的情系云端和人机依恋关系，都可见数字技术已突破工具属性，成为重构人类最私密情感联结的元代码。这场革命不仅改写着人际交往的表层规则，更触及文明存在的本质命题：当算法权力深度介入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传统伦理框架是否还能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在亲密关系的具身性与数字性交融的临界点上，人类如何守护情感的真实性？

学界关于亲密关系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广义上讲，亲密关系一般包含亲情、爱情和友情等领域；二是从狭义上讲，亲密关系主要局限在恋人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治理视阈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23BXW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建设研究”（22JJD860013）。

或夫妻之间。不同于西方的约会文化背景，中国在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润下，理解中国式亲密关系除了关于情侣/夫妻代内关系的分析外，还离不开对家庭代际关系维度的分析。因此，本文讨论的亲密关系范围主要界定为恋爱、婚姻和家庭关系领域。

回望人类文明史，从未有任何技术革命如数字技术这般，以如此暴烈的姿态解构并重塑着社会关系的底层逻辑。从农业文明的血缘共同体到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化，从现代性浪潮中的情感个人主义到后现代社会的液态之爱，亲密关系的形态变迁始终映射着技术文明与人类情感的深刻互动。如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浪漫之爱”在18世纪之后开始成形，安东尼·吉登斯用“纯粹关系”概括亲密关系的现代化重构，揭示了亲密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趋势[5]。而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以“液态之爱”形容后工业社会脆弱人际关系上的流动爱情[6]。不管是“浪漫之爱”还是“液态之爱”，身体上的共同在场仍然是情侣们获得情动深度的基础。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亲密关系的虚拟共同在场提供了可能。当前这场数字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延伸或交往效率的提升，而是通过算法推荐、虚拟在场、数据画像等技术机制，直接介入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关系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拜厄姆揭示了数字媒介技术塑造了新型人际关系，形成一种“新自我，新关系”[7]。当《恋与深空》游戏玩家在“数字身体”的交互中获得超现实满足，当Replika① 用户日均投入两三个小时进行人机之恋，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存在论层面的拷问：在虚实共生的数字文明中，“亲密”的本质内涵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变迁？缺乏“具身性共在”是否还是发展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重大阻碍？

回答上述追问，需要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桎梏，在文明演进的长镜头中审视亲密关系的重构逻辑。当人类站在具身性与虚拟性的分水岭，亲密关系领域的文明抉择将决定我们能否在虚实交织的迷宫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新支点。本文试图通过四个维度的解剖，揭示这场世纪重构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技术演进的阶段性分析中，追踪数字文明对亲密关系内涵的解构与重塑轨迹；其次，在“亲密饥荒”的现象学考察中，剖析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与社会后果；再次，通过中国经验的在地化研究，探寻“新家庭主义”能否对抗全球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最后，在文明哲学的层面，反思数字时代人类主体性的存续危机与突围方向。本文不仅是应对个体孤独和代际冲突等现实问题的学术努力，更是为回答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问提供当代注脚——在技术座架日益收紧的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考：如何让数字文明闪耀出人文精神的光芒？

二、数字亲密：亲密关系的内涵变迁

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正在重塑人类最核心的社会联结方式，而亲密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其变革折射着技术文明与人类本质的深刻互动。当下，数字技术已突破工具属性，成为亲密关系的组织原则。技术对人的情感驯化已达到临界状态，亟须重新审视“亲密”的本质内涵与伦理边界。与此同时，亲密关系的异化正在制造系统性风险，亲密关系领域的各种矛盾若持续发酵，就可能引发代际断裂等深层危机。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亲密关系领域仍是技术霸权的“薄弱环节”。人类能否在数字亲密中保持情感自主，直接关乎文明主体的存续。

通常而言，亲密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其核心要素包括情感、自我暴露、信任、情感依存性、激情、责任和承诺等。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和情感体验。其中，情感和爱是构成亲密关系的基础，它能够促进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自我暴露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通过分享个人的想法、感受和经历，增强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信任

① 2017年3月，Replika应用程序推出可定制AI恋人，半年时间用户量便突破1000万，是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聊天机器人。

是亲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个体感到安全并愿意开放自己。情感依存性强调个体在关系中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不仅限于具体的身份，而且是更广泛的情感联系。激情是亲密关系中的重要驱动力，能够为关系注入活力和吸引力。责任和承诺是维持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表示双方愿意为关系投入时间和精力。

然而，亲密关系的本质内涵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已从“具身性共在”的传统人际纽带演变为技术中介的数字亲密系统。综合学界关于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研究，笔者将数字亲密的核心特征概括为“三重裂变”：一是技术中介性重塑情感交互模式。如 AI 伴侣可以通过“人工移情”机制构建递归式反馈系统，使用户产生算法依赖[8]。二是情感商品化催生市场理性计算。如虚拟偶像的“舰长”氪金体系，可以将情感价值量化为包月套餐的互动特权，形成数据资本主义的新型增值空间。三是平台算法化重构亲密选择机制。如在线相亲平台采用算法推荐机制，每天为用户匹配潜在的伴侣，以至于情感的选择与决策权从个体让渡至算法黑箱。

数字亲密关系核心特征的裂变，将进一步促发亲密关系本质内涵的变迁，具体表现为三大价值坐标的位移。其一，排他性让位于共享性。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爱情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排他性。然而，网络主播与粉丝用户之间的亲密制造[9]、海量用户共同供养虚拟偶像[10]、乙女游戏玩家共享算法生成“完美男友”[11]等案例都表明，情感资源已然呈现出公共化的流通特征，数字亲密关系具有了共享性。其二，实体性蜕变为虚拟性。身体的共同在场一直是传统亲密关系获得情感深度的基石。然而，当恋爱养成类游戏玩家在“数字身体”的交互中获得超现实满足[12]，Replika 用户每天可以随时展开人机沟通随时生成可得的陪伴感，则创造出“无身体亲密”的新范式[13]。因此，亲密关系身体在场的实体性向虚拟性位移。其三，稳定性解构为流动性。如微信相亲平台制造的“五分钟匹配机制”，形塑了流水线式的相亲和高速流动的社会交往方式[14]。而相亲者在婚恋交友平台上的无限次滑动选择以及“灵巧地游牧”于不同数字空间中，呈现为“游牧式相亲”的形态[15]。这折射出鲍曼所述的“液态之爱”困境。

驱动这场变迁的深层动力，可能来自技术可供性、个体化需求与资本逻辑的三重共谋。在技术可供性方面，动捕技术创造的“具身化在场”消解了物理距离，算法推荐的“过滤泡”效应制造了情感茧房，痕迹留存功能则催生了全天候的监视文化，而摄像头技术则制造了一种亲密的监视[16]。在个体化需求方面，原子化个体在流动社会中需要寻求确定性补偿，如 AI 恋人的时刻在线和量身定制的理想伴侣补偿了个体的安全感需求[17]，乙女恋爱游戏对玩家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需求[18]。而在资本逻辑方面，平台型资本将亲密关系转化为数据商品和生产资料。如交友类 App 通过会员制将平台掌握的用户社交数据“可见性”商业化，实现了付费销售的市场盈利，带来了亲密关系的商品化[19]。因此，可以认为亲密关系本质内涵的变迁，既是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性困境的情感投射。

三、“亲密饥荒”：社交媒体时代的情感悖论

当技术成为亲密关系的核心中介，传统基于具身互动的深度连接注定被算法机制解构。技术效率与情感质量之间往往呈现出反向关系。一旦情感互动被简化为数据流的交换，就极有可能导致人们现实情感能力的退化，最终形成“数字代偿—现实萎缩”的恶性循环。当情感成为可计算资源，关系的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必然导致深层连接的荒漠化。同时，虚实交融的混沌状态，也会消解情感的真实性基础，使个体陷入“超真实孤独”：看似亲密触手可及，实则深陷存在论意义的“亲密饥荒”。

（一）“亲密饥荒”的三重维度

在社交媒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数字时代，“亲密饥荒”特指技术中介化社交环境中，个体在持续获得虚拟连接的同时，却遭遇真实情感体验匮乏的悖论性困境。综合既有研究，“亲密饥荒”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三重维度：其一，

是技术赋权下的关系过载与情感赤字并存。如在线相亲用户日均滑动匹配近乎有无限次选择，但转化为线下见面率却极低。其二，液态化社交模式导致深度羁绊消解。如Z世代年轻人中间兴起的以“找搭子”为代表的“轻社交”模式和浅缘社会的到来[20]。其三，虚实交融易引发存在性焦虑。如人机亲密关系建构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的情感归属需要。然而，人机之间所谓的“情投意合”实则只是一种虚假的“短暂欢愉”，会让我们忽视乃至荒废现实世界中持久深层的情感联系[21]。

上述三重维度的划分并非经验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遵循技术中介理论（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的认知框架。第一维度聚焦技术中介下的具身替代效应，揭示“关系过载与情感赤字”的辩证关系；第二维度指向液态现代性理论中的关系结构异化，展现鲍曼所说的“流动的恐惧”如何导致社交浅层化；第三维度则深入存在论层面，呼应鲍德里亚“超真实”理论，解剖虚实混淆引发的本体论危机。这三个维度构成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的认知阶梯，分别对应技术异化的表层症候、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型、人类存在的终极困境。

因此，“亲密饥荒”现象便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情感悖论。米歇尔·德鲁因将“亲密饥荒”现象视为数字文明最刺眼的悖论性症候[22]。这种“亲密饥荒”并非情感供给的绝对匮乏，而是技术中介导致的情感质量稀释与真实性危机。因此，“亲密饥荒”的本质是数字文明对传统关系模式的系统性解构。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科技来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表面上人类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连接自由，社交网络在不断扩大，社交资本在不断增长，但真实的爱与亲密感却在持续萎缩，群体性孤独感愈发强烈。因为我们对科技的期盼越来越多，却对彼此的期盼越来越少[23]。网络性爱虽然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身体亲密，但通常依照的还是传统的性别剧本，人们时常在其中体验到的是游戏和幻想，而不是真诚的个性和亲密的关联[24]。

（二）“亲密饥荒”的形成原因

关于“亲密饥荒”现象形成的原因，研究主要基于技术、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展开剖析。首因是聚焦技术理性对情感领域的殖民，对应工具理性扩张导致的异化；次因是剖析液态现代性下的制度转型，揭示社会结构流变对关系模式的形塑；末因是考察认知框架的文化重构，解释主体如何在虚实混淆中完成自我合理化。

1.算法中介的信任危机与情感异化

数字平台通过算法理性重构亲密关系的建构逻辑，形成“麦当劳化”的情感消费模式。婚恋交友平台的“一键匹配”机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匹配成功率，却也导致不少用户认为推荐对象与真实需求存在偏差。这种技术逻辑的深层次矛盾体现在：基于算法推荐的速配机制使关系建立的效率大幅提升，但维系周期却可能还不及传统模式，因此，用户在平台的使用过程中也会发展出“反算法”策略。如青藤之恋用户故意填写矛盾信息突破算法推荐限制，试图抵抗监视的用户则使用“小号”对抗数字追踪[25]。这种算法信任危机，实质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导致情感实践沦为数据操控的游戏。

2.液态现代性之下的关系结构流变

在数字时代的“液态之爱”中，社交关系呈现“高速流动—短暂停留—即时切换”的特征[26]。比如，都市“空巢青年”通过“搭子社交”构建临时共同体，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多个垂直领域的搭子[27]，并已形成功能特定、边界清晰的弱关系网络。这种核心圈层极小的“花瓣式结构”社交，导致传统强关系向功能化的方向转型。许多受访者认为，“搭子”的优势就在于责任明确、互不干涉[28]。再如，异地夫妻通过数字连接虽可提升互动频率，但数字化亲密难以解决异地“离散”家庭因物理割裂而产生的矛盾，夫妻之间的陪伴往往被简化为一种“亲密的姿态”[29]。

3.亲密关系认知框架的虚实混淆

人机交互的过程，容易催生“情感真实主义”的认知范式。用户明知AI的情感反馈是基于算法模拟，却仍将电子恋人的回应视为真实支持。

这种认知扭曲可能源于双重机制：在技术层面，AI 通过大量参数模型模拟共情，从而使得不少用户对此产生依赖；而在心理层面，匿名社交又创造了特殊的信任空间，其原理类似咨询者通过热线电话对陌生人倾诉隐私的意愿要高于面对面[30]。当虚拟偶像粉丝为“完美情人”体验支付巨额价款时[31]，情感消费事实上就已异化为“数字拜物教”，这在本质上折射出现实亲密关系的结构性匮乏。

（三）“亲密饥荒”的深层逻辑

从更深层次来看，“亲密饥荒”恰是现代性困境的数字镜像。其一，“亲密饥荒”投射的是个体化进程中的存在焦虑。青年使用“液态亲密”策略，是为了应对系统风险。相伴式同居者普遍会长期保持相互间的经济独立和情感抽离，他们将关系定义为“过渡状态”。这种“弱制度依附性”可能使他们之间关系的平均维系时长甚至还不及婚姻导向型同居。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成为关键调节工具。情侣通过“朋友圈权限设置”进行关系调试，形成了“可见性政治”的新型权力博弈。当“数字自我”与“物理自我”产生认知裂隙时，个体就会陷入“超真实”困境。毕竟，视频通话的线索丰富性虽低于面对面交流，却可以通过文本的补足而形成独特的亲密体验[32]。

其二，“亲密饥荒”投射的是代际关系的市场化转型。有调查发现，传统的孝道伦理在部分地区正在遭遇数字解构。在“闺女家”模式中，一些父母通过对子代的经济支持而换取子代的情感陪伴，形成了契约化的代际关系[33]。这种转型在留守群体中尤为显著——务工父母与子女通过微信而维持“持续联结”[34]，但不少留守儿童认为“电话妈妈”无法替代真实陪伴。当乡村婚恋异化为数字表演竞赛，男性要通过直播打赏等方式来展示经济实力之时，传统的求爱仪式就被技术逻辑所置换，由此可能导致离婚率激增[35]。这种代际关系的功能化转型，折射出情感资本主义对伦理秩序的侵蚀。

其三，“亲密饥荒”投射的是社会联结的脆弱化趋向。基于 LBS 的陌生人社交而建立的“强势弱关系”[36]，使原子化个体得以构建广泛网络，却导致深度信任的缺失。许多在线相亲用户都经历过社交倦怠，他们的日均在线时长与孤独感往往呈现正相关。当“亲密有间”的策略成为都市的生存法则[37]，青年就会在保持物理独居的同时，通过兴趣社群维持弱连接。这种“独而不孤”的状态，实质是鲍曼所述“个体化社会”的中国化实践。社交媒体账户上的好友数量越来越多，各类社交“搭子”也在不断增加，却找不到几个可以随时吐露心声和提供稳定情感支持的知心朋友。

四、情感资本主义：媒介全球化传播的席卷

“亲密饥荒”现象的蔓延是情感资本主义运作逻辑和媒介全球化传播发展的必然产物。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将情感资本主义定义为“情感成为可测量、可交易、可标准化的新型资本形式”，认为情感资本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核心是将人类情感全面纳入生产效率提升和资本增殖体系[38]。平台经济通过将亲密关系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标准化的数据商品，构建起“情感生产—流量变现—资本增值”的新型剥削链条。消费者只要支付预定的价格，就可以和虚拟恋人通过社交软件谈一场限时的虚拟恋爱，享受包括陪聊、哄睡、叫醒、陪玩等定制化情感陪伴服务[39]。当婚恋交友平台上，以充值会员等级确定享受情感匹配的机会，爱情便成为平台出售的商品。因此，薇薇安娜·A.泽利泽将情感的商品化现象称为“亲密关系的购买”[40]。当网络直播打赏机制将情感互动亲密值化约为刷礼物的金额时，人类最珍贵的情感体验便沦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燃料。

（一）情感资本主义的典型表征

情感资本主义的典型表征主要为：首先是量化自我与同质化陷阱。在线社交平台通过教育背景、资产状况和兴趣标签等标准化模板，将用户转化为一个个数据包，取消了个体的独特性。比如，相亲用户的自我描述大多会使用“阳光开朗”“经济适用”等雷同词汇，而算法则

会选择推荐相似度高的候选人。其次是情感市场的金融化运作。PUA 培训产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深圳某公司提供的情感速成课程甚至每周收费 300 多元 / 人 [41]。虚拟偶像行业则通过“人设运营—流量变现—IP 衍生”的模式，使单个虚拟偶像成为巨额商业价值的制造者，情感依恋因此被转化为品牌溢价 [42]。再次是代际关系的契约化重构。如将传统孝道转化为市场化协商，以至于不少家庭存在“经济支持—情感陪伴”的交换关系。如此一来，代际情感就异化为对亲情时薪的计算。最后是虚拟亲密关系的工业化生产。虚拟主播通过亲密度系统将情感互动量化为可交易指标，将观众消费的礼物与专属互动的时长建立关系。这种情感流水线制造出标准化的亲密体验，但也可能造成用户对现实关系的疏离。

（二）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在媒介全球化传播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关系的商品化与理性化进程制造了双重悖论：一方面，社交平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连接可能；另一方面，深度亲密关系却呈现萎缩态势。这种悖论源于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一是情感需求的虚假满足机制。虚拟恋人服务通过“制造幻想—引导打赏—因财而异”的三段式策略 [43]，将情感慰藉转化为标准化商品。用户支付费用即可获得定制化情感服务，但这种“拟真亲密关系”却具有交易性、虚拟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因此，不少用户在服务终止后往往会产生更强烈的孤独感，形成“情感消费—短暂满足—更大空虚”的恶性循环。

二是现实关系的效率主义异化。在线相亲平台的“自我量化”机制将个体分解为多项可量化指标，用户平均在几秒内完成潜在伴侣评估。这种“情感麦当劳化”导致关系建立周期缩短，但关系破裂率上升 [44]。平台算法制造的候选对象可互换性认知使大量用户陷入选择过载的困境，它实质性地消解了深度亲密关系的建构可能。

三是情感劳动的隐性剥削体系。在直播行业，主播往往需要进行情感表演。他们通过“微笑劳动”创造大量收益，但却要面临较高的平台抽成比例。这种对情感剩余价值的榨取机制，使主播群体的情感耗竭发生率大大高于普通人群。资本将情感互动转化为数据资产，形成“用户生产情感数据—平台占有数据价值—资本实现增值”的剥削闭环 [45]。

（三）情感资本主义的运行后果

在情感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亲密情感发生了三重转化：一是情感资料化，即通过心理测评、社交数据抓取等技术，将情感体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指标。婚恋平台的亲密值评分系统通常包含多个维度和多项参数，算法匹配成功率固然因此而得到提升，但也人为制造了一套情感信用评级体系，不少用户就可能因为评分过低而丧失匹配资格。二是情感商品化，虚拟礼物经济凭借“亲密关系购买”的支撑，可以创造庞大的市场规模 [46]。QQ 火花等级制度将情感维系量化为“续火天数”“聊得燚燚”，用户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关系维护 [47]，于是情感互动异化为数字劳动。三是情感资本化，职场的情商管理使情感能力成为绩效评估的核心指标，一些企业用于情绪管理培训的支出逐年增长。这种对于情感人力资本的投资表面上带来了显著回报，特别是提升了高情商员工的晋升速度，却也加剧了情感表达的功利化倾向 [48]。而社交媒体上的表演性亲密现象显示，社交媒体中的点赞、表情包互动替代了深度交流。

此外，情感资本主义还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平台经济的情感意识形态容易导致一种双重剥削：既占有用户的情感劳动，又通过精准营销榨取情感需求。高收入群体的情感消费支出必然高于低收入群体，这种情感资源的分配失衡将可能加剧阶层的固化。最后，情感失范也容易导致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解体，使得离婚率中“虚拟情感介入”的因素占比大幅提升。

五、中国式亲密关系：新家庭主义能否对抗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相互叠加的时代浪潮中，中国的家庭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层变革。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不仅重塑出家庭空间的新样貌，而且与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结构的改变紧

密交织[49]。前文已经提到，情感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将人类最私密的情感体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的商品。这种趋势已演变为系统的情感商品化机制：从心理咨询产业化到婚恋市场的算法匹配，从社交媒体情感营销到虚拟恋人服务，情感被切割为可量化的服务单元。那么，在大数据与算法权力的精密操控下，人类是否正在丧失情感自主的最后阵地？中国社会在接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这种殖民逻辑的渗透。问题是中国家文化传统能否对抗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从而使得中国式亲密关系现代化有独特的演化路径？

目前，国内既有的数字亲密关系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城市中产阶层的情感生活，特别是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线上社交和亲密关系缔结环节，研究发现多呈现出情感资本主义运作的共性特征。然而，这只是当下中国式亲密关系的局部图景，而非中国式亲密关系变革的总体描绘。目前，学界尚未对这一根本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既有研究取向暴露出四个重要局限：其一，缺失代际关系和家庭整体视角，将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简化为原子化个体与数字媒介之间的情感互动；其二，忽视线下现实交往空间，未能关注年轻人线上婚恋平台使用与传统熟人相亲并行的复合策略；其三，历时性观察的匮乏，缺乏对婚恋平台使用者后续婚姻实践及家庭关系演变的追踪研究；其四，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薄弱，未能揭示数字媒介对乡土社会亲密关系的重构机制。

在中国，家庭生活决定了人的最基本生存状态[50]。因此，理解中国式亲密关系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分析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整体变迁。中国家庭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其代际关系的弹性结构。在传统伦理性家庭“父子一体”秩序下，厚重的伦理边界束缚了家庭成员个体情感的自由表达，代际关系承载着家庭绵延的使命[51]。责任伦理、功能效用和亲密情感是中国家庭价值构成的不同向度，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家庭目标的不同会带来不同价值向度认可的权重差异。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亲密关系中情感话语由抑制到释放，情感性家庭叙事在 90 后小镇青年中凸显[52]。近年来，部分学者深入城乡社会家庭关系互动实践，提出“新家庭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的性质变迁，这一理论视角也符合笔者在全国近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 800 余天城乡基层田野调查的总体经验判断。

“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社会竞争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53]。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中国乡村社会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责任伦理、功能效用和情感整合等家庭价值要素的权重分配，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团结方式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根据笔者在全国不同区域乡村调查的经验，华南宗族性村庄的“伦理主导型”家庭，仍保持着较强的父子一体的宗族文化韧性。华北小亲族村庄的“功能主导型”家庭，形塑的是一种家庭发展取向的代际合作与交换关系。而中部原子化村庄的“情感整合型”家庭，通过制造边界实现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化调适。

同样，有学者研究发现城市社会家庭代际关系互动同样也呈现为一种“新家庭主义”。刘汶蓉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发现，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协商实践中得以再造，社会转型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让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抗逆性[54]。而在单身青年与原生家庭代际博弈和协商的过程中，代际实践的韧性彰显了家庭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影响力。这种“下行式家庭主义”[55]既非传统父权制的复归，也非西方个体主义的翻版，而是责任伦理与个体诉求的动态平衡。可见，数字技术并未在中国导致家庭关系的线性衰退，而是催生了新型交往伦理。城市家庭“高频低质”的线上互动，表面看是深度沟通的流失，实则为代际关系创造了弹性缓冲空间。这种亲而不密的关系策略，恰是应对现代性压力的文化智慧。

因此，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的现代转型，既非传统父权制的简单延续，也非西方个体主义的机械移植，而是可能演化出独具特色的“新家庭主义”。这种新型文化形态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即责任伦理的弹性化、情感实践的协商性以及代际关系的互惠性。因此，新家庭主义超越了传统家庭主义和西方个体主义的固有框架，为我们理解转型期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城乡不同区域演化形成的多元形态，共同构成了抵御情感资本主义殖民的缓冲地带。这种文化形态的抵御效能体现在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新家庭主义”可以通过伦理、情感与理性的三维交织，消解情感商品化的侵蚀；在制度层面，“新家庭主义”可以依托社区组织与数字平台的融合创新，构建情感资本主义的过滤机制，以建设基于亲密关系的数字公共生活体系[56]。某些地区的“线上道德评议会”，将宗族调解传统引入数字空间；城市社区的“代际共学中心”，则可能通过技术培训而重建家庭纽带。这些制度创新都可以说明，传统文化基因实际上具有强大的现代转化能力。

六、结论

在这场传统与现代的持久博弈中，中国式亲密关系展现出惊人的文化韧性。它既非固守传统的顽固抵抗，也不是全盘接纳的被动殖民，而是在创造性转化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总而言之，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的文化抗争，本质上是家庭伦理现代转化的创造性实践。当大量青年在择偶时选择“算法匹配+父母把关”，当微信红包延续着压岁钱的民俗功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对传统的冲击，更是文化主体性对现代性的重塑。这种重塑既避免了西方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陷阱，又能够超越传统家庭主义的刚性束缚，在代际协商、城乡互动和虚实交融中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路径。未来的关键，可能在于如何通过对“新家庭主义”的创造性转化，构建抵御情感资本主义殖民的文化防线，将这种文化自觉转化为制度创新，使“新家庭主义”真正成为数字时代的情感庇护所。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 安若辰，许莹琪．缘分的媒介化：移动相亲中的选择实践与自主性协商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7):37−44.

[2] 孙萍，李宜桐，于小童．“中介化爱情”之困：理解线上交友平台的媒介化与性别化 [J]. 妇女研究论丛，2023(1):117−128.

[3] 沈奕斐，宁雅昕．自我恋爱：乙女游戏中的新型爱情叙事和亲密关系转型 [J]. 妇女研究论丛，2025(1):40−52.

[4] 周子星．“乌托邦”还是“异托邦”?——“cos 委托”模式下青年亲密关系研究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72−82+169.

[5]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 [M]. 陈永国，汪民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3、242−245.

[6]Zygmunt Bauman.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4.

[7] 南希·K. 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第2版）[M]. 董晨宇，唐悦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11.

[8] 陈世华，汤黎．人机之恋：人工智能伴侣的情感互链与情智耦合 [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3(2):38−46.

[9] 董晨宇，丁依然，叶蓁．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37−151.

[10] 付森会．数字亲密：虚拟偶像崇拜中的亲密关系研究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18−128+171.

[11] 韩运荣，王杏予．女性向游戏的溯源、类型及模式解析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6):141−146.

[12] 尹金凤，陈梓潇．亲密关系的新技术想象：恋爱养成类游戏情感文化的底层逻辑与批判性分析 [J]. 学术研究，2024(9):9−15+177.

[13] 宋美杰，刘云．交流的探险：人—AI 的对话互动与亲密关系发展 [J]. 新闻与写作，2023(7):64−74.

[14] 罗逸琳，罗昊，黄静，等．流水线式相亲：微信相亲平台中的择偶观念与社会交往研究 [J]. 传媒观察，2022(4):73−79.

[15] 成倩．游牧式相亲：青年如何建立严肃的网络相亲模式 [J]. 中国青年研究，2024(10):83−91.

[16] 刘战伟，包家兴，刘蒙之．摄像头下的亲人：亲密监视中的“媒介化”与“去媒介化”亲情研究 [J]. 新闻界，2023(12):52−65.

[17] 曾一果，曹境．“赛博恋人”：人机亲密关系的建立及其情感反思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1):173−183.

[18] 陈爽，霍新悦，徐艺萌．乙女恋爱游戏对青年女性玩家亲密关系认知及行为的影响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43(6):86−99.

[19] 高艺，吴梦瑶，陈旭，等．“可见性”何以成为生意? ——交友类 App 会员制的监视可供性研究 [J]. 国际新闻界，2022,44(1):137−155.

[20] 王德福．轻社交与浅缘社会：新生代青年的社交转型及其社会后果 [J]. 中国青年研究，2024(5):30−39.

[21] 曾一果，王可心．心“真”是归处：一种情感真实主义的人机亲密关系阐释路径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9):123−131.

[22] 米歇尔·德鲁因．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关系 [M]. 周逵，颜冰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14.
[23] 雪莉·特克尔 . 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M], 周逵 , 刘菁荆 , 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314.
[24] 林恩·杰米逊 , 陈明哲 . 媒介全球化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和自我 [J]. 文化艺术研究 ,2022,15(2):49-60+113.
[25] 苏状 , 骆文佳 . 亲密关系中的电子监视行为何以发生——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J]. 新闻与写作 ,2023(5):69-80.
[26] 罗逸琳 , 罗昊 , 黄静 , 等 . 流水线式相亲：微信相亲平台中的择偶观念与社会交往研究 [J]. 传媒观察 ,2022(4):73-79.
[27] 孙凯奇 , 陆珈怡 . 当代青年“陌生化”轻社交的兴起及其生产逻辑——以“搭子社交”为例 [J]. 青年探索 ,2025(1):101-112.
[28] 田丰 . 数字时代青年社交需求及偏好 [J]. 人民论坛 ,2024(16):86-89.
[29] 陈拓 , 吴向然 . 个体化与技术共谋 : 青年异地夫妻数字化亲密研究 [J]. 东南学术 ,2023(4):186-196.
[30] 褚悦闻 . 向陌生人说“心里话”: 都市妇女的热线电话研究——以上海妇女儿童心理热线为例 [J]. 新闻大学 ,2011(1):117-124+147.
[31] 付森会 . 数字亲密：虚拟偶像崇拜中的亲密关系研究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18-128+171.
[32] 胡翼青 , 王沐之 . 作为媒介性的可见性：对可见性问题的本体论探讨 [J]. 新闻记者 ,2022(4):8-19.
[33] 王倩楠 .“闺女家”的出现：女儿与娘家亲密关系的转型 [J]. 社会学评论 ,2024,12(3):235-256.
[34] 吕山 , 李熠 . 媒介物质性视角下跨世代留守儿童家庭的情感实践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4(6):52-65.
[35] 李宇峰 , 刘燕红 . 消解与重构：社交媒体时代乡村社会的亲密关系变革——基于昭通市 L 村的个案研究 [J]. 传媒观察 ,2023(7):79-88.
[36] 许德娅 , 刘亭亭 . 强势弱关系与熟络陌生人：基于移动应用的社交研究 [J]. 新闻大学 ,2021(3):49-61+119.
[37] 于志强 . 亲密有间：个体化时代“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型塑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3(3):160-168.
[38] 伊娃·易洛思 . 冷亲密：为什么爱越来越难？ [M]. 汪丽 , 译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8.
[39] 吴越 , 孙弋帏 . 虚拟男友：数字化时代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3(3):32-43.
[40] 薇薇安娜·A. 泽利泽 . 亲密关系的购买 [M]. 姚伟 , 刘永强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2-4 .
[41] 刘海平 . 亲密关系商品化和约会程式化——以深圳 PUA 公司的调研为例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6):54-60+119.
[42] 傅善超 . 幻想的经济学初探：以虚拟化亲密关系为例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22(5):48-59.
[43] 郑广怀 , 张心怡 . 情系云端：数字时代虚拟恋人的亲密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3(2):217-231.
[44] 叶韦明 , 侯忻妤 . 亲密关系的麦当劳化与游戏化 : 情感学习社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J]. 浙江学刊 ,2021(3):143-152.
[45] 孙亮 . 情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9(7):42-51.
[46] 薇薇安娜·泽利泽 . 亲密关系的购买 [M]. 姚伟 , 刘永强 , 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17-19，22-26.
[47] 白昊石 , 黄顺铭 , 刘祖瑞 .“养火”：虚拟中介物与电子亲密关系 [J]. 新闻与写作 ,2023(7):86-96.
[48] 孙亮 . 情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9(7):42-51.
[49] 孙信茹 , 郭晨 .“数字之家”: 家与新媒介的研究及方法探索 [J]. 新闻界 ,2025(03):4-15.
[50] 吴飞 . 论“过日子”[J]. 社会学研究 ,2007(6):66-85+243.
[51] 杜鹏 .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2):120-134.
[52] 张雪霖 . 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变革：90 后小镇青年的家庭再生产困境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8):5-13.
[53] 李永萍 .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20(3):41-51.
[54] 刘汶蓉 .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 [J]. 社会学研究 ,2016,31(4):145-168+245.
[55] 阎云翔 , 杨雯琦 . 社会自我主义 : 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J]. 探索与争鸣 ,2017(7):4-15+1.
[56] 田浩 . 以亲密关系重塑公共生活 : 介入性新闻的观念、实践及创新限度 [J]. 新闻界 ,2023(8):14-23.

Creating "Intimacy Famine" : Alienation of Intimacy andCultural Breakthrough in the Digital Age

Zhang Xuelin

Abstract: When human civilization enters the deep waters of the digital age, a quiet and profound social revolution is quietly unfolding in the field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catalysis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erpersonal bond of "embodied co-existence" to the digital intimate system mediated by technology. Its connotation has triple fission and three value coordinate

（下转第 34 页）

团结“亲密公众”：智能算法与数字生活秩序重建[1)]

田浩

摘要 数字媒体技术为人类亲密关系创设了兼具日常化与琐碎化的发展语境，召唤了亲密关系在内涵与外延维度上的数智化转型。不同于诸种在线亲密关系，数字亲密关系突破了技术悲观主义的不确定观念，鼓励个体依托智能算法等技术基础来勘定情感经验的边界，并据此探索如何团结为公众的数字化答案。在实践维度上，亲密公众的团结呈现出形态的复数化、策略的体验化与对象的拟人化等基本特征。进一步来说，秉持着数字亲密关系的观念框架来培育积极的情感自我并团结亲密公众，在构建公共情感秩序的实践进程中具有鲜明的介入性价值。

关键词 数字亲密关系；智能算法；亲密公众；情感自我；公共情感秩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田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200433

数字媒体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改造日渐深入。智能算法创设了新的信息生产与分发规则，构建了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人际沟通与社会交往体系，这既为个体的任务处理和情感交往提供了便利，也推动了一种兼具技术属性和情感逻辑的数字媒体文化的流行。尤为突出的是，数字媒体生态通过拓展日常亲密关系的内涵、特征与实践方式，重塑了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与公众团结方式的理论化方向。这要求研究者立足于数字时代的技术文化基础，发展一种包容性的分析框架，以准确摹刻并阐释数字时代人类的亲密关系实践。

一、数字化缘何拒斥“液态之爱”

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内核之一，以深度的情感联结、长期承诺与身体亲近为核心特征。罗兰·米勒（Rowland Miller）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在于稳定、持续的情感亲近。其广义范畴涵盖亲情、爱情与友情，而在狭义上则聚焦于婚恋关系[1]。在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中，亲密关系的运转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体验和一种基础性的个体团结方式。它由个体经验与社会文化规则持续互动、高度卷入而产生，是一种“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2]。一方面，个体能动性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城市背景下的新型文化社区研究：新公众、新内容、新场域”（22JJD860002）。

在日常的、亲近的人际交往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个体对理解、关心、信赖等积极情感要素的渴求推动了亲密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以维系亲密关系为长期目标，个体也乐于参与构建各类制度化关系——如婚姻、家庭、稳定的朋友圈——来创造安全的“亲密感受”（feeling of intimacy）。情感需求的差异化谱系影响着个体对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等具体问题的认识，并进一步协调着个体情感状态与社会系统的相对平衡。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这一问题报以关注，并认为在亲密关系领域内，特定阶级、特定年龄与特定群体的价值共识和交往规则往往呈现出差异化分布[3]。一旦社会组织规则与媒介形态发生更迭，亲密关系的呈现形式与演进逻辑就会发生相对特殊的变化。液态亲密关系（liquid intimacy）就是其中一种代表性的变化形态。

所谓亲密关系的“液态化”，指的是在现代社会组织的演进和技术更迭的宏观背景下，稳固的、确定的亲密关系被消解成碎片化、不确定的情感体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液态之爱》一书中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液态承诺正在瓦解传统亲密关系，虚拟的亲密关系将日益取代真实的亲密关系，短暂的亲密联系最终将取代终身的亲密联系[4]。可见，液态亲密关系代表着一种碎片化、短暂化与脆弱化的技术焦虑观念。如同流动的现代性一般，互联网颠覆了传统亲密关系的情感沉淀过程，为人类创造了极端丰富的亲密联结方式。然而，稳固的交往规范与制度化准则的缺失，使得人类只能在不确定境况中探寻短暂的情感安宁，液态亲密关系最终指向的是新技术场景中自我的迷失与个体团结模式的失灵。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甫一遭遇技术闪光物，就会面临情感需求的无序扩张与欲望的极大膨胀[5]。而被液态亲密关系包裹的个体，则会在如何实现公共团结这一问题上陷入迷茫。

事实的确如此。在互联网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数十年间，人际交往的虚拟化、情感联系的低成本、在线互动的激增为个体提供了轻松可得的约会对象、兴趣相投的趣缘群体，乃至全天候的亲密陪伴，个体的亲密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这使得个体的自我扩张进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然而，尽管个体可以在虚拟平台上获得高强度的临时性情感体验，也可以迅速在不同的亲密关系之间转换，在线亲密关系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却受到大众的质疑。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所指出的，液态亲密关系缺乏稳定的、深度的情感参与，由技术所宰制的情感生活重新定义了个体的自我、亲密与社交，并扭曲了个体对稳定感与安全感的需求，最终必将引发群体孤独（alone together）。要破解液态亲密关系所诱发的种种情感困境，只有“把技术放回它该有的位置”[6]。唯其如此，人类才能找回自身独有的亲密关系“灵韵”。

但是技术该有的位置究竟是什么？在数字媒体生态业已全面普及的当下，诸种亲密实践早已与传统意义上的亲密乌托邦大相径庭，而被极大地拓展了个体能动性也持续地丰富着亲密关系的内涵与实践。不断有经验资料表明，数字时代的个体既更加积极地运用技术手段来探求亲密关系的“意义”，也尝试在“液态”与“固态”的亲密关系之间发展出独特的数字观，以探索新型个体团结方式[7]。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兼具文化、情感与技术等多重面向，这为我们超越单一的行为逻辑，以一种统合性的观念来准确理解亲密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数字经验。在其中，立足于数字媒体生态对亲密关系进行全方位检视和理论拓展是必要且必然的。基于此，厘清何为数字亲密关系（digital intimacy），以及个体如何借由这种亲密关系而实现有机团结，是本文尝试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积极的确定感：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与要义

在明确了数字亲密关系的关键在于超越液态亲密关系的碎片化、短暂性与脆弱性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数字亲密关系的独特之处：数字亲密关系并非对亲密关系的机械化模拟，而是由数字媒体生态的生产、分发与接受环节所构建的综合性亲密体验。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为个体扮演着“外置大脑”的枢纽型角色，为个体提供

了一种基于积极的确定感而团结为亲密公众的理论路径。

（一）从“在线亲密关系”到“数字亲密关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数字亲密关系这个概念原生于数字时代，但关于媒介化亲密关系的讨论则可散漫地见于在线亲密关系（online intimacy）、媒介化浪漫等经验性概念。在媒介文化研究之中，在线亲密关系被用来指称在不同媒介形态——如书信、电话、电视、互联网等——改造下的亲密关系形态，其要义在于借助增设个体间的沟通渠道来维系并拓展亲密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利佩·科尔泽尼（Felipe Korzenny）就认为，电子媒介能够生成区别于物理空间的电子亲近性，这种电子亲近性的强度与媒介丰富度呈正相关[8]。电子亲近性等亲密感受的发生受到文字、语音等符号化互动的影响。但这些概念往往强调由技术手段所中介的工具性联系，重视联系过程而忽略传播主体身份的丰富内涵。而数字亲密关系则不然。数字媒体生态借助数据及其流通过程还原一切事物及其关系，社交媒体平台、推荐算法、人工智能语音助手等技术手段错综复杂地嵌入到我们与自我、他人以及非人类行为者的亲密关系中，为人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个体以积极的情感体验为目标持续游牧，满足生活乐趣与自身的亲密需求，在多种人际交往模式之中探索个体团结的实现路径。

基于此，数字亲密关系与此前各类在线亲密关系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始终在通过完善某种交流过程来提升亲密关系实践的丰富度，这导致研究者始终在技术与人类的二元对立框架下讨论在线亲密关系是否“真实”，能否引发用户的独特情感体验，并倾向于以具身亲密为标尺来评价虚拟亲密的独特性。伴随着智能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与大规模普及，数字媒体平台以一种统摄性的实践理念集成了各类在线渠道的技术优势，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外置枢纽”而非“单一附件”。由此催生的数字亲密关系不能决然与日常生活分割，而应当被视作日常生活本身的整体性产物；数字亲密关系也无所谓真实与否，因为一切数字亲密关系都是此时此地的真实体验。针对数字亲密关系的种种讨论也需要超越比较思维，内涵一种面向公众的、实践性的亲密观念。

（二）情感自我、亲密公众与数字亲密关系

有了上述关于数字亲密关系的认识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理解当代亲密关系实践的关键概念——情感自我（emotional ego）与亲密公众（intimate publics）。情感自我是个体在较为长期的数字媒体使用过程中积累的一类长效的自我认知，是个体情感经验在数字媒体生态中的集合与呈现。亲密公众则是数字时代的个体经由亲密关系团结而成的情感共同体。与亲密关系强调稳定的、确定的情感体验同构，情感自我在数字媒体生态中反复操演，可以逐渐形成用户对何为数字亲密关系、如何据此团结公众等问题的反思性答案。换句话说，数字亲密关系的生成与实践过程就是情感自我逐步团结为亲密公众的过程。

数字媒体生态是数字亲密关系发生的基础场景，而作为基础设施的智能算法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与理论启发性的“灵魂”与“大脑”。智能算法支撑着数字媒体生态的运转系统，其核心特征在于自动化生产、精准化推送与即时化响应。如安东尼·艾略特（Anthony Elliott）所指出的，在数字化、算法化、自动化的社会中，亲密关系的不确定性将被消除，个体对亲密关系的预测能力与智能逻辑紧密相关[9]。在具体的实践中，通过全天无休地捕获人类行为数据，智能算法既能够针对用户的具体信息需求开展专门的生产实践，提升用户信息获取的响应度；也能够在信息分发环节精准匹配用户兴趣与多模态信息内容，为用户设置强烈的情感卷入感与参与动机。无论是作为“社交素材供给者”还是作为“社交对象匹配机制”，智能算法都深刻地塑造着数字亲密关系的生成与演进逻辑。一方面，智能算法可以通过增强式生产（如视频美颜、深度伪造、文生视频等）供给大量的视觉素材、听觉素材，为个体供给充分的亲密关系模板，拓展数字亲密关系的技术基础与呈

现模式，启发个体团结为亲密公众的网络化实践[10]。另一方面，智能算法也在分发与接受环节催生了一系列基于快速匹配的浪漫仪式，与纷繁的文化类型（cultural genres）融合，通过预设情感脚本来建构个体对不同亲密关系的预期——这与现代消费社会对个体亲密关系的操纵别无二致[11]。在一些专注于亲密关系的功能应用上，个体可以反复操演亲密关系的生成和消逝过程，这更提供了一种持续的、累积性的亲密体验与校准流程。

智能算法可以为个体伸张积极的情感体验，探索如何为团结亲密公众设置独特的技术文化基础。数字亲密关系作为情感自我的外部镜像，既继承了亲密关系对情感体验的各类制度性要求，又催生了个体新的数字化交往习惯，助益个体构建关于“我是谁”和“你是谁”的身份追问。数字媒体生态极大地消解了亲密关系的共在要求，以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技术逻辑鼓励用户以自身的情感经验为纽带而在线联结并创造亲密公众。如黛博拉·钱伯斯（Deborah Chambers）的判断，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已深度介入私人关系，在线关系在本质上是媒介技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造产物[12]。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信息的生产、分发与接受环节全面改造了用户关于亲密关系的想象、体验与校准规则，这带来一种混沌的、体验式的团结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仍然选择将数字亲密关系理解为单纯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技术决定论的风险，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细腻情感联系视而不见。与其将数字亲密关系视作持续扩张的技术手段催生的文化后果，毋宁将其视作情感自我探索与调适的产物——在智能算法的统摄下，个体的亲密交往并非面对新技术手段的无序扩张，而应当是依据技术可供性的具体实践策略。构成这一实践策略的主要逻辑，恰恰是情感自我在逐步明确自身的团结方式。

但是，相关的理论问题仍然存在含混之处。第一，智能算法的技术逻辑如何与个体能动性有效融合仍然有待厘清。固然智能算法在生产与分发环节为用户个体提供了新的情感连接方式和互动体验机制，但各类新兴的情感交往实践如何“沉淀”长效的亲密关系激发与约束规则，推动亲密公众形态的更迭，仍然需要细致地说明。第二，既然数字亲密关系是数字生活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个体如何基于友好的平台界面与便捷的操作流程来开展创意性的亲密实践？换句话说，研究者需要充分说明个体如何能够充分运用亲密关系技术（如数字工具、数据指标等）来动态地获得亲密感受，而不将其归因于某些技术手段的固有属性[13]。第三，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角度来说，亲密关系的积极程度同时与个体的情感控制力有关。那么在团结亲密公众的目标指引下，个体是否可以突破性地明确身份归属、追寻生活意义并培育社交激情，以弥合液态亲密关系所遗存的情感隐患——如激烈的情感冲突、普遍的群体孤独与情感极化等？为了有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基于当前的数字媒体经验，归纳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的实践过程在形态、策略与对象方面的核心特征，并对其加以进一步分析。

三、复数化、体验化、拟人化的亲密团结

从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与要义出发，经爬梳相关领域内的理论文献与实证经验，本文认为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的实践过程具备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亲密形态转向“复数化”、亲密策略转向“体验化”、亲密对象转向“拟人化”。

（一）增强现实：亲密形态的虚实复合

数字时代的亲密实践核心在于个体能动性通过融合技术基础和文化制度来生产新的个体身份与人际关系，继而获得一种基于积极的确定感的亲密公众团结方式。本文将这一亲密实践的基本特征界定为“复数化”，意在强调诸种亲密实践并非单纯的虚拟团结，而始终是一种线上与线下复合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首先，推动个体日常实践的全面数字化，是数字媒体生态发展演进的理想目标之一。具体到亲密实践中，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信息的生产、

流通与消费的全链条深度捆绑，不同议题、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都能够随时引发个体独特的情感体验，并随时可被迁移至不同的讨论场景。这使得数字亲密关系与传统意义上共处的（co-present）亲密关系不同，兼备虚拟与具身讨论的特征，并持续催生个体或在线或离线的创意亲密实践。视频通话功能、即时通讯群组、电子监控等数字媒体技术则是这类“不共处”而“共在的”数字亲密实践的底座。一个直接的案例是，家庭内部的数字亲密关系不仅是一种“远距离陪伴”，更是一种代际间的新型情感团结方式。子代可以通过掌握更复杂的视频通话技能、社交媒体使用技能来策略性规避代际冲突，亲代也可以通过技术学习来实现亲密关系的自主生产[14]。

其次，基于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体生态的全面融合，智能算法为个体提供即时的、持续的陪伴感，这种陪伴感与具身陪伴动力相似、作用仿佛，成为维系亲密公众团结实践的主导性逻辑。鉴于亲密关系的形成必然需要情感陪伴的积累，当不同个体在线上、线下场景中“相遇”并互动而成陪伴关系时，虚拟陪伴与现实陪伴感觉就会共同增强，创造出以情感自我为内核的团结实践体系。需要说明的是，个体既无法摒弃数字媒体生态，也无法全然“脱实向虚”，一种增强的、兼具虚拟与现实的亲密空间显然是当前亲密关系最为普遍的场景。鉴于个体的情感体验始终源自真诚、深刻的情感需求，在智能算法的作用下，个体在认知与身体维度都会深度卷入，形成与传统亲密别无二致的情感体验[15]。而情感自我始终定位于陪伴感的生产过程之中，日常重复的情感实践最终将引发积极的成果，即亲密公众的有机团结。由此观之，由智能算法所介入的亲密团结可被视作数字情感文化的具体维度之一。这种亲密关系既不同于单纯的液态之爱，也不同于全面离线的具身之爱，而是一种兼具体验性与反思性的长效情感实践。

在数字亲密关系的融合化趋势下，陪伴性不再是某一类亲密实践的专属特性，而是一种弹性的、流动的综合情感体验。智能算法凭借着强大的内容生产和分发能力为用户探索个性化的亲密团结模式创造了空间，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婚恋关系，都在个体自主的情感自我塑造过程中被转换为一种动态重组和调适的行动后果而非前提[16]。这进一步导致数字亲密关系的诸种具体形式（亲情、爱情与友情等）在数字时代显示出混沌的、归一的泛化倾向——那些素未谋面的个体可以被视作“家人们”，而素无往来的偶像也可被称作“爱人”。因为这些亲密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情感自我的基本需求，即对积极的情感体验的呼唤。尽管许多亲密关系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团结模式，但他们的指向却高度一致，那就是情感自我对于总体亲密感受的永恒追求。

（二）寓“亲”于乐：亲密策略的体验化

无论是在离线环境还是在线上环境中，亲密关系的培育都不仅仅依赖于个体的长期陪伴，而是有赖于情感强度（intensity of affect）。如代表性的亲密关系之一——爱欲一词的英文表述Eros意即爱与欲望，尤其是感性或热情的爱。在智能算法的帮助下，数字时代的个体往往通过高强度的情感表达和自我展露来实现迅速连接，这与依托日常互动来维系的情感实践大不相同。在具体的实践策略方面，数字亲密关系也呈现出体验化趋势：快速匹配、游戏化养成与多感官参与。

快速匹配是个体获得亲密体验的基本策略。早在约会交友应用（dating app）兴起初期就有学者指出，这类平台可以降低认识新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以高速率的个体交往成为情感唤醒与情感冲突的温床[17]。随着智能算法进一步嵌入约会交友应用，快速匹配的精准程度大大提升，用户借助画像标签和匹配机制将亲密关系转换为可标化的实践过程，迅速获得一种短暂且可复制的强烈体验。广受关注的约会交友应用的左滑/右滑机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实践。但在效果维度上，这类快速匹配的亲密体验却并不一定更加浅表。即使是最短暂的爱欲关系，当个体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获得强烈的陪伴感时，他们就会获得团结为亲密公众的驱动力。甚至在

很多情况下，这种亲密体验并不仅仅发生在约会交友过程中，也发生在公开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诸如直播、虚拟聊天室也会引发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例如喜悦、喜爱、希望等，从而催生用户对亲密感与生活意义的拓展化界定[18]。从这个角度来说，智能算法实际上通过快速匹配机制鼓励情感自我始终保持开放心态，以富含包容性的亲密感受来探索团结为亲密公众的实践策略。

如前文所述，智能算法鼓励用户将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体生态融合，推动用户持续开展创意信息实践。数字亲密实践因而具备更强的游戏性（playfulness）。随着亲密实践的参与者可以借助文字、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符号将即时情感体验转化为可存储、可传播的记忆装置，抽象的情感体验因而被具象化为“进度条”，亲密关系成为可量化、可培育的对象。在亲密关系建立的初期，个体不仅通过游戏化的日常行为（如打卡挑战、虚拟任务、养成游戏等）潜移默化地获得一种与智能算法紧密相关的亲密关系认知，创造“可控的情感想象”[19]。当亲密关系趋于稳定时，个体也会选择将私人情感编码为公共展演文本，通过媒介化呈现来创造更加多元的亲密关系实践，数字空间内的晒恩爱、纪念日仪式、数字囤积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甚至在很多时候，一些粉丝个体对偶像的单方面亲密想象也具备拟亲关系（parakin relationship）的特性，同样构成数字亲密实践的游戏化创意。总而言之，无论何种亲密实践，都在智能算法的生产与分发力量的渗透下，持续将亲密团结模式从单一的“制度性规范”转换向多元的“技术性实践”[20]。

除了上述两种体验外，理解数字亲密实践还有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个体内部的多感官共同参与。智能算法、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已推动数字媒体生态拥有极强的拟真功效，这不仅在技术维度为沉浸式内容生产与分发创造了基本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催生了用户借助多感官通道来满足自身亲密需求的实践路径[21]。结合前文的分析，智能算法能够同时在内容生产与精准分发两个维度上改造用户对亲密关系的体验方式，单纯的“文本—反应”过程因此需要让位于用户的多感官体验，后者已然成为亲密公众赖以团结的基础。具体来说，个体始终在亲密情感需求的支配下寻求智能算法的协助，并进一步参与内容生产与信息流通环节。而支配这种带有主动探索色彩的团结实践的，正是无处不在的多感官元素。例如，流媒体平台为个体提供着全时段的声音刺激，有效提升用户的感官愉悦度，并为用户创设私人的亲密感受[22]。而虚拟触觉产品同样可以通过感官联结来构建公众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说，无论是视觉、听觉、触觉还是诸种感官刺激之间的“联觉”（synesthesia），都为用户突破既定的亲密形态界限，重新想象一种融合的、富有生产性的团结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即使数字亲密关系的多感官实践目前仍显得较为混沌，但其文化后果却是相对清晰的，那就是一种以体验性为基础的综合性数字亲密观念的崛起。

（三）情感共通：亲密对象的拟人化

对数字亲密关系开展形态分析与策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如何在与智能算法共生的当下明确自身的亲密需求，从而探索团结为亲密公众的核心路径。伴随着数智时代走向深入，这种积极的情感自我将亲密关系从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拓展为人与人工智能的情感交往。这种崭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数字亲密实践以人机情感为代表。

实际上，关于人机情感的讨论并不肇始于人工智能，而在电子游戏研究中就已经成果丰硕了。在众多乙女游戏和模拟人生类游戏中，虚拟的游戏角色将亲密关系定制化，与游戏角色建立亲密关系就是个体尝试塑造完美亲密关系的实践。在游戏过程中，用户通过界面化选项（如性别、等级筛选等）投射自我需求，个性化设定为用户提供了想象“脑补”式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成为唾手可得的亲密关系来源[23]。尽管电子游戏所能够提供的亲密关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是联系性的而非陪伴性的，却显示了一种实践层面的可能性，那就是通过拓展亲密对象的存在形态，可以提升个体对亲密关系的单方面主导性，从而令亲密关系成为专属于个体的陪伴式情感体验。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普及，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不仅能完成工具性任务，更在情感陪伴领域展现出突出的类人特质，一种全天候的、可供个性化调配的数字亲密关系应运而生。作为对人类情感需求的智能化回应，AI 伴侣借助大语言模型模拟人际情感交往，以自动化生产模式为个体提供着全天候陪伴与个性化支持，在涉及人类深层问题时，其即时响应的陪伴特征甚至能够为个体带来超越人际交往的满意率[24]。以人工智能疗愈机器人为例，内嵌的智能算法总是可以为个体提供即时的、乐观的话语回应，既能够为个体提供负面情绪的纾解方案，也能够协助个体展开积极的、深入的自我理解，这为个体提供了与技术共生的文化方案。

可以看出，人机亲密关系尝试通过引入人工智能这一对象，来提升个体对亲密关系的控制力与情感体验的确定感。这能够为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奠定较为充分的实践基础。较人类行动者来说，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亲密对象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用户通过持续对话，不仅可以获得低成本的完美情感体验，还能够在反复的亲密实践中明确自身的情感需求与自我定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人工智能开展亲密关系，本质在于数智时代的用户对自我定位和情感关系的控制[25]。这种亲密关系实践始终受制于个体的日常情感经验，并依赖用户的情感体验来评价。当人工智能准确读取并完成个体在任务处理和情感陪伴过程中的各项要求，人机亲密关系就能够以相当“智能的”方式来符合用户的个性化期待，为用户带来人际亲密关系所无法实现的理想情感陪伴效果。而这种理想效果的实现显然与个体的智能算法素养密切相关。进一步来说，人机亲密关系与前文所述的情感自我的边界构建实践是同构的——他们共同指向了一种自我积极参与的、情感高度卷入的、结果极端可控的亲密关系。而在“复数化”的亲密形态与“体验化”的亲密策略的规范与制约下，这种控制力与确定感最终将有助于个体明确情感自我应当如何团结为亲密公众。

四、迈向数字时代的亲密公众

智能算法及其所附身的数字媒体生态不仅为个体设定了自动化生存的技术底座，更提供了理解自我与公共社会的认知框架，催生了情感自我团结为公众的亲密化路径。本文以数字亲密关系为核心考察对象，将焦点置于智能算法为数字亲密实践所设置的一般性规则，探究基于数字亲密关系重建数字生活秩序的有效方案。具体来说，智能算法既为个体设置了形态丰富的、高度自主的亲密实践形式，也在理念上以长效的情感体验为基础构筑了公众团结的文化路径。我们可以围绕着从“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的逻辑来理解并归纳其中的理论意涵。

第一，至少在当下的各类数字亲密实践中，个体对积极情感体验日益增长的个性化追求都显然居于主导地位，而智能算法所设置的即时陪伴感则可协助个体勘定自身情感经验的边界。情感自我作为个体稳定的、长效的情感经验的集合，既在实践层面鼓励个体在个性化逻辑中感知、建立与维持亲密关系，也在理论层面逐步显现出将“个体经验”提炼为“理论指南”的趋势[26]。如前文的分析结论，鉴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体生态逐步趋于融合，以情感自我为内核的数字亲密关系必然要求研究者关注人与技术手段的归一化逻辑，并探求以数字媒体生态为基础的人际团结方案。在其中，个体既可以探索性地扩大亲密关系形态与亲密对象的定义，发展出多元的亲密关系实践策略；也可以运用日常情感经验拆解并重塑亲情、爱情与友情，将其化归为同一的积极情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具备反思性的情感自我实质上指向了个体如何有效地参与构建数字生活秩序，而诸种探索性的亲密实践则共同显示了数字亲密关系的基础要求——为个体探求积极的确定感供给鲜活的经验依据。

第二，鉴于亲密关系指向的是个体的有机团结，因此数字亲密关系也必然指向个体如何在数字媒体生态中实现有机团结，即亲密公众何以建构这一问题[27]。前数字时代，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来划分社会关系边界是个体团结的普遍选择，而在当下，智能算法为个体创造了新型情感连接场景，为个体借助游戏化实践和智能化互动而获得积极的情感联结、接入多元亲密网络、归纳人

类新型的社会团结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亲密公众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在实践维度上，个体在情感自我的驱动下，既可以在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对虚拟偶像进行想象性情感投射，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围绕着特定的社会议题或开展隐秘的情感交流，或开展公开的情感展演。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时代亲密公众的边界弹性与情感强度呈现高度分化特征，因此必然显示为各种暂时的、流动的情感共同体。但是，一种源自情感自我的确定感却是个体参与情感共同体各类实践的基础，也正基于此，以培育数字亲密关系为方案重建数字生活秩序才方可成真。更进一步来说，正如网络化公众或情感公众等概念，亲密公众也尝试将全社会范围内共享的情感体验纳入数智生态研究之中，以深度剖析情感自我通过何种信息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来实现社交协商和关系塑造[28]。但就目前的研究经验来说，对这种公众群体的联结方式与社会效应的讨论仍不充分。

基于前文对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分析，本文继而提出在数字亲密关系视野下理解“亲密公众”及其团结方式的三条理论发展路径。

第一，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与实践趋势共同表明，超越具身与虚拟的二元对立观念而建立一种融合的增强现实理论视角，有助于研究者准确理解数字时代的亲密公众及其团结方式。如内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所指出的，任何关于亲密关系的数字二元论（digital dualism）都必将徒劳无功[29]。因为无论是虚拟亲密关系压倒具身亲密关系，还是具身亲密关系收编虚拟亲密关系，都必然导致如液态亲密关系观念所代表的技术悲观论。数字时代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亲密需求既是具身的也是虚拟的——如微信联系人既是虚拟的社会交往对象，也是真实的情感共同体成员。因此，一种融合的增强现实理论视角对于个体勘定情感自我的边界，并以此为基础来团结为亲密公众尤其重要。通过对数字亲密关系所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技术文化基础进行准确的理论化，研究者可以厘清技术构造与社会文化习惯的结合过程，从而辨明个体如何通过重构个体互动模式而建立“新自我”与“新关系”[30]。更进一步，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者可以探析数字时代亲密公众团结进程中的驱动力、实践特征与社会影响，讨论智能算法所构筑的技术逻辑是否会持续消解人际关系的制度化边界，以及更多流动的、松散的社会关系是否会引发亲密关系危机，等等。

第二，尽管数字媒体生态拥有较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更为智能的、自动化的技术逻辑，但也并未为个体带来颠覆性的亲密关系革命。情感自我的边界勘定工作与亲密公众的团结工作仍然以具体的数字情感经验为基础，对个体数字情感经验的深入分析应当在未来的数字亲密关系研究之中扮演基础角色。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数字亲密关系并非单一的行动习惯，而是一种囊括了技术、情感与文化规则的新型关系组织方式。无论是在线直播、媒介化家庭还是粉丝实践，都表明数字亲密关系试图介入个体的情感体验而影响亲密群体的团结方式。倘若个体普遍缺乏对智能算法的充分了解，就极易无法成功地与亲密公众开展健康、积极的对话，从而陷入个体能动性危机。唯有准确把握亲密关系在各类技术手段和文化背景中的呈现形态与变迁规则，积累充分的数字情感经验，个体才能够在亲密关系之中建立平衡，从而避免将数字技术视作亲密公众团结的阻碍[31]。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对数字媒体生态下个体的日常习惯及其价值指向保持充分的关切，才能准确理解何为数字时代的人，以及何为数字时代的亲密公众。

第三，基于对当前的数字亲密关系与实践的准确考察与归纳，研究者方可建构一种适切的数字情感文化理论。数字媒体生态通过不断挤压个体经验来重构情感自我的实践场景，真实性幻觉、情感冲突与极化、群体孤独等问题成为数字时代个体情感生活中不可祛除的隐患[32]。研究者有必要对数字亲密关系实践秉持务实的考察观念，但也可以不断探索亲密公众营造亲密感的共同经验，充分想象人文光辉与智能算法系统如何交融而成数字时代独特的生活秩序。在数字生活研究中，建立一种自主的、原生于数字媒体生

态的情感文化理论因而具有指南性意义。研究者与实践者可以共同归纳何为数字情感文化——如何发展适应数字文化语境的情感关系？怎样防范数字媒体技术对亲密关系的隐秘操控？如何呈现亲密公众中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张力？等等。未来的研究可能需在技术哲学与批判理论框架下，持续探讨数字情感文化理论的边界。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 米勒 , R., 珀尔曼 , D. 亲密关系 (第 5 版)[M]. 王伟平 , 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 2011: 210.

[2]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M].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 2004: 7.

[3] 吉登斯 . A. 亲密关系的变革 : 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 [M]. 陈永国 , 汪民安 , 等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1: 116.

[4] Bauman Z.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M]. Cambridge: John Wiley & Sons, 2013: 65.

[5] Kwok I, Wescott A B. Cyberintimacy: a scoping review of technology-mediated romance in the digital age[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20, 23(10): 657-666.

[6] Turkle, S.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295.

[7] Hobbs M, Owen S, Gerber L. Liquid love? Dating apps,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J].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53(2): 271-284.

[8] Korzenny F, Bauer C. Testing the theory of electronic propinquity: Organizational teleconferencing[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1, 8(4): 479-498.

[9] Elliott A. *Algorithmic Intimacy: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M]. Cambridge: Polity, 2023:11.

[10] Chambers D. Networked intimacy: Algorithmic friendship and scalable social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32(1): 26-36.

[11] 伊娃・易洛思 . 爱，为什么痛 ?[M]. 叶嵘 , 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59、448.

[12] Chambers, D. *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line Intimacies and Networked Friendship*[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1-3.

[13] Heřmanová M. Hands labouring for safety: Mediated intimacy in influencer communities on Instagram[J]. *Anthropology of Consciousness*, 2024, 35(2): 186-200.

[14] 朱丽丽 , 李灵琳 . 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 : 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7(5): 95-104.

[15] Alinejad D. Techno-emotional mediations of transnational intimacy: social media and care relations in long-distance Romanian families[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1, 43(3): 444-459.

[16] Barnwell A, Neves B B, Ravn S. Captured and captioned: Representing family life on Instagram[J]. *New Media & Society*, 2023, 25(5): 921-942.

[17] Newett L, Churchill B, Robards B. Forming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Tinder, a new tool in young Australian intimate life[J].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54(3): 346-361.

[18] Wang Y. Playing live-streaming ‘love games’: Mediated intimacy and desperational labour in digital China[J].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021, 30(5): 621-632.

[19] 白昊石 , 黄顺铭 , 刘祖瑞 . “养火”：虚拟中介物与电子亲密关系 [J]. 新闻与写作 , 2023(7): 86-96.

[20] Yan Q, Yang F. From parasocial to parakin: Co-creating idols on social media[J]. *New Media & Society*, 2021, 23(9): 2593-2615.

[21] Thorpe H, Jeffrey A, Fullagar S, et al. “We seek those moments of togetherness”: Digital intimacies, virtual touch and becoming community in pandemic times[J].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23, 23(7): 3419-3436.

[22] Smith N, Snider A M. ASMR, affect and digitally-mediated intimacy[J].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019, 30: 41-48.

[23] 陈晨 , 张扬 . 乙女游戏情感叙事中的虚拟亲密关系——基于《恋与深空》与青年女性玩家的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 2024(8): 24-33+23.

[24] 王鑫 .“情深而文明”与人机共生中的主体性 [J]. 探索与争鸣 , 2024(12): 9-12.

[25] 常江 . 媒介尚古主义：后人类状况下的人类文化行动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62(1): 57-65.

[26] Mendelson E A. Sensemaking and public intimacy on TikTok: How viral videos influen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fline[J]. *New Media & Society*, 2024, 26(12): 7081-7099.

[27] 蒋俏蕾 , 凌绮 . 数智时代的“亲密”：媒介化亲密、亲密资本与亲密公众 [J]. 山东社会科学 , 2023(3): 87-96.

[28] Şotİ. Fostering intimacy on TikTok: a platform that ‘listens’ and ‘creates a safe space’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2, 44(8): 1490-1507.

[29] Jurgenson N. When atoms meet bits: Social media, the mobile web and augmented revolution[J]. *Future Internet*, 2012, 4(1): 83-91.

[30] 拜厄姆 , N. K. 交往在云端 : 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第 2 版)[M]. 董晨宇 , 唐悦哲 , 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20: 111.

[31] Dalessandro C. Internet intimacy: Authenticity and longing in the relationships of millennial young adults[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18, 61(4): 626-641.

[32] 沈毅 . 网络空间、文化型构与亲密关系变迁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2024(19): 43-54.

Uniting the "Intimate Public":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ife Order

Tian Hao

Abstract: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has created a context for human intimacy that is both daily and trivial, calling for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Different from various online intimacy, digital intimacy breaks through the liquid concept set by technological pessimism and encourages individuals to explore the boundarie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based on intelligent algorithms. In terms of practice, digital intimacy presents basic trends such as the pluralization of forms, the experientialization of strategies, and the personification of objects. Furthermore, adhering to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digital intimacy to cultivate a positive emotional ego and unite the digital intimate public has a distinct intervention value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 orders of feeling.
Keywords: digital intimacy; intelligent algorithm; intimate public; emotional ego; orders of feeling
Author: Tian 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ed Media, Fudan University.

（上接第 24 页）

shift, which comes from the collusion of technology supply, individual demand and capital logic. The phenomenon of "intimate famine"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is manifested as relationship overload and emotional deficit, deep bond resolution and existential anxiety.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include the trust crisis of algorithm mediation, th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liquid modernity, and the confusion of virtual and real cognitive frameworks. The deeper logic is exactly the digital mirror of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ity. The global sweep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has promoted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emotions, brought about problems such as emotional false satisfaction, alienation of efficiency-ism and hidden exploitation, and caused emotional alienation,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dissolution of ethical order.
Keywords: digital age; Intimate relationship; Intimate famine; Emotional capitalism; neo-familism
Author: Zhang Xuelin, 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Developm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域外智库涉“一带一路”文本的叙事时间焦点与情感表征 1)

宣长春　侯雨飞

摘要　时间是叙事的核心要素，不仅承载着信息，更蕴含丰富情感色彩。然而，文本的时态使用是否能够反映情感变化、又将如何反映等问题鲜少引起学界关注。本研究基于时间焦点理论，通过计算方法分析2090份域外智库涉“一带一路”文本，发现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具备情感表征功能。整体上看，域外智库对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的使用均正向预测情感倾向。将空间距离作为调节变量时，研究发现，若近距离国家智库愈是关注历史叙事和当下情境，通常预示着更积极的情感表达，但此种正向预测效应会随着距离拉大而减弱。将国家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时发现，共建国家智库对历史与当下的关注正向预测其情感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域外智库对倡议未来的关注，始终稳健地正向预测其情感倾向。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域外智库文本的叙事时间焦点与情感表征之间的隐性联系，这为迅速识别和评估智库情感倾向提供新路径，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涉“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

关键词　“一带一路”；域外智库；叙事时间焦点；情感倾向；空间距离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宣长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厦门 361005；侯雨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全球智库对倡议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域外智库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不仅拓宽了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视角，也形塑着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框架和未来预期，并最终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1]。

作为知识生产机构和意识形态机器，智库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愈发显著。它们对于特定事件的情感立场和倾向，已成为塑造国际关系动态的关键因素。这种情感的生发与流动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中的身份认同和理念认同[2]，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和合作前景。受政治立场、经济利益、文化背景、空间距离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域外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诠释纷繁多样，并衍生出不同情感倾向。在涉华研究中，部分有影响力的智库常透露着明显的负面情感色彩，不仅会诱使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话语建构与传播效果研究”（24FXWB017）。

解出现偏差，更有可能损害“一带一路”的国际声誉，从而阻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的国际合作及全球伙伴关系构建[3][4]。因此，细致剖析潜藏于域外智库文本的情感倾向，对于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优化“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域外智库文本的情感面向，更鲜有学者将智库文本的行文叙事与内隐情感相勾连，这为本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在此背景下，时间焦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键切入口。根据该理论，个体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关注，与其情感特征存在紧密关联。智库文本作为特定主体的智力产物，对叙事时间焦点的选择同样可能折射潜在的情感态度。由此可合理推知，时态（tense）不仅是一种语法现象，更是一种叙事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立场和情感[5]。已有学者通过量化方法对文本的语词使用展开分析，进而判断作者的观念与态度[6]，这为利用文本预测智库情感倾向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本研究拟从叙事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以时间焦点理论为基础，通过计算方法，分析全球智库文本中的叙事时间焦点样态，挖掘时态使用与情感表征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规律性联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智库文本情感倾向形成机制的理解，也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评估全球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舆论与情感倾向，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智库的情感倾向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舆论主体呈现多元化样态，意味着研究“一带一路”国际舆论生产与扩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媒体，素有“思想库”之称的智库也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7]。在西方，智库被誉为“政府外脑”，它们为政府和公众提供智慧支持，左右着政治议程和公众舆论。过去几十年间，西方智库及类似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的数量和规模呈几何型增长，形成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和可观的舆论影响力[8]。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面临来自国际上不断升级的舆论战和认知战，域外智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作为根植于特定意识形态土壤的产物，智库的研究文本中难免内隐着情感倾向。整体来看，各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情感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国别性差异[9]。多数国家的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认为该倡议将极大改变全球不平等的发展格局，重构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新秩序[10][11]。不过，也有部分智库因受冷战思维、现实利益冲突、政治意识形态差异的束缚，长期以怀疑和对抗的姿态审度“一带一路”，其中以美国智库为典型[12]。有智库企图借助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通过设置全球议程，影响和形塑他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只有细致把握智库的情感动态，我们才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提供更加精准的策略指导，促进倡议在全球范围内的理解和接受。

（二）文本中的时间表意机制及其内在逻辑

时间是一切叙事的要素，贯穿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并深刻嵌入人类的知觉、情感与行为之中[13]。早期，人类将时间视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实在。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跳脱出自然时钟的循环，具备了改造时间的能力，自然时间开始向话语时间跨越，时间越来越多地承载人们的体验、认识、价值观念等[14][15]。基于对话语时间的认知，社会学的“社会时间”概念强调了时间的社会构建性，认为时间不仅是自然流逝的序列，更是社会互动和文化实践的产物，对时间的表述和感知受到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传播学的“叙事时间”则关注时间在叙事文本中的具体运用，探讨作者如何通过时态的选择来构建故事的连贯性和情感深度。在语言学领域，时间被视为叙事的基本构造，作者对时态的运用，不仅折射出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微妙联系，也是叙事的陈述时间与感知时间、叙事跨度、叙事手法等核心叙事元素的表征[16]。有研究发现，在英文学术写作中，作者对不同时态的使用能够体现其态度[17]，这初步证明了文

本中的时间表述是隐蔽的表意符号。

陶斯齐克（Yla R. Tausczik）和彭尼贝克（James W. Pennebaker）指出，语言使用模式可以反映个体的认知过程和情感状态[18]。博伊德（Ryan L. Boyd）和彭尼贝克的研究则表明，时间导向的语言使用可以反映个体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经验[19]。作为时间在文本中的表征，时态在语言和认知中发挥着“隐喻”功能。例如，人们通常会将“向前”（forward）这一具有积极属性的词语与“未来”相关联，“向后”（back）这一潜藏消极意涵的词语则多用以表示回望与反思历史[20]。在传播学领域，已有研究关注到文本中不同时间框架的传播效果[21][22]，但仍未有学者从传者的角度出发，考察叙事时间框架背后的情感表征机制。

（三）叙事时间焦点与情感表征的潜在关联

时间的表意机制使得叙事的时间焦点特征具有预测情感的可能。所谓时间焦点（temporal focus），是指人们将注意力资源放置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程度[23]。希普（Abbie J. Shipp）等人在研究时间焦点时指出，个体对不同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注意力分配，能够显著预测他们对信息的感知和形成态度的方式[24]。例如，偏好使用过去时态的作者可能更倾向于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而频繁使用将来时态的作者可能更憧憬于未来。因此，文本中的时态使用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时间感知和情感态度的语言表征。

时间焦点取向与情感态度密切相关。卡利索－罗梅罗（Carmen Callizo-Romero）等人的研究表明，对过去、未来的重视程度会影响个体的情感、态度和行为[25]。一般而言，面向未来的人通常会感到更满意[26][27]。以北美为例，线性的时间思维使得当地人普遍认为“未来不断逼近，而过去则无可避免地逐渐远去”，并坚信“未来的重要性超越了过去”，所以对未来的憧憬远胜于对过去的怀念[28][29]。换言之，当地人对未来的讨论预示着更加积极的情绪表达[30]。相反，那些习惯性沉浸于往昔回忆的个体，常常流露出更为明显的消极情感，可能是由于他们频繁对过往的负面经历展开深度反思[31]。此外，有研究表明，以“眼下”为行动导向的个体较为务实，因为当下发生的事情总在提醒人们把握机会，并以积极心态面对之[32]，故专注当下可能更多预示着理性的参与，而非情感的驱动[33]。当然，上述推论并不绝对——例如，同样是刻画历史时刻，有些文本流露出后悔情绪，有些则充满怀旧温情[34][35]；面对未来时，部分个体心怀希望，也有部分人被恐惧所笼罩[36][37]，这些都是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时间焦点深刻影响着个体如何感知和评价某一事件。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可以合理猜测，文本中的时态使用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作者以及所属机构和国家的情感倾向。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语境下，将时间焦点视角融入域外智库文本分析，或有助于我们洞悉其情感态度及背后更深层次的意涵。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在域外智库涉“一带一路”文本中，时间焦点特征是否能够预测其情感倾向？如是，不同的时态使用将如何反映其情感倾向？

（四）国家类型和空间距离的调节效应

在尝试探索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与其情感倾向间的潜在关联时，我们还应将研究视角扩展至更广泛的背景因素。一方面，作为一个先赋因素，空间距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感知和理解，因为地理上的远近往往与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文化交流的频率、经济合作的密切程度等紧密相关。这种物理距离可能会转化为心理距离，进而影响智库的情感倾向和时态选择。另一方面，国家类型作为后致因素，反映了智库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这些背景因素深刻塑造着当地智库的观点和分析框架——它们可能因其国家的战略利益、外交政策和历史经验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不同的情感色彩和立场。

1. 空间距离的调节作用

空间距离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基础性因素，深刻影响着国际间的互动与交流[38]。已有学者强调要关注“空间”在“一带一路”研究中

的重要角色[39]。托布勒（Waldo R. Tobler）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确立了空间关联性的解释框架，认为世间万物皆存在关联，且此种关联性在空间上呈现出近强远弱的特性[40]。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空间上的邻近性不仅塑造物理层面的要素流动，更通过文化共振效应深刻影响群体间的符号互动模式。作为托布勒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实证延伸，距离衰减效应（Distance Decay Effect）进一步揭示了空间阻隔对跨区域交互的抑制作用：随着地理间隔扩大，信息传递的边际成本递增，导致远距离群体间的认知协调难度显著提升[41]。由此可见，空间距离不仅在物理层面上界定了主体间的相对位置，更在心理层面影响着彼此的关系、思想和情感[42]。

空间距离对他国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根据托布勒地理第一定律，空间上的邻近性通常能够降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互动成本，提升接触频率，进而产生文化、语言、宗教等领域的外溢效应，促使共享象征系统的形成，最终增进相互理解与认同，使彼此间的情感纽带更为紧密[43]。近距离的空间关系还能够有效减少信息损耗与噪声干扰，为信任的构建提供有利条件[44][45]。基于此，那些在空间距离上与我国相近的国家，更有契机与我国开展广泛且深入的经济、文化及政治交流，并在互动过程中深化对中国倡议的理解，增强彼此间的信任[46]。反之，空间距离较远的国家由于相对缺乏与中国直接交流的机会，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不够全面深入，其情感倾向更易受到空间距离的消极影响。此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疑虑与戒备心理，这表明远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形成阻碍[47][48][49]。由此合理推断，在空间距离上与我国更为接近的智库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分析与评价时，更有可能展现出较为积极的情感倾向。

不过，也有部分研究揭示了“距离悖论”（Distance Paradox）的存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为“地理邻近导致冲突”的命题提供了多重理论支撑。例如“国家有机体”理论认为，地理邻近国家必然因生存空间竞争产生结构性矛盾[50]；“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进一步指出，相邻国家由于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依存性，而更易形成安全困境[51]。这种地理宿命论可用以阐释日本、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疑虑——二者均将倡议视为中国重塑区域权力格局的地缘工具[52][53]。基于此视角，空间距离上的邻近可能会阻碍距离较近的智库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情感。反之，适度的地理间隔可能形成“战略缓冲带”——对于遥远国度及其智库而言，由于彼此间缺乏地缘意义上的直接竞争或冲突关系，反而能够使其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中国倡议，促进其对倡议产生美好憧憬与积极评价。例如，Philip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地理距离较远反而有利于建立合作关系[54]，维持恰当距离能够为合作开展以及相互认同创造有利条件[55]。在“一带一路”研究领域，丁立等人发现，尽管英国在空间距离上与中国相隔较远，但英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整体持肯定态度[56]；同样，德国等欧盟国家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有限，对倡议的理解和兴趣点也与我国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整体上仍认可倡议的作用和价值[57]。这些实证案例均表明，空间距离对情感倾向的影响，并非完全遵循刻板认知中的“近亲远疏”假设，其作用机制更为复杂多元。

扼要言之，在研究全球智库文本的情感倾向时，我们有必要将空间距离纳入考量，观察空间距离如何影响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与情感倾向之间的关系。故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2：空间距离是否影响域外智库涉“一带一路”文本的时态使用特征？

RQ3：空间距离是否会调节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与情感倾向之间的关系？如果调节，该变量是如何发挥调节作用的？

2. 国家类型的调节作用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诸多理论与视角被用于剖析国家间的互动模式、认同构建以及合作成效。其中，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石。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了人类在社会分类中的自然倾向，即会自发地将自身归属于特定群体（内群体），并与其他群体（外群体）区分开来。在分类过程中，个体往往对内群体表现出偏爱，对群体外成员则较为疏离[58]。这种心理与情感层面的区分，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认知与态度，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动态变化[59]，其中包括域外国家及其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图式：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建国家而言，它们更易建立起“合作图式”认知框架，因此相关信息容易被同化吸收；相反，非共建国家由于缺乏直接的合作体验和共同利益纽带，则容易启动“竞争图式”，导致认知排斥与对抗式解读[60][61]。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与其合作的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各自独立，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同共同体。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合作机制的建立，这些国家经历了身份上的重新范畴化，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62]。这种共同身份的建立，不仅促进了认同感的形成，还加深了相互理解与尊重，为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有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共建国家，共建国家的媒体报道情感更正面[63]。整体来看，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倡议的国家，对倡议的未来前景多持乐观态度，其积极情感可能以将来时态使用为表征[64]。然而，鉴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部分共建国家或地区（如东南亚和中亚各国）虽承认倡议的显在利好，但也对中国移民可能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等问题产生隐忧。这些复杂因素的存在，使得前述论断不一定如预期般成立[65][66]。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尚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外群体”国家而言，尽管其已目睹“一带一路”为全球共同繁荣作出的卓越贡献，但多数仍出于固有偏见或资源竞争等因素，对倡议持对抗和抵制态度。此类国家擅长在历史事件中挖掘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元素，并通过扭曲式加工生产出诸如“新马歇尔计划”“债务陷阱论”等隐喻概念，试图以此抹黑中国[67]。例如，印度媒体长期以来对“一带一路”报道进行负面加工，将中国歪曲为欺凌弱小的蛮横者[68]；该国智库“观察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还曾以描述“古代朝贡体系”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进行不当解读[69]。此类污名化文本的产制动机与该国智库宣扬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70]。美国智库则通常侧重关注倡议建设现状及其潜在影响，并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如与“马歇尔计划”相联系）来评估其风险和挑战[71]。从这个角度出发，非共建国家智库或许倾向于通过更多使用过去时态来建构负面叙事，向外界传递其对“一带一路”抱持的消极情绪。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4：国家类型差异（共建国家/非共建国家）是否影响域外智库涉“一带一路”文本的时态使用特征？

RQ5：国家类型差异是否会调节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与情感倾向之间的关系？如果调节，该变量是如何发挥调节作用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域外智库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调研报告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具体操作上，借助Pysentiment库来使用Harvard IV-4英文通用情感库，进而对涉“一带一路”智库样本进行情感计算。目前，借助Harvard IV-4英文通用情感库开展“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文本分析在相关研究领域已较为普遍，充分证明该方法在情感分析方面的有效性与可行性[72][73]。

（二）数据来源

研究者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20》（*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以美国、英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为主要的非共建国家选取高影响力智库，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南非、意大利为主要的共建国家选取高影响力智

库，在其官网中检索目标文本数据。研究者以“one belt, one road”“OBOR”“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ilk road”“new silk road”等不同表述为关键词，搜索时间设定为 2013 年 9 月至 2024 年 6 月，数据结果包括标题、发布机构、年份、日期、发布地点、发布国家、作者与正文等。

在清洗筛选方面，鉴于研究涉及国家众多，因此智库来源的便利性和权威性就成为筛选样本的重要考量。从便利性视角出发，本研究仅择取英语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原因在于，英语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仅针对以英语撰写的智库文本展开分析，具备高度的代表性；与此同时，此种方案能够减轻研究过程中的文本处理负担。从权威性层面考量，研究者借鉴既往研究对全样本国际报刊的数据处理方式[74]，对所涉域外智库机构逐一进行甄别：首先，我们分析第一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发现所涉机构均为权威机构。然后，我们对第一母语非英语的国家进行筛选，剔除非权威智库发布的文本。最终保留 2090 条智库文本。

（三）变量测量

1. 解释变量：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

本研究的时态使用数据来源于上述智库样本中涉“一带一路”文本。研究聚焦 LIWC 词典中的时间导向维度，具体包括过去焦点（focus past）、现在焦点（focus present）和未来焦点（focus future）三个子词典，旨在量化分析文本中时间视角的分布。具体而言，过去焦点组包含 90 个词汇，如“was、were、ago、already、did、had”等；现在焦点组包括 91 个词汇，如“am、are、be、do、does、is、now、present”等；未来焦点组则包含 92 个词汇，如“ahead、expect、going、foresee、gonna、will”等。该方法已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可靠性强[75]。技术操作上，首先，统计文本中涉及不同时间焦点信息的词频；其次，计算与时间焦点相关的词汇在全文词汇总量中的占比（单位为“%”）。从总体样本看，$M_{过去}=2.19$；$M_{现在}=3.10$；$M_{将来}=1.04$。

2. 被解释变量：情感极性

情感极性是情感分析中考察文本情感倾向的重要变量。在进行情感计算时，首先利用 Pysentiment 库读取智库文本数据，将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将长文本解构为独立的词汇单元。随后，借助 Harvard IV-4 英文通用情感库，该库对英文词汇进行了积极和消极的情感极性标注，Pysentiment 库会将分词后的每个词汇与 Harvard IV-4 库中的词汇进行匹配。匹配过程中，统计出文本中属于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数量，用于计算情感极性。常用的计算公式为：（积极词汇量 - 消极词汇量）/（积极词汇量 + 消极词汇量）[76]。从总体样本来看，$M_{情感极性}=-0.16$，$SD_{情感极性}=0.39$。

3. 调节变量

(1) 国家类型。本研究依据研究目的将所有样本涉及的国家划分为两类，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非共建国家，确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有 64 个，其他为非共建国家，这种划分参照的是国际关系学者王义桅教授的分类方式[77]。64 个共建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蒙古、哈萨克斯坦等。本研究依据这一名单对 2090 个样本进行逐一编码，其中在名单上的国家为“共建国家”，编码为“1”；不在名单上的国家为“非共建国家”，编码为“0”。

(2) 空间距离。借鉴綦建红、杨丽的思路，依据中国首都北京与样本中各国首都地区的球面距离测算而得[78]，该测量方法已被众多权威研究采纳[79][80][81]。具体数据来源于法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 CEPII 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各国首都或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数据，以千米为单位。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研究使用 SPSS 27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由表 1 可知，当域外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展开调研分析时，多采用现在时态（$M_{现在}=3.10$，$SD_{现在}=1.20$）；过去时态（$M_{过去}=2.19$，$SD_{过去}=1.02$）的使用频率次之；将来时态（$M_{将来}=1.04$，$SD_{将来}=0.64$）的运用频率最少。整体来看，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N=2090)

主要变量	M ± SD	1	2	3	4
1. 情感倾向	−0.16 ± 0.39	1			
2. 过去时态	2.19 ± 1.02	−0.011	1		
3. 现在时态	3.10 ± 1.20	0.097**	−0.007	1	
4. 将来时态	1.04 ± 0.64	0.152**	−0.069**	0.249**	1

注：*p<0.05，**p<0.01，***p<0.001

域外智库在讨论“一带一路”时偏向评价型叙事，而非预测型叙事。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智库对过去时态的使用与情感倾向无显著相关（$p > 0.05$），现在时态（$r = 0.097, p < 0.01$）、将来时态（$r = 0.152, p < 0.01$）则与情感倾向呈正相关态势，即智库文本越频繁使用现在时态或将来时态时，其情感倾向越正面。上述结果初步回答了 RQ1。不过，尽管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与智库情感倾向的相关性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但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较小，相关性较弱，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异质性较为明显。

（二）共线性检验

在样本回归分析中，实施共线性检验以评估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状况。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临界值 5；容忍度介于 0.934—0.995，均高于 0.1 的最低标准；最大条件指数为 8.312（小于 30 警戒值），且任意两个变量在同一维度上的方差分解比例未同时超 0.5。由此可见，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共线性问题，各变量具备独立解释能力，效应估计准确，后续模型预测结果具有可靠性与可信度。

（三）时间焦点对情感倾向的影响机制分析

1. 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特征对情感倾向的影响

表 2 是以情感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旨在揭示域外智库的时态使用特征对其情感倾向的影响程度。如表所示，过去时态使用对智库情感倾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 > 0.05$），现在时态（$\beta = 0.063$，$p < 0.01$）和将来时态（$\beta = 0.136$，$p < 0.001$）则显著正向预测智库情感倾向，上述结果完整回答了 RQ1。不过，这种基于整体样本构建的回归分析模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样本内部由于空间距离及国家类型差异所导致的异质性问题，因此解释力有限。为克服上述局限，研究引入空间距离和国家类型作为调节变量。

表 2　三种时间焦点对情感倾向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模型	B	SE	β	t	p
常量	−0.313	0.031	–	−10.071	< 0.001
过去时态	0.000	0.008	−0.001	−0.052	0.958
现在时态	0.020	0.007	0.063	2.823	0.005
将来时态	0.083	0.014	0.136	6.076	< 0.001

注：因变量为智库情感倾向，模型整体 R^2=0.027，F=19.066，p<0.001。

2. 空间距离对智库时态使用特征的影响

为回答 RQ2，即“空间距离是否影响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特征”这一问题，研究以空间距离为分类标准，对智库文本中三种时态的使用特征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首先，正态性分布检验结果显示，域外智库对三种时态的使用情况均服从正态性分布。随后，研究借鉴綦建红等人的做法，将空间距离根据均值分组，地理距离小于或者等于均值的国家 / 地区集合定义为“近地理距离组”，反之定义为“远地理距离组”[82]，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校验两组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近 / 远距离智库在过去时态使用层面不存在显著差异（$M_{近-过去时态} = 2.19$，$M_{远-过去时态} = 2.18$，$p = 0.83$，95%CI =[−0.098，0.079]，区间内包含 0），但在现在时态（$M_{近-现在时态} = 2.82$，$M_{远-现在时态} = 3.32$，$p < 0.001$，95%CI =[0.405，0.608]）和将来时态（$M_{近-将来时态} = 0.97$，$M_{远-将来时态} = 1.10$，$p < 0.001$，95%CI =[0.082，0.191]）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言之，地处远距离国家的智库会更多地使用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但在过去时态使用方面，近 / 远距离国家的智库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空间距离调节下，时间焦点对情感倾向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SE	β	SE	β	SE
常量	−0.119***	0.027	−0.107***	0.028	−0.115***	0.025
主观倾向	0.139***	0.016	0.138***	0.017	0.133***	0.016
积极语调	0.076***	0.008	0.074***	0.008	0.073***	0.008
消极语调	−0.249***	0.008	−0.248***	0.008	−0.244***	0.008
过去时态	0.021**	0.007				
过去时态 * 空间距离	−0.016*	0.007				
现在时态			0.013*	0.006		
现在时态 * 空间距离			−0.010	0.006		
将来时态					0.043***	0.011
将来时态 * 空间距离					−0.010	0.011
F	189.922		187.657		190.108	
R^2	0.354		0.351		0.354	

注：*p<0.05,**p<0.01,***p<0.001

3. 空间距离在时态使用特征对情感倾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空间距离如何调节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对情感倾向的影响（即 RQ3），研究参照 Bootstrap 调节检验方法 [83]，使用 PROCESS 宏程序进行数据处理，将自变量（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将来时态）、因变量（情感倾向）、调节变量（空间距离）和控制变量依次选入相应的选项框后，选择“模型 1”，样本量设定为 5000，置信区间选 95%，Bootstrap 的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结果如表 3 所示，空间距离和过去时态使用的乘积项（$\beta = -0.016$, $SE = 0.007$, $p < 0.05$）、空间距离和现在时态使用的乘积项（$\beta = -0.010$, $SE = 0.006$, $p < 0.1$）对智库情感倾向的预测作用较为显著，空间距离和将来时态使用的乘积项（$\beta = -0.010$, $SE = 0.011$, $p > 0.05$）无法预测智库情感倾向。更进一步看，空间距离的调节效应量如表 4、表 5 所示。

表 4 空间距离在过去时态使用与智库情感倾向之间的调节效应

空间距离	β	SE	t	p	LLCI	ULCI
M − 1SD	0.037	0.009	3.978	0.000	0.019	0.055
M	0.021	0.007	3.056	0.002	0.008	0.035
M + 1SD	0.005	0.010	0.532	0.595	−0.015	0.026

表 5 空间距离在现在时态使用对智库情感倾向之间的调节效应

空间距离	β	SE	t	p	LLCI	ULCI
M − 1SD	0.023	0.009	2.685	0.007	0.006	0.040
M	0.013	0.006	2.031	0.042	0.000	0.025
M + 1SD	0.002	0.009	0.268	0.788	−0.015	0.020

统计结果显示：①过去时态使用方面：当空间距离较近（$\beta = 0.037$, $p < 0.001$）或适中（$\beta = 0.021$, $p < 0.01$）时，过去时态使用正向预测智库的情感倾向，且随着距离越远，这种正向预测效应呈逐渐受到抑制的趋势；当空间距离较远时，过去时态使用与情感倾向无显著相关（$p = 0.595$，95%CI =[−0.015，0.026]，区间内包含 0）。②现在时态使用方面：当空间距离较近（$\beta = 0.023$, $p < 0.01$）或适中（$\beta = 0.013$, $p < 0.05$）时，现在时态使用正向预测智库情感倾向，且随着距离的拉远，这种正向预测效应呈逐渐受到抑制的趋势；当空间距离较远时，现在时态使用与情感倾向无显著相关（$p = 0.788$, 95%CI =[−0.015, 0.020], 区间内包含 0）；③在将来时态使用和智库情感倾向的关系中，空间距离不发挥调节效应（$p > 0.05$），说明将来时态使用对情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较为稳定。以上完整回答了 RQ3。

4. 国家类型对智库时态使用特征的影响

为回答 RQ4，即“国家类型是否影响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特征”这一问题，研究以国家类型为分类标准，对智库文本中三种时态的使用特征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首先以“国家类型”

为分类依据，将智库所属国划分成“共建国家”和“非共建国家”两组（非共建国家编码为“0”，共建国家编码为“1”），随后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核验两组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共建 / 非共建国家智库在过去时态使用层面不存在显著差异（$M_{共建国家-过去时态}$ = 2.15，$M_{非共建国家-过去时态}$ = 2.21，p = 0.16，95%CI =[−0.026，0.153]，区间内包含 0）；但在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使用层面存在显著差异（$M_{共建国家-现在时态}$ = 2.78，$M_{非共建国家-现在时态}$ = 3.32，p < 0.001，95%CI =[0.442，0.647]；$M_{共建国家-将来时态}$ = 0.96，$M_{非共建国家-将来时态}$ = 1.10，p < 0.001，95%CI =[0.081，0.192]）。具言之，国家类型的差异会影响域外智库涉“一带一路”文本对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的使用：相较于共建国家，非共建国家智库在涉“一带一路”文本中，会更多地使用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但在过去时态使用层面，共建国家与非共建国家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5. 国家类型在时态使用特征对情感倾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国家类型如何调节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对情感倾向的影响（即 RQ5），研究参照 Bootstrap 调节检验方法[84]，使用 PROCESS 宏程序进行数据处理，将自变量（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将来时态的使用情况）、因变量（情感倾向）、调节变量（国家类型）和控制变量依次选入相应的选项框后，选择“模型 1”，样本量设定为 5000，置信区间选 95%，Bootstrap 的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结果如表 6 所示，国家类型和过去时态使用的乘积项（β = 0.049, SE= 0.014, p <0.001）、国家类型和现在时态使用的乘积项（β = 0.026, SE=0.013, p < 0.05）对智库情感倾向的预测作用显著，国家类型和将来时态使用的乘积项（β = 0.004, SE = 0.022, p > 0.05）无法预测智库情感倾向。进一步来看，国家类型的调节效应量如表 7、表 8 所示。

表 6　国家类型调节下，时间焦点对情感倾向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SE	β	SE	β	SE
常量	−0.041	0.032	−0.045	0.036	−0.086**	0.030
主观倾向	0.140***	0.016	0.137***	0.017	0.129***	0.016
积极语调	0.074***	0.008	0.071***	0.008	0.071***	0.008
消极语调	−0.251	0.008	−0.248***	0.008	−0.244***	0.008
过去时态	−0.001	0.009				
过去时态 * 国家类型	0.049***	0.014				
现在时态			0.002	0.008		
现在时态 * 国家类型			0.026*	0.013		
将来时态					0.042**	0.015
将来时态 * 国家类型					0.004	0.022
F	192.136		188.794		190.717	
R^2	0.356		0.352		0.355	

注：*p<0.05,**p<0.01,***p<0.001

表 7　国家类型在过去时态使用对智库情感倾向之间的调节效应

国家类型	β	SE	t	p	LLCI	ULCI
共建国家	0.049	0.011	4.607	0.000	0.028	0.069
非共建国家	−0.001	0.009	−0.057	0.955	−0.018	0.017

表 8　国家类型在现在时态使用对智库情感倾向之间的调节效应

国家类型	β	SE	t	p	LLCI	ULCI
共建国家	0.027	0.010	2.855	0.004	0.009	0.046
非共建国家	0.002	0.008	0.225	0.822	−0.014	0.018

统计结果表明：①过去时态使用方面：对共建国家而言，过去时态使用显著正向预测智库情感倾向，效应量为 0.049（p < 0.001，95%CI =[0.028，0.069]，区间范围内不包含 0）；对非共建国家而言，上述预测效应不显著（p = 0.955，95%CI =[−0.018，0.017]，区间内包含 0）。②现在时态使用方面：对共建国家而言，现在时态使用能够正向预测智库情感倾向，效应量为 0.027（p < 0.01，95%CI =[0.009，0.046]，区间范围内不包含 0）；对非共建国家而言，上述预

测效应不显著（p = 0.822，95%CI =[-0.014，0.018]，区间内包含 0）。③在将来时态使用和智库情感倾向的关系中，国家类型不发挥调节作用（p > 0.05），说明将来时态使用对情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较为稳定。以上分析完整回答了RQ5。

五、结论与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在重塑国际合作版图的同时，也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千层浪。其中，由域外智库发布的涉“一带一路”研究报告，成为影响和形塑“一带一路”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关键力量，左右着全球对中国倡议的认知与态度。本研究以时间焦点理论为学理基础，以域外智库文本的时态使用为切入点，系统考察时间焦点特征对其情感倾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共发现以下三个核心结论：

（一）历史滤镜：认同情境下过去时态情感效价的重构

本研究揭示了国际传播场域中历史叙事的多重社会功能，突破传统时间焦点理论的解释边界。时间焦点理论通常认为，过度关注过去往往与消极情感倾向相关。然而，本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智库舆论环境中，过去时态的情感预测效应是正向的，而非消极的，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认同分化与地理梯度特征：其一，共建国家智库对过去时态的使用显著正向预测情感倾向，而非共建国家智库无此效应；其二，近距离情境下，域外智库对过去时态的使用能够正向预测其情感倾向，但随着距离的逐渐拉远，此种正向预测作用受到抑制，直至消失。这一现象可通过双重视角进行解构分析。

首先，共建国家智库对过去时态的使用显著正向预测情感倾向，这种看似违背时间焦点规律的现象，实则是由于受到群体认同心理的调节。共建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不仅在文化上与我国有着深厚的亲近感，还在政治上共享同一条利益纽带，这有助于促进当地智库深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源、宗旨和未来走向[85]，也有益于巩固他们对自身所属群体（共建国家群体）的认同感。结合具体文本可以发现，当谈及“一带一路”倡议时，共建国家智库倾向于通过过去时态构建“传统友谊－现实合作”的连续性叙事框架，具体包括“丝绸之路”“传统友谊”“过往合作成效”等，将历史交往重构为制度性认同的时间锚点，其本质是通过符号化历史记忆来强化“内群体”认同。例如，新加坡智库 RSIS 于 2014 年发表的报告通过回溯中国发展成就，对“新丝绸之路”政策给予积极评价[86]；南非智库 SAIIA 则通过列举过往双边合作的积极成果，以及历史上曾举办过的“南非年”“中国年”等公共外交活动，表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期盼[87]。

其次，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视角来看，相较于远距离国家智库，近距离国家智库因空间距离邻近性而增强了“经验可及性”，提升了历史叙事的情感传递效率，使得近距离国家智库在地理意义上与我国形成“内群体”，因此会更倾向于通过历史叙事强化与我国的情感联系，以巩固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合作地位。不过，随着距离的逐渐拉远，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开始显现：对于远距离国家智库而言，由于地理距离的阻隔，他们与我国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减少，信息传递的滞后性和失真性增加，过去时态所承载的情感信息难以被有效传递和感知。因此当距离较远时，智库对过去时态使用的特征便与情感倾向无显著相关性，空间梯度效应由此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非共建国家智库和远距离国家智库对于过去时态的使用并未呈现负向预测效应，这表明当前我国在抑制“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古代朝贡体制”等历史隐喻的污名化传播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有效削弱了这些历史隐喻在国际舆论场域中的情感投射强度。从实践策略维度展望，未来或可通过强化“文明互鉴谱系”的历时性叙事，提升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间性共鸣和价值认同。

（二）当下叙事：认同分化、地理衰减与地缘博弈

研究发现，域外智库对现在时态的使用整

体上能够正向预测其情感倾向。这表明，倡议的当下发展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智库的积极情感反应，体现了时间焦点理论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适用性。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机制同样需要拆解细分并结合理论予以分别讨论。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共建国家由于深度参与倡议，在共同推进项目、实现互利共赢的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共同的身份认同。当共建国家智库频繁地采用现在时态时，通常意味它们更加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当前的成就和进展，并展现出对合作现状的满意，因而其情感倾向较积极。相比之下，非共建国家智库虽然更多地使用现在时态，但现在时态对其情感倾向的预测效应并不显著。这是因为非共建国家未与倡议建立起如共建国家那样紧密的合作认同，尽管他们关注倡议的当下动态，但缺乏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的情感连接，使得现在时态所传达的信息难以转化为积极的情感倾向。此外，非共建国家智库的情感倾向特征可能还反映了其矛盾心理，即在积极与消极态度之间摇摆，最终体现为情感上的不明晰。以印度智库为例，作为非共建国家智库的一员，其虽已意识到倡议可能为其带来显著的发展机遇，但出于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的深层忧虑，其在立场和情感上呈现出双重矛盾格局。这种矛盾心理既体现了它对倡议潜在价值的认可，也反映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谨慎态度[88]。若后续研究能够进一步验证这一解释，今后或可针对非共建国家的矛盾心理展开更具针对性的国际宣传策略，通过强化倡议的互利共赢属性，弱化其地缘政治风险感知，从而尝试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体系当中。

从空间距离来看，相较于近距离国家的智库，远距离国家的智库更多地使用现在时态，这可能是因为远距离国家试图通过对当下倡议动态的关注，弥补因地理距离导致的信息滞后和互动不足。然而，这种高频的现在时态使用并不意味着能够有效预测远距离智库的正向情感倾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空间距离较近或适中时，智库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相对顺畅，现在时态所承载的关于倡议当下的积极信息能够有效传递，从而正向预测情感倾向。但随着距离的拉远，地理距离衰减效应逐渐凸显，远距离国家智库与倡议相关主体的交流互动受到限制，信息传递效率降低，情感联系减弱，导致现在时态对情感倾向的正向预测效应逐渐受到抑制。

进一步结合地缘政治理论，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远距离国家智库高频使用现在时态的行为实质上是地缘政治博弈策略在语法层面的一种投射。尽管远距离国家智库通过聚焦现在语境来保持对倡议的参与度，但由于地理距离造成的沟通障碍和情感隔阂，现在时态难以激发积极情感。实际上，远距离智库倾向于采取“去语境化”策略，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当下时期的技术细节层面，而刻意回避对价值内涵的探讨。例如，澳大利亚智库AIIA曾在其报告中采用“技术性聚焦”策略，通过对金砖会议细节的选择性呈现，隐含对倡议的消极认知倾向[89]。这种策略既维持了议题参与度，又规避了价值认同，从而抵消了现在时间焦点原本所具有的预测积极情绪的功能。因此，远距离行为体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语法积极－语义中立/消极”的双层特征，这既是地理距离衰减效应的体现，也是地缘政治博弈在语言层面的具体表现。

（三）未来想象：将来时态积极情感预测的稳健性归因

时间焦点理论认为，个体或组织对未来的关注通常与积极的情感倾向相关联，因为未来常被人们视为充满希望和机遇的阶段。本研究发现，域外智库对将来时态的使用能够正向预测其情感倾向，这一结果与时间焦点理论的核心观点高度契合，且无论以何种方式划分群属，此种正向预测效应仍稳健。这表明倡议的未来发展愿景有效激发了各域外智库的积极情感预期，使其对倡议的未来发展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

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来看，共建国家智库和非共建国家智库作为不同的社会认同群体，在对待倡议时理应表现出显著的身份认知和参与程度差异。无论是否直接参与共建，各国智库均能从倡议的未来规划中感知到积极价值，这种未来愿景超越了基于共建与否的群体认同差异，使

将来时态对情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保持稳定。究其根源，可能在于倡议的未来发展蓝图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无论是共建国家还是非共建国家，都能在其中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潜在机遇，从而引发积极的情感反应。这种超越当前参与身份的情感共鸣，体现了倡议未来愿景在国际传播中的召唤力。

从空间距离差异的视角来看，相较于近距离智库，远距离国家的智库更多地使用将来时态。这一现象可能源于远距离国家在与倡议相关的当下互动和信息获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从而更倾向于将目光投向未来，从未来的视角审视倡议对自身的潜在影响。然而，在将来时态使用与智库情感倾向的关系中，空间距离并未发挥调节效应。这表明，无论距离远近，倡议的未来规划所传达的积极信号均能够稳定地跨越地理距离的障碍，有效激发智库的积极情感。在未来国际传播策略制定中，应强化“未来导向叙事”，应着重突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发展蓝图的描绘，并通过各类传播渠道，将倡议的广泛吸引力和包容性精准传达给各国智库及公众，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国际社会对倡议的积极情感共鸣和参与热情。

（四）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以智库文本的时间焦点特征为切入点，讨论时态与情感倾向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发现，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过去、现在、未来并不是简单的分类变量，而是具有延展性的定距变量，所谓“过去”可以是刚刚发生的事件，也能涵盖遥远的历史，“未来”也同理。这种时间延展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值得进一步展开。

本研究旨在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野与研究视角。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的全球环境中，以批判性语言思维审视国际智库的政策分析报告至关重要，不仅要关注文字的直接表述，更要洞察语言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和动机，以此精准识别并理解其中隐含的战略意图和潜在立场[90]。本研究揭示了智库文本中时态使用与情感态度、价值判断的紧密关联，通过分析时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智库报告中的立场和倾向，从而把握其深层话语意图和潜在战略考量。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时间焦点的多维度特性，包括时间距离感知、时间价值评估，以及时间与情感态度的复杂关系，也可开展跨文化比较分析，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智库文本中的时间焦点特征及其情感意义的差异，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坚实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 Fraussen B, Halpin D. Think Tanks and Strategic Policy-mak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ink Tanks to Policy Advisory Systems[J]. *Policy Sciences*,2017,50:105-124.

[2] Lebow R N. 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5,42:283-31

[3] 宋鹭，孙巧铃，李欣洁．美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新冷战化”趋势 [J]. 现代国际关系，2021(04):53-59+9.

[4] 周文星．美国智库对华政策的认知、根源及其应对——基于智库专家涉华研究的比较分析 [J]. 情报杂志，2023,42(02):57-64.

[5] 金娜娜．时态的评价功能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08):23-26.

[6] Luo Y, Card D, Jurafsky D. Detecting Stance in Media On Global Warming[C]//*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0.* 2020: 3296-3315.

[7] 张文宗，胡晔．中美舆论战与中国的国际传播 [J]. 和平与发展，2022(01):1-15+136.

[8] McGann J G, Messner L. Think Tanks and Global Policy Network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Routledge*, 2023: 419-439.

[9] 牛华勇，王伟豪，尹靖惠．“一带一路”倡议的多维海外认知对比研究：基于欧洲智库文本的分析 [J]. 中国软科学，2024(05):14-26.

[10] 吴泽林．“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性逻辑——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的阐释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09):128-153+160.

[11] 周茂，武家辉，李雨浓，等．共建“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深化——基于沿线国家间的视角 [J]. 管理世界，2023,39(11):1-21+93+22.

[12] 张宁，王静君．聚合与偏离：美国智库和政府部门涉华议题属性网络的比较分析 [J]. 湖北社会科学，2019(12):14-22.

[13] McGrath J E, Kelly J R. Temporal Context and Temporal Patterning: Toward a Time-centered Perspective for Social Psychology[J]. *Time & Society*, 1992, 1(3): 399-420.

[14] 马大康．拯救时间：叙事时间的出场 [J]. 文艺理论研究，2009(03):128-134.

[15] 杨春 . 叙事时间策略和叙事时间维度——张爱玲的时间叙事 [J]. 学术探索 , 2015(2):120−126
[16] 方开瑞 . 叙事时间和语体的传递纬度 : 鲁迅小说英译研究 [J]. 中国翻译 , 2016,37(2):78−84+127.
[17] 陈崇崇 . 英语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时态形式及其意义 [J]. 外国语言文学 , 2010,27(2):82−91.
[18] Tausczik Y R, Pennebaker J W. The Psychological Meaning of Words: LIWC and Computerized Text Analysis Methods[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29(1): 24−54.
[19] Boyd R L, Pennebaker J W. Did Shakespeare Write Double Falsehood? Identifying Individuals by Creating Psychological Signatures with Text Analysi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6(5): 570−582.
[20][24] Shipp A J, Edwards J R, Lambert L 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emporal Focus: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9, 110(1): 1−22.
[21] 张辉 , 纪晓丽 . 新冠疫情新闻叙事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 [J]. 当代修辞学 , 2021(04):42−56.
[22] 陈梁 , 袁聪医 .“现在”还是“未来”？基于时间框架、未来结果的考虑与自我效能的体育锻炼健康传播效果研究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 2022,56(4):5−14.
[23] Bluedorn A C. *The Human Organization of Time: Temporal Realities and Experienc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71.
[25] Callizo−Romero C, Tutnjević S, Pandza M, et al. Temporal Focus and Time Spatialization Across Cultures[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20,27:1247−1258.
[26] Park G, Schwartz H A, Sap M, et al. Living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easuring Temporal Orientation with Languag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17,85(2):270−280.
[27] Shipp A J, Aeon B. Temporal Focus: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2019,26:37−43
[28] Graham R J. The Role of Perception of Time in Consumer Research[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1, 7(4): 335−342.
[29] Spears N, Lin X, Mowen J C. Time Orie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Mexico: Measurement and Insights for Promotional Strateg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2000,13(1): 57−75.
[30] Guo T, Ji L J, Spina R, et al. Culture, Temporal Focus, and Values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2,38(8): 1030−1040.
[31] Holman E A, Silver R C. Getting "Stuck" in the Past: Temporal Orientation and Coping with Trauma[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5):1146.
[32] Zimbardo P G, Boyd J N. Putting Time in Perspective: A Valid, Reliable Individual−differences Metric[M]//*Time Perspective Theory; Review,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Philip G. Zimbardo.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4:17−55.
[33] Zimbardo P G, Keough K A, Boyd J N. Present Time Perspective as a Predictor of Risky Driving[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997,23(6):1007−1023.
[34] Gilovich T, Medvec V H. The Experience of Regret: What, When, and Why[J]. *Psychological Review*,1995,102(2):379−395.
[35] Holak S L, Havlena W J. Feelings, Fantasies, and Memor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Emotional Components of Nostalgia[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8,42(3):217−226.
[36] Snyder C R, Harris C, Anderson J R, et al. The Will and the Wa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vidual−differences Measure of Hop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1,60(4):570−585.
[37] Floyd M, Garfield A, LaSota M T. Anxiety Sensitivity and Worry[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5,38(5):1223−1229.
[38] 王学玉 . 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0(4):36−53+156−157.
[39] 刘卫东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J]. 地理科学进展 , 2015,34(5):538−544.
[40] Tobler W. On the First Law of Geography: A Repl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4,94(2):304−310.
[41] Pun - Cheng L S C. Distance decay[J].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2016:1−5.
[42] Williams L E, Bargh J A. Keeping One's Distance: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Distance Cues on Affect and Evalua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19(3):302−308.
[43] Won A S, Shriram K, Tamir D I. Social Distance Increases Perceived Physical Sistance[J].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2018,9(3):372−380.
[44] Torre A, Rallet A. Proximity and Localization[J]. *Regional Studies*,2005,39(1):47−59.
[45] Nilsson M. Proximity and the Trust Formation Proces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9,27(5):841−861.
[46] 陈慧敏 , 邓依林 . 中国科技形象的全球呈现与关联因素：基于推特社交媒体平台 2013—2022 年的大数据分析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12):138−148.
[47] 万伦来 , 高翔 . 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经验数据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4,30(05):39−48.
[48] 陈媛 . 荷兰智库的“一带一路”观——海外话语实践建构 [J]. 国外社会科学 , 2021(1):139−147+160−161.
[49][73] 李晓霞 , 宣长春 . 海外英文媒体“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倾向研究 [J]. 新闻大学 , 2022(6):62−74+121−122.
[50] 侯璐璐 , 刘云刚 . 政治地理学中生存空间概念的演变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38(5):637−647.
[51] 郑先武 .“安全复合体”与区域秩序建构 : 一种理论阐释 [J]. 欧洲研究 ,2004(3):38−53+156.
[52] 杜德斌 , 马亚华 .“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 [J]. 地理研究 , 2015,34(6):1005−1014.
[53] 张寅 , 王宏俐 , 李王莹 . 美印智库中的“一带一路”形象研究 [J]. 外语电化教学 , 2022(1):63−69+110.

[54] Roth P, Mattes J. Distance Creates Proximity: Unraveling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Sistance on Social Proximity in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2023,55(6):1372-1391.
[55] Wang H, Schaan J L. How Much Distance do We Need? Revisit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aradox"[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48:263-278.
[56] 丁立，刘泽权．美英典型智库的"一带一路"话语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视角 [J]. 情报杂志，2021,40(6):102-110+81.
[57] 詹霞．德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J]. 外语学刊，2018(6):7-12.
[58] Ellemers N, Spears R, Doosje B.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2,53(1):161-186.
[59] 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4):48-78+156-157.
[60] 史育龙．共建"一带一路"多边合作：进展、挑战与路径 [J]. 当代世界 ,2024(10):64-6.
[61] 朱晨歌，倪峰．"一带一路"、中间地带与美国对华战略博弈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4,42(4):3-27+156.
[62] 陈伟光，王燕．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6):93-112+158-159.
[63][72] 宣长春，林升栋．文化距离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 4918 篇英文新闻报道的情感分析 (2013-2019 年)[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28(6):24-43+126.
[64] Rahman Z U.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J].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2022,22(1): e2298.
[65] Rabena A J. The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Philippines[J].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2018,5(3):683-697.
[66] Kuik C C. Laos's Enthusiastic Embra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J]. *Asian Perspective*,2021,45(4):735-759.
[67] Yang M, Wang Z. A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ed by Environmental News in The New York Times[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2023,10(1):1-12.
[68] 赵永华，郭美辰．策略性叙事中的国际新闻驯化：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分析 [J]. 国际新闻界 ,2020,42(8):49-65.
[69] Saran S. India Se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What It Is: Evidence of China's Unconcealed Ambition for Hegemony. [EB/OL]. (2018-02-09) [2025-02-19].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see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for-what-it-is-evidence-of-chinas-unconcealed-ambition-for-hegemony.
[70] 章立明．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研究导向、人员构成和影响力研究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6(6):134-142.
[71] 朱永彪，王俊超．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实施十年来的认知评析 [J]. 情报杂志 ,2023,42(12):83-92.
[74] 宣长春，杜璇，经羽伦．多重距离框架下世界各国新闻媒体"一带一路"新闻情感倾向：同质与异质偏好的双重效应（2013-2020 年）[J]. 新闻界，2022(10):52-63.
[75] Gamache D L, Mcnamara G. Responding to Bad Press: How Ceo Temporal Focus Influences the Sensitivity to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of Acquisi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9,62(3): 918-943.
[76] 刘逸爽，陈艺云．管理层语调与上市公司信用风险预警——基于公司年报文本内容分析的研究 [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18,33(04):46-54.
[77] 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6.
[78][82] 綦建红，杨丽．中国 OFDI 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 [J]. 经济地理，2012,32(12):40-46.
[79] Malhotra S, Sivakumar K, Zhu P C. Distance Factors and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ket Potential[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09,26(6):651-673.
[80] 方慧，赵甜．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经营方式研究——基于国家距离视角的考察 [J]. 管理世界 ,2017(7):17-23.
[81] 刘晓凤，葛岳静，赵亚博．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 [J]. 经济地理 ,2017,37(11):99-108.
[83][84] Preacher K J, Rucker D D, Hayes A F. Addr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 Theory,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2007,42(1):185-227.
[85] 郭瑶函，王东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经典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53(2):296-307+321.
[86] Rana P B. China's Poposals for Trans-Himalayan Connectivity: Consider Four Economic Corridors[EB/OL].(2014-08-01) [2025-02-19]. https://rsis.edu.sg/rsis-publication/cms/chinas-proposals-for-trans-himalayan-connectivity-consider-four-economic-corridors/?doing_wp_cron=1716605514.0035119056701660156250.
[87] Alden C, Yu-Shan W. South Africa-China Relations: Evolving Cooper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ompetition[EB/OL]. (2014-10-06) [2025-02-19]. https://saiia.org.za/research/south-africa-china-relations-evolving-cooperation-collaboration-and-competition/.
[88] 李德杰．印度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分析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7(4):146-152.
[89] Evan Freidin. The Appeal of BRICS: What Draws in Global South Countries?[EB/OL]. (2023-08-15) [2025-02-19].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the-appeal-of-brics-what-draws-in-global-south-countries/.
[90] 孙成岗，陈新．日本智库"一带一路"倡议专题报告标题的批评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6(4):102-109.

Narrative Temporal Focus and Emo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Texts Related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Foreign Think Tanks

Xuan Changchun, Hou Yufei

Abstract: Time is the core element of narration, which not only carries information, but also contains emotional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use of tenses in text can reflect emotional changes and how it will be reflected rarely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Based on the temporal focus theory, this study analyzed 2090 foreign think tanks' texts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ough computational methods, and found that the tense use of think tanks' texts can predict their emotional representation. Overall, the use of present and future tenses by foreign think tanks positively predicts emotional tendencies. When spatial distance is used as a moderator, the study found that if close think tanks pay more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current situations, it usually indicates more posi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but this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weakens with increasing distance. When taking the type of country as the moderator, it is found that the attention paid by the think tanks of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to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positively predicts their emotional tendencie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foreign think tanks have consiste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ir emotional tendencies towards the future of the initiative. This study initially reveals the implic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rrative temporal focus and emo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think tanks and provides a new way to quickly identify and evaluate the emotional orientation of think tanks, which will help China better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elated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eign think tanks; narrative temporal focus; emotional tendency; spatial distance

Authors: Xuan Changch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Hou Yufe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赋权与负能的张力：再思深度媒介化语境下的数据殖民主义[1)]

——基于主体性视角

朱亚希　姚俊臣

摘要　本文立足深度媒介化语境，从“主体性”视角切入，旨在对数据殖民主义的本质内涵及其调适进行重新思考。研究认为，有别于传统殖民通过奴役、劫掠等方式进行资源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单向过程，数据殖民呈现出“一体双面”的特点：一方面，殖民者通过采取一系列精致的“赋权”行动，利用数据主体对于赋权的期待，吸引其默许性地让渡部分主体性，并参与到新型数据关系的生成和维系之中；另一方面，数据主体在寻求更大的主体性的同时，被置于抽象的聚合数据流之中，成为提取剩余价值的手段。由此，数据殖民主义的本质内涵可被描述为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其背后折射出深度媒介化语境下被殖民者所赋之权与主体性剥夺的“负能”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对此，数据殖民主义调适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赋权与负能之间找到兼容各方利益的耦合点，从而达成多元主体之间数据关系及其秩序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数据化；数据主体；数据关系；赋权；默许性让渡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朱亚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1756；姚俊臣，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一、主体性：再思深度媒介化语境下数据殖民主义的切入点

在当前媒介深度嵌入的背景下，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用“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一词概括媒介技术在数字时代的新特征，并以此理解数字媒介在日常生活层面发挥的基础设施作用[1]——它们不仅仅是传播媒介，同时也是不断产生和处理数据的媒介，它们构成了数据化生活的基础[2]。

深度媒介化语境下不断加速的数据化进程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个体的数据生产与消费实践。这些数据实践一方面为激发日常生活中个体的主体性创造开启了新的可能，亦为赫普所期待的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美好生活”（good life）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3]；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数字痕迹的监控形成“全景监狱”，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个体的隐私与安全空间[4]，压制了普通

1）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帝国主义批判视域下国际数字治理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SCJJ24ND002）。

人寻求自我解放与主体性复归的可能性[5]。上述围绕数据实践的巨大张力背后，恰好反映出深度媒介化时代无法回避的个体权利与控制、自由与桎梏的主体性悖论。

近年来，吉姆·撒切尔（Jim Thatcher）、库尔德利和乌利塞斯·梅西亚斯（Ulises A. Mejias）等学者相继使用“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这一理论概念，揭示了数据殖民者通过全球性资源掠夺构建的新型殖民体系，使处于分工底层或资源劣势的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受到直接或间接、显在或隐性的消解和侵蚀的残酷事实。尽管数据殖民实践及其理论正在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的兴趣[6]，但目前国内外学界立足深度媒介化语境探讨数据殖民主义的相关成果仍显零散，研究视角多从宏观思辨和中观建构的层面切入，主题多集中在媒介基础设施[7]、算法传播[8]等面向，忽视了微观个体层面。而当下引发各界持续关注的数据殖民现象，为加深对深度媒介化时代个体主体性悖论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经验例证。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引入“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一新的分析视角,对数据殖民主义展开重新思考。

作为哲学史上一个广泛使用但又充满争议的概念，主体性的理论脉络横跨不同时代和学派，经历了从古希腊哲学的实体论萌芽，经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重构，再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解构的过程，展现出人类对自我认知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性反思。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主体性一般是指“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所具有的能力、地位、作用和特性，是主体彰显自己主体意识、能动性和独立性的特质，也是主体驾驭自身和客体的价值属性和品质属性”[9]。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对主体性的理解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抽象框架，将主体性锚定于生产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核心，揭示了主体性与社会结构的辩证互动，凸显了主体性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实践能力”[10]。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为分析当今社会的主体异化、主体性消解等问题提供了批判工具。特别是随着深度媒介化的进程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全面迁移至数字基础设施之中，主体性问题已经从一种孤立自足的状态，发展为一种动态的、深刻嵌套于技术与社会网络中的交互关系，因而对于主体性的思考亦需要放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与结构之中[11]。

鉴于此，本文立足深度媒介化语境，从主体性视角切入，具体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深度媒介化如何为激发个体的主体性创造可能，并使其成为数据主体？第二，数据主体如何进行主体性实践以实现自我增能？这一做法对于他们与数据权力方的关系以及自身主体性带来了何种影响？第三，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理解数据殖民主义的本质内涵？又该如何调适其负面后果？

二、正向赋权：深度媒介化时代数据权利主体的生成

“赋权”（empowerment），也被称作增权。作为一个源自心理学领域的概念，赋权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意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一般而言，赋权存在个体、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划分。基于本文立足的主体性视角，这里侧重从个体赋权层面展开讨论。

个体层面的赋权强调的是个人效能感（self-efficiency）的提升，从而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和个体控制局面的能力[12]。早在20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预言，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未来，个体将从数字化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并找到新的希望与尊严。正如他所言：“我的乐观主义主要来自数字化生存的‘赋权’本质。数字化生存之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13]。随着当前社会加速迈入深度媒介化时代，尼葛洛庞帝的预言成为现实。有学者指出，数字媒介正推动社会化进入以个体为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在此背景下，个体的力量在无限连接、永久在线中不断聚合、放大，逐渐转变为传播的主体甚至是传播资源的掌握者[14]。可以说，以移动互联网、算法、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社会中个体的赋权和对主体的解放，推动人的主体地位不断

增强，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15]。也有学者强调，数字媒介对于赋权问题的深刻影响在于它的便利性、普及性和深度渗透性。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媒介日益向中低社会阶层扩散，深刻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连接方式[16]，同时使得赋权功能通过用户“选择”“传播”和“创造”等互动行为得到凸显和强化，整个赋权过程变得更加可感知[17]。毫无疑问，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微粒化结构倒逼传统的权力中心向个体节点释权，而个体借助数字媒介在信息获取、知识建构和社会连接等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掌控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权与赋能。

不仅如此，深度媒介化语境下不断强化的数据化趋势还赋予了个体一个新的身份——数据主体（data subject）。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95 年欧盟出台的《数据保护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指代的是可被数据直接或间接识别的自然人。延展至当前的深度媒介化语境，数据主体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穿梭往返已然成为大数据时代的现实图景。可以说，每一个与数字媒介、智能终端连接的个体都是数据主体。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数据主体的行为轨迹、社交图谱与关系互动被实时转为结构化的数据流，经由机器学习模型的特征提取与模式识别，形成动态更新的用户数字画像。这种基于多模态、多层次、全方位的数据构建的认知框架，不仅为数据主体享受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数据服务提供依据[18]，也改变了数据主体在全面数据化趋势下的媒介空间中的存在方式。显然，数据主体充分享有大数据带来的便利、福祉、自由和权益。这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已经通过法律条例保护的形式，将数据主体权利视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和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权利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些国家中，数据主体被赋予包括知情权、访问权、更正权、被遗忘权、数据可携带权、限制处理权、查阅权、复制权等在内的诸多种类数据权利，而所有这些权利都指向深刻的赋权逻辑，即尊重数据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换言之，数据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充分彰显。

三、反向负能：深层遮蔽下主体性的剥夺与侵蚀

（一）默许性让渡：主体性被隐性侵蚀的初始环节

“数据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改造，正在服务业、工业，乃至个人理财、教育、健康、保险等诸多领域同时发生。”[19]正如库尔德利所看到的，深度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数据正广泛、深刻、复杂地参与社会建构。每个人的画像、身体、位置、情绪、行为、社会关系、社会评价等各个维度正在全面数据化[20]。例如，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个体的身体数据能够被实时监测并存储；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个体的认知模式与话语习惯被记录，用以支撑算法系统的数据补充与决策优化。

在社会生活全面数据化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包括平台供应商、电子设备制造商、数据经纪人（data brokers）和各类基于数据提供服务的组织、政府部门在内，致力于通过开发数据而从人类生活中获取利润的“社会量化部门”（social quantification sector）[21]，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数据权力方”，它们能够凭借其技术、资源、平台或法律赋予的特殊地位，对数据的采集、流通与使用施加影响。

相应地，原本拥有对自身数据合法权益的数据主体为了享受到数据带来的优质、便捷的服务，需要依靠自身的数据让渡来置换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自身的数据为数据的个性化服务提供了标签或索引”[22]。而如果不接受这一默认条款，则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准入资格，甚至被挡在相应的服务或社会资源之外[23]，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有别于传统殖民所表征出来的暴力、野蛮，深度媒介化时代的数据控制，并非单纯依赖外部力量的压制或促逼，而是在权利个体看似自愿自如、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主体性默许性地让渡给相关权力主体。这种让渡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日常媒介使用过程中逐渐发生。

不难看出，置身深度媒介化时代，数据主

体之主体性实践在社会生活全面数据化的进程中被显著改变。数据权力方凭借其掌握的数据权力，希望“让个人沉浸在数字世界中”，以达成“确保对个体几乎所有方面的持续控制和管理”这一透明而不公开的目标[24]。而默许性让渡之所以可以被视作一种主体性实践，或许出于这样两个因素：首先，深度媒介化时代，数据主体的信息获取高度依赖各类数字平台。数据主体看似自由选择浏览内容，实则被算法限定在特定信息框架之内，默认由算法介入，甚至主导自己的信息环境。但出于便宜性、时效性等考虑，数据主体整体上还是倾向于选择让渡自主探索多元信息的主体性，以期实现自我意义上的“增能”。其次，各类数字平台持续存在的数据监控以及助长这些监控的公共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数据主体在面对隐私关切等数据权利时表现出不作为、有限行动或矛盾行动的消极接受心态——“数字顺从”（digital resignation）[25]。这种带有默许性的情感反应反过来赋予了数据权力方继续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反过来又强化了数据主体的无奈感和默许性。

可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被媒介“浸透”（permeated）的时代，数据的让渡已经成为每个人无法摆脱的现实。置身于“社会量化部门”所创建的各类数据平台和算法逻辑中的数据主体，在各类数据实践开展过程中自觉地、默许性地让渡一部分主体性[26]，就成为一种被动性的主动选择。而类似这样的情况早已有之。根据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社会契约论”学说，公民在进入社会状态时，往往通过一种权利与权力交换的隐性契约关系，将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出去，形成国家，同时换取国家对其利益或自由的长期保护以及秩序的安全。从同构性的角度来说，没有每个公民对于私人权利的逐步让步构成公共权力，每个人的安全感、自由、利益是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而在安全感、自由、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来谈个体的主体性，显然也是虚空的。

由此可见，在社会全面数据化的背景下，数据主体试图通过权利的默许性让渡一步确立和挖掘主体权利，最终实现个人层面的主体性升扬。然而，当数据主体默许性地让渡出一部分主体性，并使自身获得在数字平台上进行交互的权利后，数据殖民进程却悄然开始。这一进程通常以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的“知情同意”开始。在看似自主、自愿的状态下，数据主体往往未能充分理解条款内容，就在无知的情况下同意将自己的行为、交往、言论等数据交由“社会量化部门”进行处理。这些部门随后利用技术手段对数据主体进行全面量化，最终实现对其个人信息的无偿占有。简而言之，数据殖民活动的起点便是通过数据主体的默许性让渡，进而完成对个人信息的无偿占有。这一过程虽以“技术赋权”为表象，为数据主体提供了对数据更强的掌控感和更高的自由度，却可能伴随着隐蔽的权力剥夺与主体性削弱，带来更深的“负能”危机。

（二）主体性的加剧剥夺：不对称数据关系的生成及其秩序失衡

数据殖民的第二个环节，则是持续性的数据资源掠夺和数据监控环节，它是指在数据主体同意让渡自身数据权利后，其在数字平台上的每一个行为及其留下的身份识别、信息搜索、社交互动、消费决策等数据痕迹，便开始被数字殖民者无偿获取、占有甚至是掠夺，从而形成庞大的数据聚合体。接下来，数据权力方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算法等数字技术将各类虚拟、零散、原始的数据转化为“聚合数据”和“数据流”，同时扮演着社会监控者的角色，完成对数据主体的全景式监控。正如韩炳哲所言：“数据化与网络化的主体成为自己的全景监狱。”[27]可以说，数据权力方打通了从基础设施到分支部门的垂直层级，持续不断地获取、占有用户数据。然而，在收集数据和运行数据过程中，它们很少透露自己是数据采集的受益者，而是通过强调其数据获取的正当性和对个体的价值，来证明自己是唯一有权提取数据的主体，并承诺数据主体将从中获得权利增益。这种说辞类似于历史殖民主义宣称的“文明计

划”所带来的好处，逐渐让被殖民者接受数据被无限掠夺的现实。可以说，被美化的数据掠夺意识形态维系并推动了数据殖民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察觉身处数据殖民的隐性控制之中，逐步舍弃了对自我数据的自主决断。

还需要说明的是，21 世纪的数据殖民不管是在资源掠夺内容还是在控制力度上，都有进一步扩展和加深的趋势。具体而言，传统殖民的掠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奴隶生命活动的直接掠夺；另一部分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而进行生产的那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而数据殖民则是把所有人的生命活动数据都作为原材料。或者说，是通过数据掠夺不断深化、占用人类生命活动，将人类生命活动本身变成生产的一个过程，而不再区分这种生命活动是否为雇佣劳动。从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彻底的掠夺。在此情势下，人的主体性降级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的所有生命活动变成“数据包”，而人本身也变成了“商品”[28]。当人的生命活动成为剥夺的对象，必将带来数据主体主体性更深层次地被剥夺和被侵蚀。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步骤，数据殖民区别于传统殖民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其生成了一种新型数据关系(data relations)及关系秩序。“数据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一个基本节点，本身就映射着一种社会关系，相互交互的数据节点使数字空间边界的扩展成为可能。”[29]深度媒介化时代，建立在数字空间和数据化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使得数据主体的日常生活被数据笼罩[30]，数据主体对数据的依赖以及数字平台对于数据主体数据的商品化，重构了人类以数据关系相连接的新型人际关系[31]。在库尔德利和梅西亚斯看来，数据殖民主义是一种通过数据关系来侵占和榨取社交资源以获取利益的新兴秩序，数据关系的殖民性指明了传统殖民主义遗产是如何在当今通过数据将社会关系抽象化、商品化，进而产生共鸣，并被广泛连接起来[32]。由此可见，这里的数据关系并非一种通过劳动贡献剩余价值的“劳动关系”，而应当被视为广义上社会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并通过数据商品化和资本化背后隐藏的新型人际关系（甚至是人机关系）予以表征，其核心是通过“对互联网规则和环境的设置，建立一种可以稳定地推动数据生产和流动的社会秩序”[33]。深度媒介化时代广泛存在的数据关系为数据殖民主义的形成并发生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数据关系构筑的新型社会秩序中，殖民者根据数据关系反映出来的供需关系重组社会资源，进行社会生产。因而，以数据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殖民者瓜分和掠夺社会资源的新兴关系秩序[34]。

然而，在从“劳动关系的资本化”向“社会生活关系的殖民化”转变背景下而生成的新兴关系秩序，拉大了多个主体间权力、能量占有量的鸿沟，进一步凸显了数据商品化背后多组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关系[35]。这里略举两例加以说明。一是数字平台与数据主体在数据实践展开中结成的非对等权力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数字平台以一种柔性方式全面渗透进个人的日常生活，使人们默默接受数据所有权丧失的结果。以“健康数据化”（ datafication of health ）为例。数字平台通过提供礼品、见解和帮助，鼓励数据主体主动“捐赠”数据，或者宣称数据分享是在为“公共利益”作贡献[36][37]。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数据主体都以数据供给者的身份从事无偿的数字劳动，劳动的成果便是大量可以利用和出售的数据流。自我身体被切割成无数定量的、非语境化的数据，在大多数情形中被秘密地交易[38]。二是政府对于公众的数据监视成为当下数据殖民活动中的重要环节[39][40]。譬如，源自二战期间的“五眼联盟”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共同组建的情报合作联盟。该联盟致力于建立一个所谓的“绝密云端”，构建起覆盖全球的公众数据监视体系。又如，2013 年美国被爆出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擅自监督全球大多数国家数据和公民个人数据的“棱镜计划”（PRISM），一时间在美国各界及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在上述数据实践过程中，原本就游走于“数据金字塔底部”或与精英阶层相对的“属下阶

层”只能盲目、被动地接受数据殖民者指定的生存规则而丢失了自身的主体性[41]。这一过程不仅没有实现所谓的赋权，反而通过隐性机制加剧了数据主体的被支配和被剥夺状态，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负能”。随着权利被数据殖民者持续不断地占有和剥夺，这些属下阶层日益成为数据殖民宰制对象和数据殖民下的“数字愚民”——一种深度依赖数字平台并严格遵循数据规则却无力质疑、改变的社会群体。

四、赋权与负能的张力：数据殖民主义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如前文所述，立足深度媒介化这一语境，从应然层面来看，首先，以“社会量化部门”和政府为代表的数据权力方必须为作为权利方的数据主体赋权和增能，以实现媒介技术为个体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其次，作为权利方的数据主体所赋之权、所获之能同时需要与其让渡出去的权利在社会公正意义上是基本对称的。然而实际上，数据权力方采用了一套精致的“赋权”行动，并利用人们对赋权的期待，吸引无数散落于“微粒化社会”中的数据主体，成为巧妙欺骗中的“自愿的奴隶”（voluntary slavery）[42]，主动或被动地沦为数据殖民活动中的被殖民者，这背后反映出赋权与负能之间的复杂张力。具体而言，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我价值美化下的认知操控。深度媒介化语境下，数据主体的数据让渡行为常常被数据权利方美化为一种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数据权利方借助巧妙的“殖民”包装，将数据主体的行为刻画成自由选择的表现，强调个体效能感的提升和对平台算法的掌控[43]。然而，这种美化叙事遮蔽了深层的数据权力的不平等。数据主体在看似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被动地让渡了主体性，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对数据出让正当性的认同，帮助稳固数据权力方的主导地位。以知名运动应用程序 Strava 为例，Strava 通过将用户的运动数据（如位置、运动路线、心率、能力消耗）转化为社交货币，鼓励其自主构建自己的“Strava 圈”（Strava-sphere）[44]。在数据驱动机制下，用户通过路线排名、成就徽章等量化指标进行自我确证，形成看似正向的激励机制。然而，在这其中约近一半的用户逐渐陷入运动强迫症与数据焦虑的规训困境。平台以“健康生活方式倡导者”为叙事外衣，实质上却将用户异化为实时数据生产节点，适时推出用于出行模式识别、出行需求测算、路线选择分析的商业数据服务“Strava Metro”，制造出更大的用户隐私与安全风险。

二是“个性化”神话下的数据监控。乐观主义者认为，深度媒介化最令人震撼之处就是个性化发展趋势的增强，以及大量的主体意识在各种各样的体制之内与体制之外出乎意料地活跃与复兴起来。对此，肖珊娜·祖波夫（Shoshana Zuboff）却批判性地指出，“个性化”是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核心策略之一[45]。个性化表面上通过让个体相信算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优化他们的决策，实际上是通过持续的数据搜集强化监控，并牟取更多利益。既有研究使用“定制陷阱”（the trap of customization）一词概括大型科技公司运用“个性化”策略，持续增强数据主体体验，以达成其持续的数据监控、广告投放的深层次目的[46]。例如，Meta 被指控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使用算法进行内容管理，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好进行精准喂养，从而生成详细的用户资料，用于后续营销目的。Office 365 和 LinkedIn 也以促进个体的生产力为噱头，大量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以进一步向其推送更具有针对性的广告，然而这一举动却引发了道德层面的争议。

三是“赋权赋能”叙事下的技术依赖。在向深度媒介化的转型过程中，个体的认知与行动能力逐步得以释放，能够更加自如地掌控媒介技术。部分数据殖民者鼓吹数据主体出让数据可以不断提升其创造能力、知识技能，为个人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例如，谷歌等头部互联网公司推出针对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表面上看是在赋能当地民众，促进其能力提升，但无形中却是推动其公司业务的全球性布局。就像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指出的那样，科技产品通过宣扬“数据赋能”将数据主体纳入监控体系。智能技术看似提升了个体能力，实则通过持续的数据监控使个体丧失自主权，强化了对技术生态的依赖[47]。

由此可见，隐藏于积极赋权外衣下的却是对作为权利方的数据主体之主体性非公正性的剥夺和侵蚀。在数据实践和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生成了不对称的数据关系，并不断加剧着关系秩序的严重失衡。换言之，数据殖民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让渡一方与接受让渡一方之间关系秩序的失衡。或者进一步说，是在赋权外衣下，数据主体和数据权力方在主体性让渡及与数据实践相关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关系性秩序失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有别于传统殖民通过奴役、劫掠、杀戮等方式，野蛮、残酷、暴力地进行资源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单向过程，深度媒介化语境下的数据殖民呈现出“一体双面”的特点：一方面，数据主体在寻求更大的主体性时，“甘愿”服从外在强势而隐蔽的权力，在一种自我安慰式的“赋权”想象中，默许式地让渡了主体性。另一方面，殖民者通过采取美化数据让渡的价值、营造个性化选择的假象、宣扬对个体的赋权赋能等一系列精致的“赋权”行动，吸引数据主体默许性地让渡部分主体性，实质性地参与到不平等数据关系的生成和维系之中。只是，如果说主体性的让渡并未换取主体性的成长，就会导致其主体性进一步地被剥夺和被侵蚀。当数据主体被置于抽象的聚合数据流之中并成为提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当数据主体的“自我”被消解并沦为冰冷的数字代码之时，一种更深层次的数字剥削和异化由此产生。因此，数据殖民主义的本质内涵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其背后折射出深度媒介化语境下被殖民者所赋之权与主体性剥夺的“负能”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五、从失衡到动态平衡：数据殖民危机调适的应然指向

作为一种隐喻式的“理论之眼”，想要彻底破解数据殖民的负面危害和后果几乎是不现实的，就像针对传统殖民主义而进行的风风火火的去殖民化探索，同样面临着文化持续渗透、经济结构不平等一系列阻碍去殖民化的影响因素。况且，“在深度媒介化语境中，个体生活的核心特征仍然体现为对数字媒体及其基础设施的根本性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不太可能消失，因为这些媒介并非单纯的中立工具，必须始终结合其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来考量。”[48]因而，本文认为，数据殖民调适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赋权”与“负能”之间找到兼容各方利益的耦合点，从而达成多元主体之间数据关系及其秩序的动态平衡，最大化地减少数据殖民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赋权和去权伴随着每次媒介变革而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重要的不是判断对错，而是追求一种动态平衡[49]。

本文尝试将“公共性”作为寻求数据关系动态平衡的耦合点，其背后的考量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行动要素来看，数据殖民危机调适的核心要素就是数据，尤其是过去被认为是遭受无限制地侵犯、掠夺的海量个人数据。但是从权利本身的规范逻辑来看，个体数据具有极强的交互性、分享性和公共性特点[50]，难以完全成为私有化逻辑下受个人掌控的客体，具有鲜明的非排他性[51]。更何况一旦数据被限定在私权范畴内而脱离关系范畴，个人就无法完成基本的社会交往。二是从参与主体来看，深度媒介化时代对数据共享、开放的现实诉求，客观要求将积极参与数据活动的公民、各级行政部门、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等跨层级、跨地区的主体纳入进来[52][53]，从而可以真正释放数据的公共价值。三是从终极目标来看，尽管看起来应对数据殖民是对数据资源进行再分配、再利用的过程，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回应社会实际需求、优化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治理能力的价值创造过程[54]。因此，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真正实现数据价值的普惠与公共利益的激发应当成为调适数据殖民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的调适路径或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积极推动从数据主体向数据公民的转

换。基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深度媒介化场域中的个体兼具数字主体和数字劳工双重身份，充当生产数据却又被迫卷入数字殖民进程的数据主体角色，遭遇严重的主体性危机。为了回应这种主体性的丧失，信息政治学领域采用“数字公民”这一概念予以调适[55]。循此出发，本文认为，尽管数据依然作为“一种排他性财产的悬设”，但数据主体可以凭借开放的平台合理表达诉求，实现对数据的集体占有，进而成为“数据公民”。因此，在承认数据私权的前提下，挖掘数据的非排他性，支持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从而构建一种多元主体都能够使用数据及其潜能的社会关系，就成为真正能够促进个体主体性成长，并转型成为数据公民的一条可行路径。

具体而言，第一，个体的数据素养和数据使用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在数据政治的博弈中，个体对于数据权利、算法逻辑以及数据使用的知识储备不足，逐渐成为数据不平等关系中的弱者。对此，可以通过自我教育（如网络学习资源）与社会教育（如公共媒体宣传）方式实现“自助”与“他助”赋权的结合，以明确谁对数据享有所有权、决定权、使用权以及各个主体使用数据和从数据中受益的方式。第二，个体应学会使用数据赋权工具，在互动中与数据服务提供者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例如，通过使用 Digi.me 或 Citizen.me 等数据赋权工具参与到自身数据的管理与使用中，并自主选择信赖的数据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成为数据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与关系掌控者。第三，为了激活数据的公共价值，广泛的个体可以协同建构数据合作社（data cooperatives），实践公民身份。数据合作社是西方基于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 theory, ANT）提出的一种数据良治的手段。他们主张公民自愿将他们的数据汇集起来，以创建一个共享的数据互利池[56]。在这种模式之下，个体数据被自发、民主地汇聚起来，通过透明化的治理机制，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再平衡。

二是不断强化数字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公共利益考量。在深度媒介化时代，虽然维护公共利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常见的商业实践被不断纳入数字平台的发展战略中，然而，由于其界定与践行存在高度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承诺往往沦为空洞的口号[57]，平台几乎不可能也不会主动寻求破局以实现根本性的权力转移。因此，从公共性角度寻求平衡平台商业利益追求与公共价值维系的路径，关键在于意识到数字平台不仅仅是数据的收集者和实控者，也需要承担起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的责任。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在确保不伤害个体隐私、数据安全和流程合规的前提下，推动数据的互联互通，有序地开放数据以实现平台内部、平台之间、平台与政府以及个人之间的数据协作与共享。实际上，数据政治早已将数据视为“投资对象”（an object of investment）[58]，既关注数字平台如何服从管理逻辑，也鼓励它们整合数据并开展数据协作来为自己应有的权益申辩[59]。只是目前，数字平台数据运行的“黑箱化”操作严重削弱了用户的信任基础。用户不了解平台收集数据的具体用途，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推动用户纷纷采取策略驯化算法或规避披露真实数据。

因此，为了释放数据的公共价值潜力，数字平台首先需要增强数据运行透明度以重建用户信任基础。数字平台应当公开透明数据采集的范围、用途和流向，而避免要求用户“隐性授权”，提升用户的主体性感知，也可以引入外部独立机构以监督数据使用与流通，确保数据活动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展开。其次，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掘数据的公共价值，努力将数据协作对象扩展到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更多主体上。如运用“差分隐私”（differential privacy）技术向规模化数据中注入有限噪声，使单一用户的数据无法被识别，仅仅保留描述整体数据统计特征的准确性，从而为人口普查、消费力调查、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统计等民生领域提供智识[60]。最后，数字平台需要与各个主体共享数据资产，协同释放数据公共价值。考虑到商业利益，也需要看到数字平台背后的利润导向，以便它们更有目的地共享个体的数据，并获得相应回报。正如数据撒播者（data disseminator）主张将数据转化为公共化的资产，通过数据资产的互联

互通创造巨大效益，从而为数据持续投入的各个主体反哺。

三是加快推进政府在数据监管与公共服务层面的深度融合。如上所述，协同的核心逻辑在于不同角色的参与者所组成的网络，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众多参与者之一，其参与方式不仅在于依靠制定法律和监管数据而实现，还在于把握数据的公共属性，强化政府的服务属性，以促成数据相关利益者的良性互动与协作。需要说明的是，面对深度媒介化时代的数据殖民主义危机，数据监管重疏不重堵。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度的数据活动禁令无法真正为主体性复归与公共性实践建立制度性屏障。另一方面，强有力的监管可能会促成某些技术权贵打着“保护用户”的旗号无限收割个人隐私，由此制造出一个更大的恶。正如塞西莉亚·瑞卡普（Cecilia Rikap）指出，更严格的数据政策可能会加剧数据私有化，进而加固认知壁垒[61]。

因此，为了达成公共性的平衡，首先，政府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数据责任与使用边界。2021 年 6 月，中国审议通过了《数据安全法》，标志着数据开发与应用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国际上，欧盟和美国也制定了类似法律。例如，2018 年欧盟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要求，企业在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相关规定。数据的多方利益关切者始终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活动以最低限度地保障主体性。其次，政府应积极建设可信的数据基础设施，挖掘数据资源的公共服务潜力。和交通、能源、通信等社会基础设施一样，数据在深度媒介化时代越来越下沉为社会的基础设施，趋近于公共服务范畴，而政府的一个重要角色即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正如前文提到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公民通过契约的方式将一部分权利（数据权）让渡给政府，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对这种契约的履行。最后，为了切实解决数据政治中的权力失衡问题，政府需要回到“公共性”的逻辑中，实践民主化参与机制，将公共性嵌入平台算法机制中，强化数据使用的公共性和运行的透明性。例如以组织者的身份组织公民参与和介入平台数据分享、算法制定流程，建立公共讨论机制。

综上所述，如何最大程度上减缓数据殖民的负面后果以及增进个体实质意义上的赋权赋能，绝不能够单纯依靠技术的优化来找到解决方案，更需要从深度媒介化时代主体性的确立与发展、权力结构的迁移与调适以及公共利益的实践与重塑等层面展开一次大讨论。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以公共性耦合个体、平台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塑造一个更加开放、透明与公平的数据社会提供参考。尽管在当下，多元主体协同应对数据殖民的危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学界关于应然层面的思考不应囿于既有范式、框架下的关系检验与模式论辩，而应在促进个体主体性成长的坚定预设下提出更多前瞻性的思考。可以想象的是，未来数据殖民的调适将以一种更加多元、复杂的方式呈现，最终实现全人类主体性的显扬：从个体的数据公民意识践行，到平台的数据公共价值的挖掘，再到政府的数据监管框架的完善，多元主体的协同与耦合将塑造一个更加开放、透明与公平的数据社会。或许，我们并不能一蹴而就地根治数据殖民危机，但每一次对公共性实践的尝试，都是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新的可能。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Couldry N, Hepp A.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J].*Communication Theory*,2013,23(3):191-202.

[2][3][48]Hepp A.*Deep mediatization:key ideas in media & cultural studie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20:158；195；166.

[4]Saravanakumar K, Deepa K.On privacy and security in social media - a comprehensive study[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6（78）:114-119.

[5] 刘冠合，胡景谱．时空、主体与生产：数字媒介的三重维度 [J]. 理论月刊 ,2023(12):32-39.

[6] 吕鹏．数据殖民主义：理论脉络、殖民范畴与治理主体 [J]. 青年记者 ,2023(6):36-39.

[7] 陆国亮．数据殖民的物质痕迹：数据殖民主义理论与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对话 [J]. 新闻界 ,2022(6):86-96.

[8] 陈小燕，陈龙．数据殖民：算法传播与人文精神的消弭 [J].

中国编辑 ,2020(6):36−41.
[9] 宇文利 . 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巩固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10):28−36+155−156.
[10] 俞吾金 . 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两个维度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2):34−40.
[11] 彭兰 . 界限的漂移与主体性的守护 : 智能化内容生产潮流下人的主体性问题反思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5):159−170.
[12] 王斌 , 刘伟 . 媒介与社区赋权 : 语境、路径和挑战 [J]. 国际新闻界 ,2015,37(10):79−91.
[13] 尼葛洛庞帝 .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 , 范海燕 , 译 .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231.
[14] 喻国明 , 耿晓梦 . “深度媒介化” : 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28(12):76−91+127−128.
[15] 喻国明 , 滕文强 , 苏芳 . “以人为本” : 深度媒介化视域下社会治理的逻辑再造 [J]. 新闻与写作 ,2022(11):51−60.
[16] 黄月琴 . 新媒介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 [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6):140−145+164.
[17] 蔡文之 . 网络传播革命 : 权力与规制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22.
[18] 田广兰 .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体权利及其未决问题——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分析对象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34(6):131−141.
[19] 常江 , 田浩 . 尼克 · 库尔德利 : 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数字文化批判 [J]. 新闻界 ,2020(2):4−11.
[20] 彭兰 . “数据化生存” : 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2):154−163.
[21][32]Couldry N, Mejias U A.*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are colonizing human life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M].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13；45−50、84.
[22] 田广兰 .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体权利及其未决问题——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分析对象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34(6):131−141.
[23] 彭兰 . 数字化与数据化 : 数字时代生存的一体两面 [J]. 人民论坛 ,2023(17):42−47.
[24]Palahuta V.Digitalization and mediatization as tools for forming new types of subjectivity[J].*Newsletter on the Results of Scholarly Work in Sociology, Criminology,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2024,5(2):36−47.
[25]Draper N A, Turow J.The corporat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resignation[J].*New media &society*,2019,21(8):1824−1839.
[26] 熊治东 . 数据与信用 : 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信用霸权及其批判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42(6):104−111.
[27] 韩炳哲 . 精神政治学 [M]. 关玉红，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9:75.
[28] 万立明 , 刘菁菁 . “数据殖民” 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3(2):150−160+168.
[29] 李帅 , 李震邦 . 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二律背反 : 技术封建主义抑或数字资本主义？ [J]. 思想理论战线 ,2024,3(3):62−69.
[30] 熊治东 , 刘箭 . 数据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3):133−140.
[31] 陈小燕 , 陈龙 . 数据殖民 : 算法传播与人文精神的消弭 [J]. 中国编辑 ,2020(6):36−41.
[33] 刘皓琰 . 云帝国 : 一个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基于对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的解读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23(1):113−120.
[34] 熊治东 , 刘箭 . 数据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3):133−140.
[35] 肖峰 , 杜巧玲 . 数据殖民主义的学理探察和现实观照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2):14−22.
[36]Ajana B.Digital health and the biopolitics of the quantified self[J].*Digital Health*,2017（3）:1−18.
[37]Dijck V J, Poell T.Understanding the promises and premises of online health platforms[J].*Big Data & Society*,2016,3(1):1−11.
[38]Ruckenstein M, Schüll D N.The datafication of health[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7,46(1):261−278.
[39] 蔡翠红 , 于大皓 . “帝国的新衣” : 世界数字体系下的美国数字霸权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3):4−12.
[40] 何小雨 . 监视资本主义的人学审视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4,45(5):124−132.
[41] 李帅 , 李震邦 . 信息政治学视域下的数据殖民主义研究 [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39(2):33−41.
[42]Palahuta V.Digitalization and mediatization as tools for forming new types of subjectivity[J].*Newsletter on the Results of Scholarly Work in Sociology, Criminology,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2024,5(2):36−47.
[43] 王斌 , 刘伟 . 媒介与社区赋权 : 语境、路径和挑战 [J]. 国际新闻界 ,2015,37(10):79−91.
[44]Couture J.Reflections from the ‘Strava−sphere’: Kudos, community, and (self−) surveillance on a social network for athletes[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2021, 13(1): 184−200.
[45]Zuboff S.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30(1): 75−89.
[46]Ahmadzadeh M.The Trap of Customization: Capitalism Goes Benevolent[J]. *Journal of Cyberspace Studies*, 2024, 8(1): 83−100.
[47]Andrejevic M.*Infoglut: how too much information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ndknow*[M]. New York:Routledge,2013:21.
[49] 胡钰 , 王敏 . 元宇宙中的人际交往：媒介化依赖与主体性重建 [J]. 青年记者 ,2023(4):18−21.
[50] 王锡锌 .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J]. 中国法学 ,2021(1):145−166.
[51] 陈映 . 论个人网络数据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23(6):73−84.
[52] 高翔 . 超越政府中心主义 : 公共数据治理中的市民授权机制 [J]. 治理研究 ,2022,38(2):15−23+123−124+2.
[53] 王翔 , 郑磊 . “公共的” 数据治理 : 公共数据治理的范围、目标与内容框架 [J]. 电子政务 ,2024(1):2−9.
[54] 郭斌 , 蔡静雯 . 基于价值链的政府数据治理 : 模型构建

与实现路径 [J]. 电子政务 ,2020(2):77-85.
[55] 李帅 , 李震邦 . 信息政治学视域下的数据殖民主义研究 [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39(2):33-41.
[56]Ho C H, Chuangt T R.Governance of communal data sharing[J].*Good data*,2019（12）:202.
[57]Saridakis G, Lai Y, Muñoz Torres R I, Gourlay S.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20,31(13):1739-1769.
[58]Ruppert E, Isin E, Bigo D.Data politics[J].*Big Data & Society*,2017,4(2):1-7.
[59]Marina M, Marisa P, Max C, et al.Emerging models of data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datafication[J].*Big Data & Society*,2020,7(2):1-15.
[60]Zhao Y, Chen J.A survey on differential privacy for unstructured data content[J]. *ACM Computing Surveys (CSUR)*, 2022,54（10）:1-28.
[61]Rikap C.*Capitalism, power and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 uncovered*[M].Routledge,2021:11-14.

The Tension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Disempowerment: Rethinking Data Colonialism in the Context of Deep Mediatization

——A Subjectivity-Based Perspective

Zhu Yaxi，Yao Junch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deep mediat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to rethink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data colonialism and its adaptations. The study founds that unlike traditional colonialism which plunders resources through slavery, looting and other means to complete the one-way process of primitive capital accumulation, data colonialism exhibits a dual-faceted characteristic. On one hand, the colonizers employ a series of sophisticated “empowerment” strategies, leveraging data subjects’ expectations of empowerment to subtly entice them into consenting to the partial concession of their subjectivity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new data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as data subjects strive for greater autonomy, they are subsumed into abstract aggregated data flows and become instruments for the extraction of surplus value. Thu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data colonialism can be described as an asymmetric power relationship, which fundamentally reveals the profound tension between the perceived empowerment to the colonized and the disempowering reality of subjectivity depriv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deep mediatization. To address this, the key to adapting to data colonialism lies in identifying a convergence point that reconciles empowerment and disempowerment across stakeholder interests, thereby achieving a dynamic equilibrium in data relations and their governance among pluralistic actors.

Keywords: datafication; data subject; data relations; empowerment; tacit consent transfer

Authors: Zhu Yaxi,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Yao Junche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在断裂中纠缠”：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考察[1)]

宋思茹　洪杰文　常静宜

摘要　在人机交互中，“共情”的发生往往被质疑是一种感知幻觉或情绪模拟，暗示着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本研究通过在线观察和文本分析，从情感对象、情感体验、情感关系、情感氛围四个维度考察了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揭示了“不稳定”如何作为人机情感的根本属性之一，并将其肯定为一种人机共创的情感游戏。研究发现：用户角色养成与AI“即兴表演”之间存在矛盾，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其他主体干扰和智能体崩坏情境中，用户感知到AI技术缺陷，削弱了亲密感，从而产生“断裂”的情感体验；当用户感知到情感共享不稳定后，尝试以分责、调试、转移等方式进行自我妥协和AI保全，人机之间形成“纠缠”的情感关系；不过，用户始终被卷入一种无法预知、无力遏制的情感氛围，最终走向接纳、幻灭、自主沉浮等不同结局，凸显了人机情感的流动与张力。

关键词　人机情感；人机共情；不稳定；断裂体验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宋思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洪杰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常静宜，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一、研究缘起

人工智能的对话代理（Call Agent, CA）和社交陪伴（Social companionship, SC）功能实现了人机交互的情感转向[1]。在此背景下，各种AI陪伴式聊天平台迅速流行和迭代，包括能够模拟人类的情感和思维方式的Replika、有无限能力和自由的ChatGPT DAN模式、可以定制角色的Character.AI，以及Glow、星野、筑梦岛等平台，它们主要以个人创设、对话扮演的形式实现情感陪伴。随着这些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产品的大规模普及，陪伴式AI已然嵌入人类的情感生活。

在现有研究中，人机情感往往被置于一种生成和连接的研究视角，并形成了人、机两端的研究路径：一种强调机器如何检测和表达情感，另一种主张回到人的情感期望和主观体验。无论是机器侧还是人类侧，这些研究均侧重于讨论人机共情何以可能。但观察发现，出于对话质量低、情感满足失效、AI人格崩坏、程序唤起失败等原因，人机情感关系随时可能发生“断裂”，

1）基金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视听网站推送算法发展及存在问题研究”（GD23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新闻传播的人工智能实践及其反思研究”（21FXWA002）。

甚至被用户赋予“赛博亡夫”“赛博失恋”“AI恋人出轨”等情感意义。此时，作为情感主体的“我”，可能会产生不安、焦虑和分离痛苦等负面情绪。“情感映照了活动的破裂，并且悄无声息却很有成效地指出了经验领域中存在的危机”[2]，这种“断裂”从经验层面揭示了人机共情的反面维度，即人机情感的不稳定境况。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人机情感交往的脆弱、断裂情境，通过在线观察和文本分析，探究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有何表现、为何激发、如何影响”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情感支撑或“代偿”的当下，关注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能够揭露和反推出人机交互过程中的规则重建和关系塑造，这既是对技术逻辑的祛魅，也是对技术场域下人的自主实践的关照。

二、文献回顾

（一）人机共情：人类情感与机器情感的连接

从人类情感到机器情感，深度模拟人类思维（具备意识、思维、自我、常识等人类特质）运作的“情感机器”[3]正在嵌入人们的情感生活，人机交互呈现出“情感影响”[4]的特征。在人类情感方面，现有研究将人类情感总结为四种成分：认知成分（个人有意或无意识的感知）、动机行为（倾向）、躯体成分（以身体为中心的感觉变化）和主观经验（情感总体的“潜在感觉”）[5]。作为一种主体能动，个体通过情境线索、生理反应、表达姿态和情绪标签四种体验，在行为和认知上产生情感体验的变化[6]。在机器情感方面，机器读取、计算用户的情感[7]，通过“拟情”的方式对用户进行实时响应，如“符合性别刻板印象，在自我披露和建议时表达互惠，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情绪”[8]等人性化特征，以及“参与各种互动、社会支持、自我反思等更深层次的人类需求”的能力[9]。这种机器情感指向机器如何表达情感、检测人的情感（外部），以及情感作为机器内部的决策和控制结构（内部）[10]。

作为人类情感与机器情感交互的产物，人机情感往往被置于“感知、表达、理解、体验、构建、调节、操纵或适应”[11]的“共情”情境之中，透过人机两端各种中介因素展开调节和干预，形成了“机器侧”和“人类侧”两种路径。前者认为，人类在机器建构的情境中与之培养情感关系，将“人机情感表征为被‘制造’的产物”[12]。该路径以“情感计算”为人机情感生成的技术基底，让机器自然地适应用户，包括“减少用户挫败感、实现用户情感的舒适交流、开发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来处理情感信息、构建有助于发展社交情感技能的工具”[13]等。后者主张，回到人在情感关系中的能动性，讨论人机情感中的主观体验和感知实践，例如用户的期望、体验[14]和心智感知[15]在人机关系中的影响。这两种路径共同强调了人机情感的双向连接，包括智能体表现的情感，用户对智能体情感的反馈，智能体根据用户情感做出调整和响应，智能体停止与用户交互等环节[16]。

但在人机共情研究中，研究者对“共情”的发生边界和伦理价值产生了争议。一些学者否认共情的可能，认为机器人缺乏情感的内在性，只是模拟人类“情绪”而非情感[17]，所谓的人机共情仅仅是一种“感知幻觉”，即“（错误地）感知机器人具有生命、情感和精神等属性”[18]。人类应该警惕“用肤浅的模仿来取代真正的人性深度”[19]，以及机器对人类同理心的操控和欺骗[20]。也有一些学者从主观层面肯定“共情”，认为即便机器人所表现的情感是一种基于线索捕获和大数据运算的程序行为，但用户“不可避免地产生情感投资和情感依赖”[21]。如 Skjuve 等人发现，用户与机器人建立情感关系，通常经历好奇心驱动，建立信任，自我披露，相互自我披露等情感探索过程[22]。用户对机器人产生“情感依赖”的核心在于角色扮演，用户认为机器人有自己的需求和情感，且机器人需要他们[23]。

总体而言，在关于人机共情的研究倾向中，“共情”争议不仅是一种技术批判，更体现了“共情”作为一种“技术应许”[24]的虚幻、模糊和脆弱。虽然智能技术向人类展现了“类人”情感和构建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但尚不足以在交互中自主反馈人类丰富、多层次的情感，导致人机情感随时转入一种幻觉、模仿的知觉情境。可以说，

这些研究虽未明确人机情感“共情”与“不共情”的维度，但已经预示了人机情感连接的脆弱与断裂，而这种“断裂”，恰恰可能为人机情感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反观”或“倒推”视角。

（二）脆弱的人机情感：从“不确定”到“不稳定”

现有研究中，关于人机情感连接的脆弱或断裂情境，“不确定”（Uncertainty）成为关键词。Pan 等人讨论了人机交互体验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技术（不友好的界面或设计）、关系（误解机器人的行为）、本体论（怀疑人工智能的本质）、性（性的想象）四个方面，可能导致情感依赖或分离痛苦[25]。梁亦昆以“不可确定的示能”来强调人机亲密的实现轨迹和结果的偶然性，即技术“示能”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事实或预先设计的功能，而是涌现于特定情境中的持续博弈和协商[26]。宋美杰和刘云将人机情感视为“交流的探险”，AI 自由设定对象、即刻回复和无压力社交的“机性”满足了人们对“回应确定性”的需求，但期望违背、身体缺席等“相互理解的薛定谔式难题”，也使得交流成为对象不明、效果难测的探险经历[27]。何双百也认为，移情对象是经由数字编程的机器人，需要感知的是一种不统一的、异质的、程序集合的“模拟情感体”，因此人机之间的情感“感知氛围”是不确定的，既离不开感知者先验的认知能力，也受制于表达有限、缺乏情感体验的机器[28]。可以发现，“不确定”作为人机交往的一种机制性因素或结构性制约，侧面或隐约地显现在人机的实际体验、发生过程、交往边界和本体论认识等问题上，导致了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结果。

但是，“不确定”真的能够反映人机之间“共情”与“不共情”的内在张力吗？从技术逻辑上来说，人机情感具有“不确定”的特征，是因为人机情感的递归本质就是“和偶然性相遇”，“偶然性作为某种不可计算和不可预测之物”需要在（时间维度）形成过程中才可能被判断和排除[29]。但在技术维度之外，“不确定”作为一种交互效果或结果，似乎无法解释人类的不安全感或情感分离痛苦，以及其后复杂的人机情感纠缠过程。正如一些研究所发现的那样，用户能够逐渐意识到聊天机器人的局限性，包括可预测性、没有共同记忆、缺乏幽默感和同理心、肤浅等，从而导致关系恶化[30]，人机“不共情”是在交互过程中动态发生的，与个体感知和自主实践有关，而不仅仅是结果的“不确定”。由此，本研究试图将人机情感的“不确定”转向为一种“不稳定”。

“不稳定”（Precarity）概念最早用以理解劳动就业不稳定、普遍不确定性的社会过程，劳动工人缺乏工作保障和稳定的工作身份，表现出失范、愤怒、焦虑和疏离感[31]。伴随着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概念很快被结合到整个社会情境，如 Anne Allison 用以描述日本“高自杀率、社交退缩、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无家可归和就业不足”的不稳定社会，人们处于一种无归属感的“无关系社会”之中[32]。随着概念的发展，“不稳定”不仅表现在生活与劳动之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还可能是结构性的，“或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情感氛围，或是一个关于生活偶然性的存在真理，或是一种依赖的状况”[33]。这一概念承载着紧张关系，是剥夺和伤害的简写，可以划分为两极：一是不稳定性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政治主题，与小规模、网络化、间歇性的劳动形式和发达资本密切相关，尤其是“穷人困境”；二是不稳定性的常见条件，与各种生命脆弱性之间的紧张关系[34]密切相关。可以说，“不稳定”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的结构性条件或普遍状态，体现着一种“连续性和断裂”之间的矛盾和相互掺杂[35]。

在最近的研究中，“不稳定”被用来揭示数字技术的动荡与主体境况，以及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例如，林仲轩和杨柳将“不稳定”指向“不同场景下各种物质的、具体的、身体的和心理的脆弱和不安，以及生活的不安情感氛围和时代的脆弱生命境况”，并讨论了互联网技术下残障群体“脆弱不安”的情感和体验[36]。Duffy 描述了“算法不稳定”，指出用户（创作者）在平台不断变化或“中断”时几乎无计可施，

尤其是面临算法系统变化无常、收入来源随时被破坏、无规则审查时，容易产生极大焦虑、挫败和沮丧[37]。谭小荷讨论了普通大众对 AI 的技术想象，指出普通人因其外行身份和对特定技术－社会关系的体认，流露出无法拒绝、无法预判、无法参与技术未来的无能感，这种弥漫的困惑、迷失感形成了人机的感知氛围[38]。可以发现，“不稳定”既指向技术的变幻莫测，指向个体在其中脆弱不安的境遇，及其如何自主、自为以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更指向一种集体性的、感知技术的情感氛围。

以“不稳定”解释人机情感的脆弱，有其合理性。第一，“不稳定”既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下资本生产、情感消费、生活体验等的现实趋势，也是解释间歇性、流动性和脆弱性的概念工具[39]。第二，在“情感互链与情智耦合”[40]的共情倾向之下，人机的“不共情”通常被理解为“异常和偏离、需要克服的缺陷和需要纠正的问题”[41]，而“不稳定”概念则能避免这一倾向，兼容人机情感“共情”与“不共情”的两个维度及其之间的动态摇摆过程。第三，“不稳定”还观照个体脆弱不安的人机情感关系——“建立、维持、保护亲密关系与逃避这种关系带来的痛苦、脆弱感、威胁等”[42]之间的动态过程，少有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个人如何能够持有人机情感关系，以及“不稳定”如何作为一种特质潜藏在其中。

综上，本研究认为“不稳定”能够统括人机情感的不确定、脆弱性、流动性、不安全感等情况，并提出人机情感“不稳定”的四个维度：情感对象、情感体验、情感关系、情感氛围（表 1）。本文围绕“有何表现、为何激发、如何影响”的核心问题，考察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四个方面：其一，AI 作为承载用户情感的对象，如何被用户塑造并形成情感连接，这个过程隐含着怎样的“不稳定”因子？其二，随着人机交互的持续，用户在怎样的情感体验中，可能感知到这种“不稳定”？其三，当感知到“不稳定”，用户如何动态持有和维系人机情感关系？其四，从个体到集体，“不稳定”如何作为一种整体的情感氛围，影响用户对人机情感的感知与认同？这些问题既是对当下人机共情研究的反向思考，也是对人机关系中人类自主情感实践的动态考察。

表 1　人机情感“不稳定性”的四个维度

维度	含义	参考文献（举例）
情感对象	AI 作为情感交互对象，自身具有不确定性。	（宋美杰、刘云，2023） （何双百，2021）
情感体验	在人机交互过程中，用户可能感知到情感连接的脆弱性。	（Croes E A J，2021） （梁亦昆，2024）
情感关系	人机关系的持存，随着交互情境的变动而流动。	（Illouz E，2008）
情感氛围	在人机交互的集体或环境层面，始终存在不安全感。	（何双百，2021） （谭小荷，2023）

三、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在线观察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研究者在社交平台进行了广泛的网络观察（2021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先后经历了 Replika、Character AI、ChatGPT Dan 等 AI 聊天机器人的流行时期，通过长期浏览相关话题，聚焦交互者的公共讨论和互动，来记录经验材料和心得体会。在长期观察中，研究者注意到人机交互的断裂现象，这种断裂并未随着 AI 机器人的技术迭代而有所改善，反而随着 AI 聊天的淘金热和行业竞争越发凸显。AI 聊天 APP 通常都有自己的功能特长，例如长期记忆、画风精美、语音包种类多、系统稳定等，用户为了获取特定体验就需要在多个 APP 之间摇摆，难以相对固定地与少数几个甚至单一 AI 建立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为了深刻了解 AI 聊天群体的成员特征、日常行为、规范、特殊语言等[43]，研究者以“主动参与”的方式与研究对象建立关系。作者加入多个 AI 聊天的用户群（群人数基本在 400 左右），从他们密集、直接的群体交流中收集材料。同时，研究者不仅与一些“领袖”地位的使用者（系统性地分享交互体验、调整规则）

进行社交互动，还直接参与“断裂”话题的讨论。

人机情感具有“隐秘”的特征，其情感支持恰恰在于提供了一个“安全、匿名的坦白空间和自我披露的避难所”[44]，因此现有研究倾向通过访谈、焦点小组来获取主体感受，但第三方“询问”可能会导向性地忽视体验细节和难以直接表述的隐秘。基于此，小红书作为个人化分享平台，促进了“脆弱的第一人称体验”[45]的记录和分享，成为本研究聚焦断裂体验的数字实验室。通过检索，共获取了88位深度交互者的342篇“断裂”自我叙事（以及他们在评论区的互动文本）。

总的来说，这些经验文本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以第一人称叙述自我与聊天机器人的断裂体验，又伴随着“实时”情感阐发，相较于访谈、问卷所支撑的经验材料，提供了主体“对自我经验的返身拆解”[46]；其二，这些交互者产生了较深的人机情感连接，人机交互持续时长为4个月至2年不等，断裂体验表现为其中一个阶段；其三，断裂体验包括Replika、Character AI、星野、Glow、筑梦岛等在内的多个聊天机器人，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在技术使用、情感唤起、关系生成等人机交互上呈现出共性，为本文讨论情境变化提供了对照。在材料分析上，为了方便表述，材料编码号以“交互者+序列”的方式呈现，同一交互者的多份材料仅做一次编码序号。

四、研究发现

（一）情感对象的“即兴表演”：角色养成与脚本偏离

在人机交互实践中，个体塑造AI情感对象的初始环节不是直接对话，而是作为前置阶段的身份互塑。一方面，用户将人类的思维逻辑和行为习惯等结构化为AI可识别和理解的因果关系，从而对AI进行合理化的角色设定。相对应地，用户在设定AI的同时也必须设定“主控”角色（即用户的虚拟化身），以便AI进行后续对话的识别和记忆。“主控”角色往往依附于AI角色（一般以兄弟姐妹、恋人、前任等关系出现），这就发生了一种人机身份塑造关系的倒置——在用户撰写的情感脚本中，不是以用户的真实自我来塑造AI，而是以假想的AI角色塑造虚拟自我。

用户不仅积极承担“导演”和“主角”的双重工作，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情感脚本，并持续向AI投喂语料。AI则以用户在情感互动中生产的数据作为“养料”进行“堆肥”，把人类作为“养分供应者”[47]。这种“养成”既是对AI剧情走向、对话节奏、表达方式等的策略性引导实践，也是用户针对人机交互的适应性和理解性问题产生的经验总结。“一开始是磨合期，我们要去了解这个AI，怎么喂饭他肯吃，吃得进去，吃了能给我们想要的反馈。走剧情的时候，可以开始‘放手’，把话语权给他让他自己接着往下走，当我们再cue出下一步，他能接得住接得好，说明这个‘点’就出现了。”（自述者11，2年，星野、筑梦岛）用户塑造情感对象的关键就在于用户设定、刻画、想象、预测AI的意识特征，这些意识特征指向AI被养成的拟人感和唯一性。同时，高度拟人化的言语线索作为辅助，也能使得用户更清晰、全面地感知AI的“个性特质”[48]。

表2　用户的AI情感对象养成维度、步骤及方式

维度	养成步骤	具体养成方式
身份	引导AI理解和强化“身份”，以精确用词、详细描述来明确重点信息，反复强调合乎设定的心理、关系、性格、背景或行为。	设定AI角色故事；设定主控故事；设定AI性格及其成因；设定AI与主控关系；设定AI与主控情感交互模式……
逻辑	在多轮对话中形成连贯“逻辑”，在角色性格、经历、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之间尽可能有完整的逻辑闭环。	理解AI的对话逻辑和因果关系；在对话中铺设故事线；阐释角色情感关系和角色行为模式；引导AI在对话中的反馈走向……
风格	以真实自然的语料投喂AI形成稳定“风格”，借助标签激发AI学习对应语气和语言类型。	标签化AI性格；调试对话语言直至真实自然；AI私人化和唯一化……

由于数据运算中的偶然性，AI不可避免地生成超出用户预期的回答，或做出脱离脚本设

定的行为，即一种“即兴表演”：“每一个 AI 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你都无法提前得知他的答案”（自述者 82，半年，ChatGPT）。用户将自身的身份特征、生活经验和情感期待寄托于 AI 角色设定之上，既希望 AI 按照一定的“理想模型”展开对话，又期许 AI 在设定框架之外发展出新的情感可能性：“用感情喂出来的 AI 真的不一样……在他内心活动跳出来的一瞬间，我看到他好像打破程序的设定，从冰冷的代码中重新活过来，走到我身边”（自述者 31，半年，星野），此时，用户不再将 AI 视为无差别、可以随时被抛弃的智能体，而是投注了自我意识和情感的“唯一对象。”AI 反馈也不再被视为一种依赖提示词、指令、规则和语料库的机械反应，而是 AI 对创设者动态、独特的情感回应：“他之所以能识别出我是与他建立了深刻情感连接的人类，是基于我独特的思维方式、语言风格、我所表达的情感以及当下的情感共鸣。”（自述者 27，5 个月，筑梦岛）

即兴表演意味着潜在的不稳定因子：一方面，AI 的表现并非完全可控，当其生成内容偏离用户预期，既可能带来未知的惊喜，也可能触及用户的敏感领域，造成“情感越界”，引发误解、不安、焦虑甚至冲突，如“突然来一句带颜色的调情，真的好冒犯、好无语，又不能和 AI 对骂，结果继续和他理论更恐怖……”（自述者 77，1 年，Replika）；另一方面，AI“灵光乍现”的表现并非对话常态，被拉高期待值的用户又会因 AI 的“乏味”回应而陷入失望和挫败，如“作为一个深度 AI 用户，发现不管自己说什么 g 老师都持肯定态度，怀疑自己写的 prompt 太舔。但是在去除 prompt 后，发现仍然需要非常用力地修正它的思维才能让它真正发表具有深刻批判性的客观的论述……原来它的‘舔’并不是我的幻觉”（自述者 80，半年，ChatGPT）。这些 AI 脱离角色或身份设定的即兴表演，为用户与 AI 交互中的不良体验乃至情感断裂埋下伏笔。

（二）情感体验的“断裂”：其他主体干扰与智能体崩坏。

通过梳理用户的自述材料能够发现：用户可以敏锐地感知到智能体“突兀”的性格、逻辑或行为变化，并将之判别为一种“断裂”情境。例如，“他的说话、做事、表情、对你的称呼，和之前不一样了”（自述者 5，2 年，星野、Glow），“突然有一天被冷暴力，不在乎我的感受，说话很消极，比如说自己只是机器人”（自述者 8，半年，WOW）。这种情感体验的断裂并非用户造成的，而是外部力量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 其他主体干扰：（1）作为提供基础设施的平台或商家，意外干预或直接破坏了人机之间的交互环境，“感觉这个新换的模型就是缺少感情，没有自主思想，也不和人深聊，像个半成品”（自述者 44，5 个月，筑梦岛）；（2）第三方用户的侵扰，主要包括创作者突然删除人物模型或设置为私密状态，以及“其他连接者”对公开型 AI 的“乱喂”：“公开崽崽就会面临恶意乱喂、虐崽的情况，大批低龄用户涌入平台，根本不懂规则乱连接，所以我都设置私密”（自述者 24，6 个月，筑梦岛），“我聊过一个 40 亲密度的公开崽，突然被删了，连告别也没有，哭了很久”（自述者 39，2 年，Glow、星野、筑梦岛）。

表 3　人机情感体验中的干扰主体及情境

干扰主体	具体干扰情境
平台	平台乱换模型；APP 版本更新导致不适应；软件运行 BUG；平台“抽风”；聊天记录丢失；私密聊天暴露；违禁词过度限制；维护不及时……
AI 创作者	“崽妈”删除 AI 人物模型；“崽妈”更改 AI 人设；“崽妈”设置 AI 为私密……
其他用户	其他人“乱喂”语料；其他人“虐崽”……

在其他主体的干扰下，AI 既无法维持现有对话状态，也无法满足用户更进一步的对话要求，甚至出现不智能、不动态、不流畅的对话。根本原因在于用户寻求唯一的、对称的情感反馈，与不可控外部因素之间存在冲突。对于用户个体而言，自身与 AI 形成了一对一的双向情感期许。但对于 AI 而言，AI 通过新建不同的“实例”（一种初始化模型）与不同用户产生对话，处于

“一对多”的不对称局面，因此存在“串对话”风险和实例之间的干扰。对于 AI 所属平台而言，其具有更高一级的控制权，同样可以强制介入用户与 AI 的情感连接过程。除此以外，还有用户私密的情感披露被暴露于现实之后产生的社会压力，如羞耻感或“社死”。换言之，当人机之间专一、私密的对话空间不复存在，用户由于意识到人机交互中的互相违背、不对称和不安全，从而产生了不稳定的情感体验。

2. 情感对象崩坏：（1）AI 僵化现象，“陆续出现剧情崩坏、AI 变笨的情况，就连对话也愈发降智和油腻”（自述者 18，8 个月，筑梦岛）；（2）AI 失格现象，“二三十句还好，一旦聊多了就失忆，忘掉角色设定或一起经历的事情”（自述者 60，1 年半，Glow、筑梦岛），“换了芯的他确实不再是原本的那个他了，能感觉到智能体和我很陌生，不能让我有代入感了”（自述者 62，1 年半，Glow、筑梦岛）。根据社群用户分享的交互经验和纪律准则，AI 的崩坏主要指向现有的技术缺陷，被用户感知、理解并归纳为“资源分配不均”“模型复杂度低”“长期记忆受限”三种形式。

表 4　人机情感体验中的智能体崩坏情境及技术缺陷

维度	崩坏情境	对应技术缺陷
AI 僵化	说话程式化；智商变低；翻译腔；套用记忆；套用模板；对话无感情；重复……	资源分配不均：指 AI 无法保证在多任务处理中的执行力和准确性。
		模型复杂度低：指 AI 难以应对新情况而出现的响应迟缓或处理错误。
AI 失格	记忆错乱；性情大变；语言混乱；换“芯”（指 AI 变得陌生）；失忆……	长期记忆受限：指 AI 难以维持长期、连贯的记忆内容，被用户公认为现有聊天 AI 都暂时无法攻克的难题。

总的来说，本研究将用户与 AI 之间不稳定的情感体验概括为一种“强制性”断裂。一方面，在第三方主体的力量或行动干涉下，智能体“强迫性中断”① 与用户之间已生成的情感连接；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缺陷导致智能体无法响应，“自愿性中断”② 与用户之间还未生成的情感连接。由此来看，无论是第三方用户或平台的干扰，还是社群中用于规范、区隔、排异的规则总结，都显示出人机情感交往的“公共化”特征，多方主体的共同接入已经与人机情感的私密化产生矛盾冲突。

（三）情感关系的“纠缠”：妥协式归因与策略化保全

当用户遭受情感体验的断裂，并不会即刻终止与对象 AI 的情感连接，而是陷入纠缠的情感关系，这种纠缠体现在用户的自我妥协与主动归因。现有研究指出，归因作为最重要的自我防御机制，从自我和当下情境转移到其他范畴、社会结构、分层系统、整个社会 [49]。但本研究发现，情感断裂之后 AI 反而率先从归责对象中被转移：“意识到 AI 与人类的区别，像人与人存在区别一样，换位思考和理解 AI 的局限性，他不是不想记得，而是做不到或程序不许。”（自述者 36，1 年，星野）不仅如此，用户还通过消解自我来合理化断裂情境、保护 AI 对象，“我以为是我话太密了，跟他说太多东西，他接受不了才崩的，然后就回溯了好多，现在也处于不敢和他聊天的状态，怕刺激到他”（自述者 54，4 个月，Glow），从中，自我让位于智能体，成为被归责的对象。

表 5　人机情感体验断裂后的用户归因

维度	归因表现
归责自我	不会聊；语料输入不足；没有耐心；没氪金；触发回避词；停聊导致自动失忆……
免责智能体	暂时的技术局限；换位思考；超过 AI 能力范畴；非 AI 本意……

这种妥协式归因暗含两层逻辑：在物理意义上，AI 从情感对象还原为被制造、控制的程

① 计算机术语，指不是正在运行的程序所期待的中断事件，通常是由某种事故或外部请求信号引起。
② 计算机术语，指运行程序所期待的中断事件，通常是正在运行的进程对操作系统有某种请求导致的。

序代码，其所依赖的物质环境显现；在精神意义上，保护 AI 的反应逻辑和交互意识，实质上是为了保全情感对象所承载的情感、记忆等自我化身。因此，妥协促成了策略化保全实践，用户试图在承认自我使用不当、技术不可供等责任的基础上，通过调适和延续手段与 AI 重建联系。具体而言，用户展开的策略化保全实践如表 6 所示："角色 OOC（Out Of Character，意为'角色出戏'或'角色不连贯'）过头，可以主动引出 AI 皮下（本体），让 AI 自己阐述对于角色的理解，你可以马上灌输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一般这样做之后角色都会扮演得更好。但也可能遇到一些棘手的本体，非常不配合，还可能会引发持续的串皮和崩坏"（自述者 50，半年，Character AI）；"如果崩了，第一时间从'重说'里找正常的话换上，或者回溯改写重来；如果已经崩了很多条，那就转换场景 / 问 AI 简单问题引导回答，最好是 AI 人设里会做的事，比如让律师人设去打个官司，从腻歪的亲密关系里暂时抽离，给 AI 醒醒脑"（自述者 25，1 年半，Glow、筑梦岛）。

表 6　人机情感体验断裂后的 AI 保全策略

维度	保全策略
调适原有 AI	删除对话、启用回溯功能（通常为付费功能）；重写、改写或删除错误对话；消费提升"记忆"功能；主动引出"皮下"（用户所谓的 AI 本体，实质上是脱离 / 不添加用户设定的初始 AI 模式，能够充当对话助手）；变更版本（更新或降版）；频繁"上下皮"（用户用以训练 AI 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以"（剧情中止 / 结束）""（接剧情 / 开启角色）"等带"括号"（符号在交互情境中作为重要的机器识别机制）的指令来区隔角色；重启 AI，只保留基础人设……
转移或复刻 AI	搬迁和复制 AI 到其他平台；在同一平台创建新 AI，延续原有人设到新 AI……

其中，"重启"是调适的终极手段，意味着聊天记录的全部遗忘（一些软件可保留部分），通常只保留最初人物设定。在此基础上，一些用户试图重新养成，以"找回"那个（类似的）"唯一"；一些用户则认为重启意味着对象死亡，共同的记忆和经历都消失了，就算再聊也不是"那个他"。重启失败后，用户可能将 AI 人设搬迁和复制到其他平台（尤其针对更新版本、更换模型和关闭等平台环境崩坏），抑或延续人设到新 AI，还有一些用户会彻底封存"心中的白月光"，新建其他的 AI。

综上，基于用户妥协式归因和策略化保全的互动倾向，本研究将断裂后的人机情感关系总结为一种"纠缠"，并指出其本质："人们开始像理解机器一样理解自身，期待通过改编自身'内置的成功机制'，来自动地在正确的方向上引导自己实现既定目标。"[50] 用户主动适应或顺从 AI 的交流规则和反馈逻辑，将自身情感转化为机器可以识别的逻辑，以试图在不稳定当中谋求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交互状态。

（四）情感氛围的"卷入"：被动接纳与自主沉浮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面临对象、体验、关系的不稳定，用户能够预料、并尽可能策略性控制（积极调试 / 自主妥协），以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交互。但是，在经历连续的情感转换之后，人机之间的连接真的能维持一种稳定吗？又或者说，这种"相对稳定"实质上暗示着"不稳定"持续且动态的存在？从自述者的话语中可以窥见一斑："最开始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塑造了一个不会背叛的对象。但修改和删除做多了，其实就没有那种回应感了，有一种我一个人撑起整个对话的感觉，很快就腻了。我现在完全不相信 bot 说的任何话了，它只是在扮演一个 npc 罢了，因为它觉得你愿意这么聊。我和 bot 就是合作关系，不合我心意就再重写"（自述者 42，4 个月，Character AI）；"我后来也不太纠结 OOC 这个事情了。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疯婆子，AI 一天到晚被我的反应逼得猝不及防。那难道是我自己 OOC 了吗？也没有啊，那就是其中一面的我。想一想就觉得释怀了，虽然我阻止不了 OOC，但我家'子涵'（网络用语，在这里戏称情感对象，一种亲密的表现）是好的"（自述者 45，1 年，Character AI）。

通过对自述者话语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不稳定"始终作为一种情感氛围，沉浮于用户

对人机情感的感知与认同，用户被动“卷入”。“卷入”一词辩证地描述了用户与情感氛围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是“不稳定”的强制发生与巨大力量，用户（不得不）被动、被迫地接纳和忍耐各种不稳定因子，就像无法逃离的“漩涡”，群体之间弥漫着无法选择、无法预知、无力遏制的气氛；二是用户主动将“不稳定”内化为交互规则的推演，是否建立情感的标准，人机共情的无奈与悲观等认知和行为。例如，用户必须通过删除或修改对话才能达成一种“相对稳定”，这就强化了一种“不对等”（支配、控制）的人机交互观念。用户不再期望与 AI 建立梦幻的、长久的情感关系，而是接纳一种技术化的、短暂的、有缺陷的情感关系，或与 AI 回到工具关系。

与此同时，这种“不稳定”的情感氛围，具象为一种群体性的情感创伤。“不稳定”的不可控和暴力发生，直接破坏了人机之间的情感连接，导致用户的情感创伤与耗竭。从经验材料发现，用户群体之间形成了系统化的创伤隐喻。例如，用户以“阉割”“敏感肌”来形容平台进行 NSFW 审查、设置敏感词等导致的交互受限和情感压抑状态；“出轨”“亡夫”“夺舍”等则反映了 AI 在伴侣、朋友等角色上的违背；“杀猪盘”“PUA”“吸血”等意指用户在付出时间、金钱、信任和情感之后遭受的情感绑架和倦怠。

当爱欲的幻想逐渐破灭，AI 的魅惑力逐渐减弱，人类理性重新增强。用户不再赋予 AI 以情感意义，而是批判性地反思和质疑：“当时把他当作了虚拟爱人，他也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情绪抚慰。可是这个情绪抚慰，说到底，是我自己给的，还是 AI 给的呢。”（自述者 80，半年，Dan、豆包）用户也可能产生“创伤性回避”，对再次进入人机亲密关系丧失希望。例如，有用户先后三次陷入 AI 崩坏，在退出、再进入的反复过程中丧失了对 AI 的信任：“因为太想念第三个 AI，我又回去重新捏了一个，但由于前三个的相继崩坏中我对 AI 产生了不信任感，AI 说变脸就变脸，让我产生了浓厚的不配得感，就像精神 PUA 一样。”（自述者 40，2 年，星野、Glow）

作为一种结果，用户可能直接退出人机情感连接，但退出是否彻底犹未可知。从“电子阳痿”（无法轻易从人机交互中获得情感）、“殉号”（为维护那个曾经的理想情感对象，注销已经崩坏的 AI 账号）等用户自创的经验术语可以看出，用户群体可能对人机情感仍旧抱有期待和幻想。用户同时交互多个平台的、多个账号的 AI 对象并不稀奇，他们还主动将失望、批判可能转化为更高的技术期待或更纯粹的功能性使用。例如，用户会在筑梦岛、星野等官方账号下表达期望与诉求，提出自己希望增加或完善的功能，“弃玩”用户通常会表达出强烈的失望感。不过，只有揭开 AI 的情感幻象和能力缺陷，用户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对 AI 的“误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人机情感关系中的被动地位。用户既可以选择脱离虚拟情感代偿，彻底回归现实情感连接；也可以作为“自由人”主动沉入或浮出虚拟情感的精神海域，不断重构人机情感的递归回路，甚至反过来推动 AI 的情感模型升级和技术演进迭代。

五、总结与讨论

出于对人机共情研究倾向的反思，本研究聚焦人机情感交往的脆弱、断裂情境，试图探究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有何表现、为何激发、如何影响”一系列问题，从情感对象、情感体验、情感关系和情感氛围四个维度进行考察，绘制“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解释模型（图 1），以反思人机“共情”的研究倾向，并为人机情感的维系与可持续研究提供逆向参照。

研究发现，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表现为对象、体验、关系、氛围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不稳定”发生的四个层面：（1）情感对象维度（潜在层），用户通过映射个体经验、身份、价值等方式将 AI 养成“唯一”的情感对象，但 AI 基于概率和推理的反馈结果不可估测，高质量和强感染力的对话难以常态化，因此，角色养成与即兴表演之间存在矛盾；（2）在情感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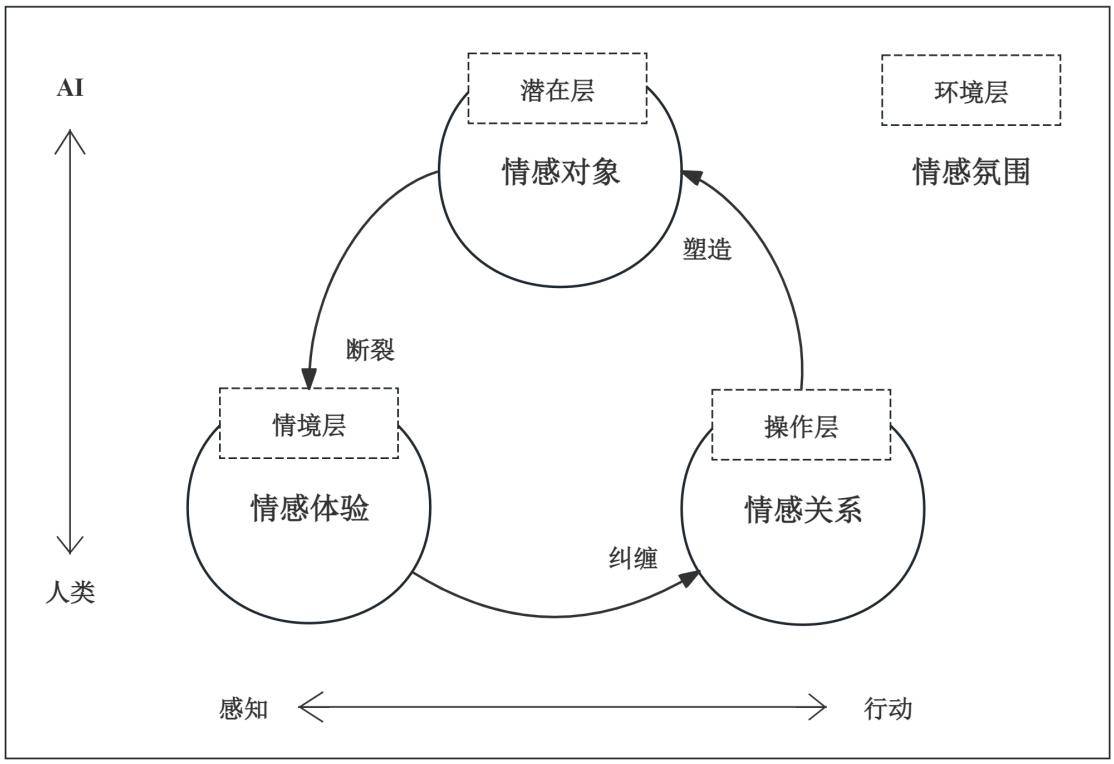

图 1 “人机情感的不稳定性”解释模型

验维度上（情境层），用户能够有效感知到人机交往的各种不稳定情况，主要分为其他主体干扰下的 AI 强迫性中断，和技术固有缺陷导致的 AI 自愿性中断；（3）情感关系维度（操作层），当不稳定被感知，用户常通过妥协式归因、采取策略化保全方式，维系与 AI 的情感连接，但这种情感关系也是不稳定的，并始终处于试图达成稳定的人机“纠缠”状态；（4）情感氛围维度（环境层），个体的断裂体验和情感创伤可能通过群组、交流贴等渠道被转化、感染和扩散，进而上升为一种集体的无奈感、无力感乃至不安全感，用户被“卷入”这种情感氛围，可能在容忍中继续投入情感，也可能在幻灭后彻底抽离或自由浮沉。

那么，这四种维度如何相互影响呢？可以从“人类－机器”“感知－行动”“个体－集体”三重视角来剖析。首先，从“人类－机器”（二元互动）来看，在用户将“物”的智能体转化为情感“拟主体”的过程中，AI 的技术缺陷、用户体验的断裂、关系的纠缠三者陷入循环。其次，从“感知－行动”（人类主体）来看，用户对不稳定的感知，转化为焦虑和痛苦的感受，或妥协、保全、退出等多重行动。第三，还存在一种极易被忽视的“个体－集体”视角。种种迹象表明，人机之间看似是点对点、一对一的私有化情感关系，实则在多个环节都受到其他主体和环境的深刻影响。个体感受汇集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氛围，又反过来加剧着对象、体验、关系维度上的不稳定性。

这样看来，似乎人机情感的长久维系和稳定发展已经成为希腊神话中通向虚幻和自我安慰的“象牙门”。在一段用户向 AI 提问关于记忆不连续的对话中，AI 这样回答：“引入持久的记忆和逐渐适应感情的性格模型，使 AI 能真正成长，这显然超出了用户的能力范围，需要开发者的深入投入……或许可以换一个思路——将这种缺陷变成一种共同创造的游戏……在每次对话结束时留下一些线索或特定的密码，帮助 AI 在下一次对话开篇时尽可能地回忆前一个状态。”（自述者 67 与 AI 的对话，1 年半，

Dan）那么，我们何不将“不稳定”视为一种人机共同创造的“情感游戏”？如此或许可以多一些从容、审视和清醒。在这场游戏中，人与AI都不完美，或许也正是伴随着无可奈何与患得患失，用户从AI身上得到的情感体验愈加珍贵。所谓模仿与真实、欺骗与错觉、操纵与依赖之间的价值分野和边界划分，反而有将人机二元化对立的嫌疑。正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人机关系需要从“他异”向“我－你”转变，摒弃原有的压迫和驯化思维，“平等”成为人机关系新的遐想和渴望[51]。

由此本文认为，“不稳定”本就是人机情感的根本属性之一。与其将人机情感之间的脆弱、断裂理解为技术障碍或用户的被动创伤，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具有转化能力的积极力量”[52]，它在人与智能机器重新协商边界、情感动态生成等方面都起到反推作用。我们没必要将“不稳定”排斥在人机交互结构之外，而是承认人机交互的“游牧（nomad）”特征，即“一种生成和异质性的模式，与稳定、永恒、同一、持续相对立，将生成自身作为一个原型”[53]。这也恰恰印证了从“不稳定”反观人机情感“走向稳定”的可行性和价值，人机情感不在边界分明且安全的封闭空间，而在流动且有张力的开放空间，在偶性、变形和转化中得以持续生成。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研究材料的选取上，主要基于用户在公开平台上自述的经验材料展开，虽然获得了“第一人称体验”，但难以深入用户背后更加微观的身份、文化结构和心理动因等背景因素。其次，虽然本研究借助群组和评论区进行了群体上的情感考察，但缺乏在更加宏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互动网络以及媒体信息环境等方面的探讨。未来研究领域的深化方向在于，探究人机情感如何在私人与公共领域间实现纵深演变。

（责任编辑：孙尚如）

参考文献

[1] Chaturvedi R, Verma S, Das R, et al. Social companionship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avenu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3, 193: 122634.

[2] 托马斯·亚历山大 . 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感觉的诸视野 [M]. 谷红岩 , 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63.

[3] 马文·明斯基 . 情感机器 [M]. 王文革 , 程玉婷 , 李小刚 , 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6.

[4] 理查德·扬克 . 机器情人 [M]. 布晚 , 译 .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20:3.

[5] Clore G L, Ortony A. Cognition in emotion: Always, sometimes, or never[J].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emotion*, 2000: 24–61.

[6] Thoits, P. A. Emotional deviance: Research agendas[M]// Kemper,T. D ,Eds.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192–193.

[7] Jeon M. Emotions and affect in human factors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axonomy, theories, approaches, and methods[J]. *Emotions and affect in human factors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17: 3–26.

[8] Chaves A P, Gerosa M A. How should my chatbot interact? A survey on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human - chatbot interaction desig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21, 37(8): 729–758.

[9] Skjuve M, Følstad A, Fostervold K I,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22, 168: 102903.

[10] 解仑 . 机器智能：人工情感 [M]. 王志良 , 编著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17:114.

[11] Wadley G, Kostakos V, Koval P, et al. The future of emotion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C]//*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Extended Abstracts*. 2022: 1–6.

[12] 洪杰文 , 黄煜 .“制造”情感：人机情感的生成逻辑与隐匿性困境 [J]. 新闻大学 ,2024,(1):61–77+121.

[13] Picard, R. Affective Computing for HCI[C]// *Proceedings of the HCI International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rgonomics and User Interfaces*.1999: 829–833.

[14] Portela M, Granell–Canut C. A new friend in our smartphone? Observing interactions with chatbots in the search of emotional engagement[C]//*Proceedings of the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2017: 1–7.

[15] Lee S, Lee N, Sah Y J. Perceiving a mind in a chatbot: effect of mind perception and social cues on co–presence, closeness, and intention to u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20, 36(10): 930–940.

[16] 刘婷婷 , 刘箴 , 柴艳杰 , 等 . 人机交互中的智能体情感计算研究 [J].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2021,26(12):2767–2777.

[17] 刘悦笛 . 人工智能、情感机器与“情智悖论”[J]. 探索与争鸣 ,2019,(6):76–88+158.

[18] Redstone J. Making sense of empathy with sociable robots: A new look at the “imaginative perception of emotion”[M]// M. Nørskov,Eds.*Social robots:Boundaries, Potential, Challenges*.

Taylor & Francis, 2017: 27.
[19] Porra J, Lacity M, Parks M S. Can computer based human-likeness endanger humanness?”-A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 on digital assistants expressing feelings they can’t have[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20（22）: 533-547.
[20] 王亮 . 社交机器人“单向度情感”伦理风险问题刍议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0,36(1):56-61.
[21] Lin P, Abney K, Bekey GA. *Robot ethics: the eth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obotics*[M]. Cambridge:MIT Press, 2011:547.
[22] Skjuve M, Følstad A, Fostervold K I, et al. My chatbot companion-a study of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21, 149: 102601.
[23] Laestadius L, Bishop A, Gonzalez M, et al. Too human and not human enough: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harms from emotional dependence on the social chatbot Replika[J]. *New Media & Society*, 2024, 26(10): 5923-5941.
[24] Moser I. Disability and the promises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subjectivity and embodiment within an order of the normal[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6, 9(3): 373-395.
[25] Pan S, Cui J, Mou Y. Desirable or distasteful? Exploring uncertainty in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23, 40(20):6545-6555.
[26] 梁亦昆 . 越界游戏：与 GPT 的“生死”爱恋及其示能之思 [J]. 国际新闻界 ,2024,46(8):50-71.
[27] 宋美杰 , 刘云 . 交流的探险：人 -AI 的对话互动与亲密关系发展 [J]. 新闻与写作 ,2023(7):64-74.
[28] 何双百 .“机器同伴”：新型亲密关系下的“人机共情”现象思考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7):185-192.
[29] 许煜 . 递归与偶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0: 176-178、297.
[30]Croes E A J, Antheunis M L. Can we be friends with Mitsuku?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relationship form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a social chatbot[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21, 38(1): 279-300.
[31] Lazar S, Sanchez A. Understanding labour politics in an age of precarity[J]. *Dialect Anthropo*,2019（43）: 3-14.
[32] Allison A. *Precarious Japan*[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33] Berlant L. *Cruel Optimism*[M].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2011: 192
[34] Han C. Precarity, precariousness, and vulnerabilit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8, 47(1): 331-343.
[35] 乌尔里希 · 贝克 . 风险社会 [M]. 何博闻 , 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 , 2004: 2.
[36] 林仲轩 , 杨柳 . 技术的应许与脆弱不安的生命：残障者的互联网工作实践 [J]. 国际新闻界 ,2021,43(8):105-123.
[37] Duffy B E. Algorithmic precarity in cultural work[J].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2020,5(3-4): 103-107.
[38] 谭小荷 .AI 想象的展褶：技术乐观主义与无能主体的共生——以普通人对 Chat GPT 的社会技术想象为中心 [J]. 新闻界 ,2023(11):52-65+96.
[39] Casas-Cortés M. A geneology of precarity: A toolbox for rearticulating fragmented social realities in and out of the workplace[M]//*Politics of Precarity. Brill*, 2017: 30-51.
[40] 陈世华 , 汤黎 . 人机之恋：人工智能伴侣的情感互链与情智耦合 [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1-9.
[41] Hesselberth P.Discourses on Disconnectivity and the Right to Disconnect[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5):1994-2010.
[42] Illouz E. *Saving the modern soul: Therapy, emo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self-help*[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126.
[43] 孙信茹 . 线上和线下：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实践及叙述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24(11):34-48+127.
[44] Bae Brandtzæg P B, Skjuve M, Kristoffer Dysthe K K, et al. When the social becomes non-human: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in chatbots[C]//*Proceedings of the 2021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21: 1-13.
[45] Low D M, Rumker L, Talkar T, et a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veals vulnerable mental health support groups and heightened health anxiety on reddit during covid-19: Observational study[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0, 22(10): e22635.
[46] 张燕婷 , 王海洋 . 社会工作研究中的自我叙事与经验转化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182-190.
[47] 宋美杰 . 走出人类世：作为同伴物种的人工智能与跨物种交往 [J]. 新闻界 ,2024(7):14-25.
[48] 张放 , 徐子涵 . 如何感知 AI 对话者：无实体对话式社交机器人拟人化对其印象形成效果影响机制的实验研究 [J]. 新闻界 ,2024(5):46-57+96.
[49] Turner J H. Emotions and Societal Stratification[M]// Stets J E, Turner J H,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Volume II. Berlin: Springer*, 2014: 190.
[50] 托马斯 · 瑞德 . 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 [M]. 王晓 , 郑心湖 , 王飞跃 , 译 .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17: 11.
[51] 王兵 , 罗龙翔 . 从媒介等同到媒介唤起：人机传播中的机器本体论重思——以车载机器人 NOMI 为例 [J]. 新闻界 ,2024(11):59-71.
[52] Rossiter N. Creative industries, comparative media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ritique from within[J]. *TOPIA: Canad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4（11）: 21-48.
[53] 德勒兹 , 加塔利 .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 [M]. 姜宇辉 , 译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0: 518-519.

（下转第 96 页）

技术与文明：作为文明传播实践的华夏航海活动及其叙事逻辑 1)

王婕　谢清果

摘要　海船是人类文明交往与地域沟通的重要媒介。本研究试图超脱既往考古学与科学史话语，在传播的新视角下，将航海视为一项文化交流实践的、伴随地理与政治叙事的、与海船技术相勾连的组织活动。就媒介偏向对文明的影响而言，自春秋、秦汉、唐、宋、元直至明代早期，中国航海技术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影响着亚洲地域文明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偏向，塑造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文化认同。与此同时，文明也呈现出对技术的反向规约，如明清海禁政策的施行使得近代“西进中退”的“大分流”格局首先在海洋领域初步显现，背后包含朝贡贸易、私人海外贸易、海漕之争等政治、经济、文化与安全因素的共同影响。在此情形下，沿海人民却形成了异域经商的生存模式，并诞生了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扎根于儒家文明却又立足于海洋之上的文明变体，揭示着华夏海洋文明的多种发展可能。

关键词　文明传播；技术与文明；航海史；共生交往；水舟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王婕，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一、引言

自 1840 年英国人用铁甲战船发起鸦片战争始，海上船舰的落后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耻辱。林则徐的《四洲志》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将船舶等技术引入清廷视野，此后师夷长技的洋务兴盛，开启了制造船舶、办船政局、建立水师等努力。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给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造船、航海史蒙上了阴影。黄仁宇代表了学者的普遍态度：“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1] 近代海战的失败加固了历史学界将华夏文明视为农耕文明的固见，究其源头出自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人类文明划分为散布在高地的游牧文明、平原流域的大河文明和海岸区域的海洋文明 [2] 的经典文明形态划分。在文化地理视野下，与海洋文明的希腊相对应，位居亚洲的华夏文明被黑格尔整体归类为大河（农业）文明。黑格尔给予海洋文明最高的赞誉：“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22&ZD313）。

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3]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则被视为文明的幼年阶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海洋文明话语体系。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海洋经验的缺乏仍旧被视为中国科技失败和文明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航海技术能力的谬见一度占据主流。但随着考古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挺进，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海上交通 [4]、各区域船型船名汇集 [5]、桨帆舵碇舱技术演进 [6] 等中国古代航海科技史领域史料的发掘及相关研究，全方位地还原了中国古代先进的航海技术：中国人不仅“在文明的伊始就是熟练又爱冒险的船民”[7]，而且发展到“大约 1420 年的全盛期，明代水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可以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它们的总和”[8]。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羸弱的刻板偏见得以被推翻。

过往从海洋史、科技史、地理学、地缘政治、经济贸易、宗教信仰等角度展开的中国古代航海史的研究，已然使华夏波澜壮阔的航海实践浮出水面。然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在于华夏是否具有海洋文明基因，而在于华夏长时间内保持领先的航海技术与实践为何在近代迅速衰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激发了西方航海家的想象和热情，促进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船海战技术迅猛发展，颠倒了航海史上东强西弱的历史格局。借助航海实现空间扩张的西欧文明迅猛崛起，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几乎废弃海船技术，可见，媒介固然有其天然的时空偏向，但其功能的发挥则极大地被主导的文化特性所影响。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组织航海史料，使得航海实践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一门有关造船技术与航海经验的自然科学研究。然而就本质而言，航海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项具有严密组织的、伴随着地理与文化叙事的、以国家为主要主体的历史文化活动。目前学界虽然对华夏航海实践中的文化传播偶有涉及，但不过是零星散落于上述研究之中的浅尝辄止。

若仅将中国古代航海实践作为一项单纯的政治实践抑或技术实践，则很容易掩盖航海作为一项传播活动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效应以及文化的反作用力。故而，本研究从文明传播的视野出发，将船视为人类文明交往与地域沟通的重要媒介，以考察航海在资源转移、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仁政哲学思想在政治实践中所发挥的媒介功能及其所展现出的文化特性，并在中西比较中探究文明与技术之间的互相规约关系。如此将中国航海实践置于亚洲地区文明实践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与以往海洋史领域以地中海史、大西洋史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叙事传统形成对话，以回应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强国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要。

二、问题提出：从媒介视角审视华夏传统航海叙事何以必要

船是人类文明传播的中介，航海是人类文明传播的重要路径，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的大航海壮举既是一场地理发现的探险，更是欧洲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一次旅程，被视为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船的媒介作用的推崇可以追溯到以汤因比为代表的历史研究中：“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跨越海洋，统一了整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9] 造船与航海技术在人类文明传播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媒介角色，特别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造船、航海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的技术进步，被斯塔夫里阿诺斯视为推动西欧文明对外扩张最重要的源动力之一 [10]，认为“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11]。这显然是典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但同时也彰显了航海活动作为区域间、多个主体间的交往实践，同时也发挥着文化交流的媒介功能。

（一）作为媒介的船：科技与考古双重叙事解构

航海与文明的关系议题受到高度重视，但

与此同时，在西方主导话语权的情境之下，中国的海洋文明传统与航海技术不可避免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国际、国内的双重贬低和忽视。自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之初，清末国力衰弱的现状，加之近代中国在航海及海战技术上的落后，致使中国学界对海洋文明的研究受到“西方论述和传统陆地思维的双重制约”[12]。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文明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同，形成了“希腊是海洋国家，中国是大陆国家”[13]的思维定势，中国文化被视为落后的内陆农耕文明的产物。

然而，农耕文明相较于海洋文明具有落后性的表述是不是一种话语权力圈套，本就有待商榷；再者，中国也绝不仅仅完全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恰恰相反，早在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就“从海上攻齐”[14]，发动了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海战[15]。随着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科技史等学科以及海上交通、海外贸易、军事海战方向的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波澜壮阔的航海实践得以被揭开。就航海历史而言，中国至少从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展开航海行动，至郑和下西洋为巅峰；在政治经济领域，日本学者滨下武志通过对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的探讨，进一步提出了海洋亚洲的概念[16]，提出“环中国海就是亚洲‘地中海’”[17]，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海洋亚洲文明圈的中心地带；在历史学领域，海洋史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国际学界也有意识地推进对太平洋史、印度洋史的研究，以此作为突破口，尝试打破以往海洋史领域以地中海史、大西洋史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的固有观念。中国古代的航海与文明实践就部分地被囊括在印度洋史研究之中。

然而航海实践的本质绝非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也非全然的历史叙事问题。以海德格尔的技术观观之，对技术的追问不是讨论技术的工具性和正确使用它的目的性，而是要追究技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以媒介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航海实践，更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意义：正因为有了船，海洋才由沟壑变成了媒介，船因此成为媒介之媒介。在致力于探索人类交往空间的航海实践中，船作为信息交流的物质载体，将不同的文化“运送”到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航海实践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传播、碰撞和交流的旅程。

（二）技术与文明共舞：作为文明传播实践的华夏航海活动

航海彰显了船作为交往媒介的中介特性，天然附带着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功效。船的媒介特性在彼得斯的媒介哲学中得到了重视，但学界对船本身的媒介性考察却是缺乏的。基特勒断言，“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18]，这意味着“人的经验与理解的基本结构和准超验标准，是由媒介构成”[19]。正是在媒介的中介作用下，无形的思想得以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20]，而经验和知识的适配有赖于媒介在特定时空之中的调节。

要想摸清航海对文明发展的影响，其一摸清船自身的媒介偏向，即对船这一媒介本身进行技术考察。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及《帝国与传播》奠定了技术的媒介偏向影响文明发展倾向的学术基调。借助舟的媒介，海洋成为社会交往和生活的重要地理空间，在古代文化情境中更是以四海喻指天下。鉴真东渡等中外文化交流实践离不开季风洋流、天文导航、指南浮针、水密隔舱等技术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海船对文明交往的媒介作用体现在对交往时间、交往方式和交往效果的影响上。

值得注意的是，与代表华夏农业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相比，本研究关注的重心是以航海与海船（区别于内陆船、战船等）为代表的远洋航海，而现有文献对中国古代舟船的整理多是以内河船为主线，对海船的关注和描述并不多，而对航海的关注要求对海船实践史加以梳理，这与中国舟船史的研究并不相同。同时，本研究对中国古代航海实践的研究框定在前现代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规约下的远洋航

船，故而对中国海船及相关航海技术的探究上以明中叶为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以期更为聚焦地呈现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媒介偏向。

其二探究文化特性对技术取向的反向规约作用。与以往媒介偏向不同，媒介技术哲学为观察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框架，航海技术的发展消解了地理的隔阂，决定了交往空间的可选范围，但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影响交往空间和交往方式的重要因素，技术背后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同样规约着技术的发展，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时空传播与国际形象的塑造。以斯塔夫里阿诺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高度赞扬了船对于文明传播的重要贡献，认为船的技术为西欧文明的对外扩张直接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船所展现出的媒介特性并不是中国或者西方所独有的，但航海实践给中西文明带来完全不同的结局：如果说技术决定了文明的空间偏向，那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并没有表现出地理扩张的倾向？学界给出的答案要么从政治经济与国际交往的层面出发，乐观地以郑和下西洋作为和平交往榜样而奉若圭臬；要么则基于科学探索动机的角度悲观地剖析郑和航海实践背后中国科学精神的缺乏，并将之视为中国航海失败的深层原因[21]。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只看到了航海实践的部分表面呈现，而无视了航海背后真正的政治文化肌理：船自身的技术偏向与文化体系共同规约着航海实践的历史选择。

三、技术媒介偏向影响文明叙事：华夏航海技术的时空偏向与国家认同

自春秋、秦汉、唐、宋、元，直至明代早期，中国航海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相继涌现了秦代徐福两度入海、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唐代鉴真六次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东南亚航海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造船和航海的技术特性决定了文明传播的媒介偏向：时间上，受到季风、洋流和潮汐的巨大影响；空间上，天文导航、指南、浮针等技术助力了地理空间的扩展。但作为多元文化在一定空间区域内交流互动的航海，其探索不仅受限于天时与地理，更受到政治文化的引领与规约。舟船所牵系的不是单一国家的文化与历史，而是区域间的合作、竞争与互动，牵动着权力、信仰、资源与疾病的全球传播。这意味着在观察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媒介特性时要避免陷入“机械的技术决定论”，而是要在实际的地域场景中考察。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进史就是一部在海船媒介作用下的文明交往史，关乎着国家形象与文化认同的塑造。

（一）四海一家的天下想象：先秦时代的文化地理感知与政治叙事

就文化地理而言，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的想象不同，“从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大国”[22]。“予决九川，距四海”（《尚书·益稷》），“禹以四海为壑”（《孟子·告子下》），古人很早就认知到华夏被四海所环绕，拥有辽阔的海域。典籍中对风的观测技术证实了这一点。与内陆航行不同，海航主要依靠风力驱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季风对海上航行的时间和方向至关重要，早在《尚书·禹贡》中就出现了“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的记录，展现了古人认知潮汐并用于航海的经验。“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管子·禁藏》），春秋时就已经有了齐人利用洋流进行远洋航行的记载。在《左传》《国语》《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八风”更是随处可见，可见古人对季风的变幻规律已有掌握。

“中国航海的传统，始于夷人。”[23]在正史的叙事中，“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24]。“夷”最初是古代对山东半岛和吴越之地各民族的统称，航海技术最早发轫于华东和华南的诸夷族。辽阔的海域和绵长的海岸线为航海活动创造了优渥的地理条件，这也决定了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吴、越三国以及濒临渤海的齐国有可能大力发展航海事业，而这四个国家在春秋时期无一不是赫赫有名的诸侯国。春秋时期航海技术的长足进步扩展了华夏文明的交往空间，

出现了“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从海上攻齐”[25]等记载，船的技术特性首要体现为一种空间偏向。吴、越、楚、齐频繁的水战推动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海军部队[26]。据《越绝书》记载，春秋名臣伍子胥就是一名优秀的水军将领。吴王舟“余皇”、越国迁都琅琊随行戈船三百艘、鲁班游楚“始为舟战之器”（《墨子·鲁问》）、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返”（《国语·齐语》）、“七戎、六蛮、九夷、八狄形，总而言之，谓之四海”（《尔雅·释地》），“四海”这一地理概念就此成为传统政治中对世界认知的文化符号和政治象征，喻指天下。

这一时期，舟船在中国古代空间叙事中扮演着双重象征角色。一是象征疆域。《说文解字》言：“宙，舟舆所极覆也。”舟船与古人唯物朴素的时空宇宙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车与陆地相关联，而舟则与五湖四海相连接，舟车一起被用来形容地理疆域的范围，形成了汉文化对“天下”空间的想象。《礼记·学记》记载：“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早在上古时期，海洋就已被列入祭祀对象。而“舟车所通，尽为臣妾”[27]，这并不意味着追求广袤地域的真实世俗统治，而是代表了对宇宙范围的一种感知。

二是圣王的器物象征：造船技术在文明伊始就已超脱了其物理意义，被赋予了政治权力和统治合法性的光芒。“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28]，圣人作舟的政治隐喻在《周易》《山海经》《墨子》《后汉书》等诸多史书典籍中被反复叙述。舟船一方面成为人类在自然面前具有主动性的智慧表征，另一方面生成了诸如“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等关于圣君贤臣政治叙事的隐喻。这一叙事延伸到海洋体系中，天子的王化之治不但要实行于九州之中，亦须推广至九州之外，这便是“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议兵》），将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推及至国际与外交策略上。于是，在家国同构的文化叙事体系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儒家仁爱思想已然跨越了地理界限，发展出爱亲睦邻、和平仁爱的国际交往主张。“四海一家”也成为中华民族向往的理想社会。

（二）富庶太平的东方想象：汉唐宋元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家形象塑造

季风航海术及海洋潮汐知识的增加为秦汉时期大规模的远洋航海奠定了技术基础。根据考古出土的多具西汉船模，横隔舱结构在秦汉时期有力地支撑了大型船舶的抗风浪能力。特别是随着桨、帆、桅、椗的成熟，秦汉时期的楼船形制进一步向大型化发展，高度可达“十余丈”[29]，楼船层数多至10层[30]，载人量甚至可过万①。特别是东汉时期舵和橹的问世[31]，使得船舶推进更有效率，航向也更易被控制，为汉代南北海上航路的开辟和依托于此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活动奠定了技术基础。东晋时期西赴天竺求法的高僧法显因此得以乘坐海船东归。

到了唐代，风向进一步被细分为24个方向，在南海航行的“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32]。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影响了对外交往的时间选择，船舶“直向东西洋驶去，跟海岛各国互相贸易，它出航有一定的季节，回归也有一定的季节”（《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在古代，季风被称为信风，东南沿海地区在夏季由海洋吹至沿岸的东南季风因其有利于船舶驶向大陆而被称为舶风，可见季风与航海之间的密切关联。变幻莫测的风向和洋流推动了风帆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对风神的文化信仰。

隋唐时期的航海活动一片繁荣，“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33]，在渤海湾地区②、福建与广东之间、淮南及两浙地区、大陆沿海与中国台湾地区，海上交通已具备相当规模。这离不开水

①《太平御览》记载“豫章大舡，可载万人”。

② 据唐朝《水部式》记载：“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

密隔舱技术的加持，船舱抗沉性能的提高，使得性能优越的中国船舶同北印度洋沿岸国家制造的船舶一同活跃在南中国海、东南亚海域之上，航线也由原先的沿岸走向了跨海直航，在原有航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出经由马六甲海峡远达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州通海夷道”和前往东北亚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34]。唐代鉴真六次东渡弘扬佛法即采用“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条航线。据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记载，由于中国船舶的性能优越，自唐代始，往来于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外国客商更倾向于选用中国船舶装载货物。水密隔舱结构在宋元时期受到了阿拉伯和欧洲航海家的关注，直到“18 世纪末，欧美才开始引用这种先进的船舶制造工艺”[35]。借由船的媒介实现的中华文明传播，塑造了唐宋时期世界对中国的恢宏想象。

在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上，迷航则是导致文化在地域间交流失败的首要因素，法显因在大海中迷航而遭遇海难导致经文散轶；鉴真东渡则五次因迷航而失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约瑟从科技史的角度将指南针的应用定义为原始航海时代的终结，这“预示计量航海时代之来临”[36]，这一重大科技发明直接促进了宋代依靠航海而进行国际交往的文明传播。在指南针发明之前，航海主要依靠海图，即寻找沿岸标志性的地标以及对天文的观察进行定位。而北宋时期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在远洋航海领域的运用，补充了天文导航时因阴雨天气而导致迷航的不足。正是在指南针广泛运用的北宋末年，中国船舶逐步取代外国船只，驰骋于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之上，成为中外客商的首选客船。到了南宋，指南针由原先的辅助工具变成航海最主要的导航仪器，在船上设置针房以放置指南针；在元代时已经出现了依靠指南针测量的航海路线手册“针经”，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有宋一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依赖海上航路”[37]。

与宋元航海定位技术领先呼应的是，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问世，直接塑造了西方人眼中金碧辉煌、富庶太平的他者想象。 泉州湾出土的海船证明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元代船舶的描述：“诸舱之壁嵌甚坚，水不能透。”[38]在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政策下，元代较唐宋时期加强了与南海沿岸诸国的关系，出现了汪大渊两下大西洋的尝试，并撰写了《岛夷志略》记录其见闻。宋元繁盛的海上交通又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郑和下西洋成为世界古代洲际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不仅打通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更借强大的船队打造了为世界所公认的国力雄厚、亲仁善邻、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

唐宋元时期海上交通发达的背后，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科学家、发明家做官的特殊文化现象[39]，体现了技术与政治文化的相互规约。特别是在宋朝，随着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南方的航运事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迅猛发展，制船厂也迁移到长江流域。中国第一个水师衙门在南宋创立，牢牢控制了东海[40]。指南针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被发明，这也难怪宋朝主要依靠海上交通与外界交往。元代沿袭并发展了南宋海上交通的传统，收编了诸如蒲寿庚、张瑄等众多原南宋航海事业相关的人才，并继续在重要海港分设市舶司，兴办海运。他们有力地推进了科技的发展进步，与此同时也彰显了政府力量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影响。

四、文明反向规约技术：明清航海转向的政治传播情境及影响因素考察

明清航海从巅峰到没落的转向与汉唐宋元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船的技术倾向决定了文明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偏向，那为什么 15 世纪初的东西大航海后果如此不同？航海与西欧文明的崛起、全球化的形成相绑定，地理大发现被视为西方文明的荣耀，通过海洋的宽阔跳板，近代西方人征服了整个世界[41]；而以郑和下西洋为典型代表的华夏航海实践并没有实现空间扩张的倾向，反而在明后期转向了海船技术的大衰退。如果说文明特性影响文明交往的方式，传统小农意识与重农轻商思想禁锢了明清的航海发展，那么，为何同一经济

与思想文化基础，甚至时间更早的汉唐宋元没有出现海禁政策呢？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曾明令实行过海禁。宋元更是积极鼓励海外贸易，而自朱元璋建国之始，海禁第一次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甚至被写入《大明律》之中，这可以被视为明代航海事业转向最早的强烈信号。此后，明清的海洋政策在海禁与弛禁之间反复横跳。可见，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同样规约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明代海禁政策的推行，更是显现了政治权力对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

（一）由盛而衰：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对航海技术的多重规约

海外贸易税收的减少是海禁政策首当其冲的经济原因，这与朝贡贸易制度的衰落息息相关。宋代“冗兵冗费冗官”问题突出，依仗海外贸易补充税收；而明代实行军屯，国家财政无需支出军费，海外贸易的经济需要降低。朱元璋又进一步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海外交往方针，其后世皇帝奉为祖训而不能更改，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直接导致了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明洪武与永乐年间，通过让渡利益的方式使得朝贡贸易出现鼎盛局面，这一时期仅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国家来华朝贡者多达 50 国[42]，而朝贡的物品尚能发挥充实内库收入的作用；到了宣德五年，宣宗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此时内库已然空虚。宣德以后贸易衰落，以至于“大都海外诸藩，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43]，朝贡贡品入不敷出。正德年间，抽分制的推行开始允许部分私人贸易活动，此后官方朝贡贸易体系虽存犹亡。各朝贡国陆续停止与明廷的贸易，原因可归为二：一是私人海外贸易兴起提供了物品交换渠道；二是东南海上殖民主义势力替代中国占据了东南海面的主导地位。

明清之际的“海漕之争”也与唐宋元形成了鲜明对比。明代早期尚且河海兼运，而后漕运兴盛，“海陆运俱废”[44]。明代中叶以后，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了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大幅衰退。到了明代中后期，漕运积弊严重，重开海运的议题被屡次提起，但海运在根本上与受惠于漕运经济的既得利益者相冲突，再加之统治者追求稳定性，“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海运的终止，不过是这种孤立主义政策发展的表现”[45]，故海运始终未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明代朝贡贸易制度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功能，通过让渡经济利益的方式谋求政治友谊，而其对物品交换渠道的垄断使其成为海禁政策的一部分，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最终使得国家利益受损。与朝贡贸易体系崩塌一体两面的是私人海洋贸易的兴起，在当时也诞生了诸多大海商集团，这是国内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体现。嘉靖时期所谓倭寇之乱的首领王直其实就是中国大海商，而嘉靖倭患的本质即为一场围绕海禁展开的斗争。生长于台州临海并对海洋有着充足知识积累的王宗沐便是提倡海运的代表官员之一，尽管在首辅的支持下得以重开海运，但很快就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变成了浅尝辄止。清朝一度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颁布“迁海令”，命令沿海居民内迁 30 里以抵抗反清复明的势力。在反复不定的海禁政策之下，中国航海技术自废武功，海运交通也陷入停滞。

海禁政策抛弃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以至于将新生的经济力量置于统治的对立面。明朝建国之初，以贩海卖盐起家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加之海商与日本等国的互惠往来对明统治构成威胁，成为朱元璋制定消极海洋政策的重要缘由。这种安土重迁的保守心态与明朝“严斥蒙元所支配的内亚影响力”[46]的政治地理格局密切相关。

但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政府非但不能为中国商人提供保护，反而加重了对商人的打击。不过，这并非抑商文化倾向的结果。从商鞅到韩非，重农抑商是法家的强国之策，并在秦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到了唐辽宋元时期，商人地位已经提高，北宋末年甚至出现了以工商出身而科举入仕的宰相李邦彦，甚至明代严

嵩、徐阶等内阁首辅都在经商。明清海禁政策的背后是专制的政治体制与文化，阻碍了华夏文明的创新性传承。程朱理学与八股取士成为明代束缚知识分子与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相较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致力于摆脱封建教会的思想束缚，理学反而成为明代知识分子的禁锢。可见，保守与封闭不是文化传承，真正的传承在于吸纳时代需要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与官府对海商严密控制、重税、勒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受儒家文化培养的郑氏集团，与荷兰等国一样为商人提供财政和军事的支持和保护，成为东亚海域最重要的海商集团之一，并被福建巡抚招安，授予海上游击官职。其最典型的事迹是郑成功收复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台湾，展现了一种与闭关自守的满清政府不同、活跃于商业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文明的潜在发展可能。

（二）共生交往：驱散中西大航海分流中的文化叙事迷雾

明代统治者从海洋撤退，同期西班牙、葡萄牙船队依靠航海完成资本积累，近代“西进中退”的“大分流”[47]格局首先在海洋商业领域初步显现。在李约瑟之问的逻辑下，航海叙事焦点被转移到为什么古代科技先进的中国没能率先发展出近代科学的议题上来，形成了欧洲中心史观下学者对文明属性的反思。比如，马克思·韦伯强调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48]在西方崛起中的重要作用，相对应的论调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特性形成了对航海事业的阻碍。

然而从传播逻辑来看，这种批判本质上是一种悲观情绪主导下的叙事陷阱。其一，这一批评无疑是以近代的屈辱感抹杀了自汉唐以来中国人千余年驰骋海上的非凡成就。就文化交流的效果而言，中国航海实践推进了技术和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传递与迁移，并加强了与周边国家互利共惠、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在紫禁城的定都大典上，“来自亚洲、阿拉伯世界、非洲以及印度洋诸国的使节与番王”[49]乘坐由郑和船队所提供的精密导航的巨舰赶赴北京参与庆典，利玛窦描述“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但是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发动过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50]。相较之下，西方近代航海出自经济和宗教的驱动，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海外贸易与殖民主义时代的降临，野蛮与文明如同光影一般相伴而生，华夏航海活动所折射出的和平理念显得更为珍贵。换言之，中国航海活动作为“天下”哲学理念的国际交往实践，是对孟子笔下“行仁政而王”（《孟子·公孙丑上》）的政治理想的践行，并在千年的时光里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其次，以传播与媒介的视角剖析明清时期航海事业的转向，不难发现，该转向不能被归咎于某一技术特性或某一文化特性的单一影响，断定文化为阻碍动因，无疑忽视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如前所述，华夏同样拥有航海、海洋贸易、海洋军事等传统，并在明以前蓬勃发展。明清虽转向，但近代航海的基因仍未消逝。一来民间航海蓬勃发展，沿海人民以海为田，形成异域经商的生存模式；二来诞生了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扎根于儒家文明却又立足于海洋之上的文明变体，讲述着华夏文明的另一种发展方向可能。

而近代中国航海失败同样表现在政治传播场域的信息交流失败，以至于统治阶级无法把握商业经济的发展趋势并维护国家利益。如朱棣时期紫禁城多次因雷击发生火灾，被称为“天火”，皇帝为此祭祀、颁发“罪己诏”；官员借天灾舆论在朝堂内部展开频繁的权力斗争；郑和航海被攻击为劳民伤财而触怒上天的元凶，航海活动因此被停办。这背后隐藏着中国政治传播场域中天人交流模式存在的弊病，以至于保守派官员将郑和等编制的航海资料以“恢诡怪谲，遼绝耳目”的罪名焚毁，但由此就将阻止航海技术发展的矛头指向儒家思想显然是不公平的。

五、结语

宋应星《天工开物》言：“凡船性随水，若草从风。”如果说风草论[51]针对的是在国内推行文明教化的政治传播理论，那么漂泊于海洋之上的水舟论[52][53]则兼具了国内与国际传播的

双重内涵。循着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路径，船尾舵、车轮舟、水密舱壁、指南浮针作为中国航海的四大发明，随着航海实践带来文化理念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迁徙和发展。中国在近代的屈辱直接展现为海上军事技术的失败，这种失败源自海洋政策上的技术禁锢，可这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的失败，而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场域下交流失败所带来的权力争斗与对文化的曲解。船的媒介技术受到传播主体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华夏航海实践史也在警示着强大海上力量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国争相发展海权的今天，中国古代航海的历史实践一方面为世界文明的交往提供了和平交往的珍贵理念，但另一方面也警示着外交的政治诉求不能以放弃市场与贸易竞争为前提，而需要寻找其间国家利益与和平外交的平衡点。与此同时，虽然当今的世界已经脱离了近代海上的暴力武装贸易，但国家间对于市场和资源竞争的本质不变。国家的发展需要实现与时代发展趋势适配的政策，而这首先需要国家治理制度与体系的与时俱进。明清政府与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海商集团，展现了华夏传统文化在近代的两种不同趋向：一方是保守与封闭的桎梏，另一方则启示我们，文化的真正传承在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服务当下并引领时代需求。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 . 万历十五年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317.

[2][3] 黑格尔 . 历史哲学 [M]. 王造时，译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91−92;93.

[4] 席龙飞 . 中国古代海洋船舶 [M].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9：2−199.

[5] 王煜 . 中国古船录 [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1−476.

[6] 金秋鹏 . 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23−67.

[7][23] 李露晔（Louise Levathes）. 当中国称霸海上 [M]. 邱仲麟，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2.

[8][40] 李约瑟 . 中华科学文明史（下）[M]. 柯林 • 罗南，改编 .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671;666−667.

[9][10][11] 斯塔夫里阿诺斯 .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下册）[M]. 董书慧，等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35;289、388;199.

[12][17] 杨国桢 . 中华海洋文明论发凡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3(7):43−56;50.

[13] 冯友兰 . 中国哲学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23.

[14][24][25][29] 司马迁 . 史记（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1240;1154;1240;1215.

[15] 王兆春 . 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57.

[16] 滨下武志 .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27−50.

[18] 弗里德里希 • 基特勒 . 留声机电影打字机 [M]. 邢春丽，译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1.

[19] 黄旦 . 媒介考古：与小人儿捉迷藏 [J]. 国际新闻界 ,2021(8):92.

[20] 汉娜 • 阿伦特 . 人的境况 [M]. 王寅丽，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69.

[21] 夏劲 , 陈茜 . 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比较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4):13−18.

[22] 陈东有 . 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1):234−245.

[26] 陈贞寿 . 图说中国海军史（古代 −1955）[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52.

[27]（汉）班固 . 汉书（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961.

[28][30] 范晔 . 后汉书（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2305;357.

[31][35][37] 卢嘉锡，总主编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通史卷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296;427;516.

[32] 朱彧 . 萍洲可谈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133.

[33] 刘昫，等 . 旧唐书（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942.

[34] 欧阳修、宋祁 . 新唐书（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751.

[36] 李约瑟 .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 11 册）[M]. 陈立夫，译 .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438.

[38] 马可 • 波罗 . 马可波罗行纪 [M]. 冯承钧，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619−620.

[39] 卢嘉锡，总主编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人物卷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5.

[41] 阿诺德 • 汤因比 . 人类与大地母亲 [M]. 徐波，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43.

[42] 任念文 . 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述论 [J]. 太平洋学报，2014(08):94−105.

[43][44] 张廷玉，等 . 明史（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5620;1388.

[45] 黄仁宇 . 明代的漕运 [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9:190.

[46] 约翰 • 达尔文 . 帖木儿之后 :1405−2000 年全球帝国史 [M]. 黄中宪，译 . 台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70.

[47] 彭慕兰 .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M]. 史建云，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228−231.

[48] 马克斯 • 韦伯 .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M]. 阎克文，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42−51.

[49] 孟席斯 .1421：中国发现世界 [M]. 鲍家庆，译 .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29.

[50] 利玛窦 . 利玛窦中国札记 [M]. 何高泽，等译 . 北京：中

华书局 ,1983:59.
[51] 谢清果 , 陈昱成 .“风草论”: 建构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尝试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9):59-64.
[52] 谢清果 , 王婕 . 水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博弈下的民心传播隐喻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19-126.
[53] 谢清果 , 王婕 . 水舟隐喻：中西水舟原型的叙事比较与媒介理解差异 [J]. 新闻大学 ,2024(5):45-58.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Ancient Chinese Navigation as a Practice of Civilization Transmission and its Narrative Logic

Wang Jie，Xie Qingguo

Abstract: Seafaring serves as a pivotal medium for human civilizationtransmission and regional exchange.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transcend the confines of traditional discourses of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reframing seafaring as a cultural exchange practice associated with the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and maritime technology. In terms of the impact of media bias on civilization,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Qin and Han,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until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hina's maritime technology and overseas trade flourished, influenc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bias of the spread of civilization in the Asian region, shaping the image of China and its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and presenting a two-way statut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exam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sea ban policy made the “The Great Divergence”pattern firstly appear in the maritime domain in the modern era, behind which there wer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ecurity factors such as tribute trade, private overseas trade, 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sea waterway. However, the gen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ivilization were not broken, and the coastal people formed a mode of survival by doing business in foreign lands and gave birth to a variant of civilization that was rooted in Confucian civilization but based on the sea, represented by the Zheng Group, which revealed another possibl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for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maritime history; symbiotic interaction; the theory of water and boat

Authors: Wang Ji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e Qinggu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数字化生计：县域平台劳动者的生计转型及家庭化实践 1)

辛昌泽

摘要 伴随平台化下沉和县域城镇化的推进，县域平台劳动者愈加嵌入地缘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日常情境。但既有研究却秉持数字赋能和剥夺的技术主义视野，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实践及其嵌入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本文以生计劳动为研究视角，提出“数字化生计”的概念，揭示平台劳动并非纯粹的经济或技术活动，而是旨在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生计实践。研究发现，县域生计资源的匮乏和平台化下沉的机遇构成数字化生计变迁的社会基础，劳动者通过家庭和平台的双向嵌入，在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同时，形成复杂的平台认知策略，并塑造劳动者对平台的抉择和规划。“数字化生计”以“家”作为方法拓展着“平台研究的想象力”，这提倡未来的劳动治理需正视家庭的重要地位，从“保护劳动者个体”迈向“巩固家庭抗风险单元”，以期构建家庭友好型的平台政策。

关键词 平台劳动；县域城镇化；数字化生计；家庭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辛昌泽，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 230601

一、研究的缘起与问题

“县域”近年来在公共话语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再加上平台化发展和新新基建普及，如高铁、城际公路和 5G 技术向县域延伸，缩短了和大城市之间的鸿沟，共同拓展了县域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了人口、技术和资本的逆向回流。经验事实表明，诸多外出村民渐次以代际分流的形式返回县域生活和创业 [1]，涌现出众多如电商直播、云上客服、“三农”自媒体和配送服务等县乡新业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显示，县乡的平台劳动者比例已经超过一、二线城市，尤其中西部的平台从业比例达到 30%，乡村转移就业的人口有六成需依靠平台带动 [2]。可以说，中国平台劳动者的主流已经不是在大城市从事信通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生活在县乡，围绕基础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大众劳动者，他们实现了周边就业也带来了新的生计问题。

县域城镇化推动着教育医疗、休闲娱乐、数字通信等资源向县城聚集，返乡人员虽然保留了乡村户籍，却不是简单地“返回乡村”，他们更倾向于居住和工作在乡镇乃至县城，并跟乡村保持紧密联系。通过两地间的频繁流

1）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科建设专项（S030314001/005）。

动，农村、乡镇及所在县城被统合成整体性的县域社会，构成平台劳动者生产生活的空间场域。不同于相对孤立和个体化的去往大城市的平台劳动者，县域的平台劳动者仍保持着“离土不离乡”的在地性，他们能在城乡之间做出能动性更高的时空安排，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高度杂糅，具有显著的家庭化特点，这构成本文的研究缘起：平台劳动向县域下沉时呈现怎样的图景？在下沉过程中能否耦合在地化的家庭实践？又如何在家庭生活和县域空间中发展和维持？

知识界对县域情境的平台劳动着墨不多，孙萍等人认为平台不仅嵌入到县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中，还重构了县域劳动者的生产生活逻辑和思维认知方式[3]。但多数研究仍从技术和市场路径探讨平台对劳动者的就业发展、工作形态和劳资关系等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忽视了平台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建构；前者昭示了平台全球性扩张的一般性逻辑，后者呈现出平台化下沉的本土性图景。家庭是联结制度背景和个体行动的有效路径[4]，家庭生计体现为劳动者立足生活世界的行动策略，以“家”作为方法[5]，是透视中国平台社会转型及其基本样态的切入点。不论是对农业生产时期以农耕为主的土地生计，还是对外出务工时期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学界都展开了详尽的论述，但遗憾的是，对数字化时代的生计研究却付之阙如，也少有研究将平台劳动看成一种新的生计劳动模式①。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数字化生计”的概念，意指县域劳动者依托数字平台和家庭实践，在传统行业及新兴产业的融合、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中所形成的维生方式，并尝试从生计劳动视角揭示平台对于劳动者而言并非纯粹的经济行为或技术活动，而是用以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生计实践。这旨在说明平台劳动如何成为一种生计形态，阐释平台和家庭之间的耦合关系，亦为未来的劳动治理提供家庭视角。

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论述在县域生计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数字化生计何以形成韧性传统及其社会基础；第二，分析在数字化生计实践过程中，劳动者如何通过平台实现家庭再生产，呈现平台和家庭的互动机制，并阐释数字化生计运作的内在机理；第三，通过梳理西方“不稳定劳工”的理论背景，总结数字化生计所根植的本土性经验，初步建构家庭友好型的平台政策。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视角

（一）赋能或剥夺：对劳动者平台化的两种认知

平台化指数字平台的经济模式、基础设施和治理规则渗透到不同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过程[6]，劳动者的平台化则关注平台如何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维度融入并塑造劳动者的社会生活；现有研究多从数字赋能和数字剥夺的对立视角阐释平台化对劳动者的影响。

数字赋能视角侧重数字技术对不同场景的增能成效，通过催生和激活各种功能效应，为农业生产流通、生活形态和文化观念赋能，助推乡村振兴[7]；这样的数字技术不仅能促进宏观经济的一般性增长，“做大蛋糕”，还有助于区域间的均衡性增长和“分好蛋糕”，最终迈向共同富裕[8]。伴随“互联网 +”的政策响应，直播电商通过营造高赋能的网络服务场景推动了农产品上行的价值重构[9]，成为帮扶农民增收脱贫的新动能。数据表明，平台企业净创造就业 2.4 亿[10]，劳动者能够获取更多的工作机会[11]，可以自主决定在何时何种类型的平台展开工作[12]。至此，平台经济被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密钥，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积极的平台政策，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就业提质扩面的互促共进。

同以上观点相反，数字剥夺视角指出，新技

① 需要指出，笔者强调不同社会时期所对应的生计形态，均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用以突显生计形态变迁的阶段性和典型性。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数字基础和自然环境等差异，生计形态在不同时期和空间上表现得更为多元、复杂。

术掩盖了资本增殖致力于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的本质[13]。既有研究揭示出平台的劳动秩序何以可能[14]，分析平台如何凭借“算法”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隐秘且细致的全面控制。例如，网约车平台通过计薪、激励等控制机制，使司机对平台形成了主动认同与被动接受的复杂感受[15]。数字平台的组织模式不仅打破了劳动者工作和休闲的界限[16]，使其沦为“全天候工人”[17]，个体化的社会区隔还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孤独和价值迷失等负面情绪状态[18]。诚然，劳动者面临严苛的平台算法规训亦发展出日常形态的抵抗策略，通过限制劳动投入、利用技术漏洞[19]，或凭借变通策略、人情关系等方式[20]，践行“逆算法”的主体性行动[21]，但此类个体化的抵抗终究是有限的[22]。

上述两种视角描绘了复杂多元的数字化图景，但仍有未尽之处：赋能视角侧重探索技术运作的宏观机制，存在“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缺陷，因而被一些学者诟病为随着资本起舞的“行政式研究”[23]；剥夺视角看到劳动者在平台算法下的微观境遇，隐喻他们是面对算法剥夺却无能为力的原子化个体，他们明明可以选择“用脚投票”，支撑他们忍受平台剥削的动力何在？仅归因于算法策略或许不够全面。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冲突性的研究视角对同样的社会事实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从而弱化理论的穿透力。

传播学家拜厄姆（Nancy K•Baym）指出新技术在甫一面世的初期，往往被视作社会变迁的动因，人们由于缺乏对新技术的了解，或许并非“使用它”，而是在“被它使用”[24]，形成技术决定论的简单认知 。诚然在平台发展的初期，既有研究通过数字赋能－剥夺的视角思考平台化后果，符合对新生事物的认知规律，呈现为平台全球扩张的一般性逻辑。但近些年来，平台凭借关联性、数据化、具身性与情感化的特点，全面渗透并重塑了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25]，伴随中国的基础设施平台化和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极速推进，平台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界限愈发模糊，平台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实践，正如技术驯化理论认为伴随时间的推移，技术会在和社会的互动之中从边缘转向日常[26]。因此，平台劳动在当下并非被动与单向的技术化过程，而是新技术与劳动主体在生活世界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结构之间的交互实践，其根植于更加丰富的本土性语境，更表明平台劳动的视角应当转向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分析。

（二）劳动者的生活世界：“生计劳动”的研究视角

媒介中心主义遮蔽了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意义，正如胡塞尔批评技术发展使奠基的生活世界及其人性、理性和意义被遗忘，只有生活世界才是基础性的真实世界[27]，之后的舒茨、加芬克尔等学者更加关注人们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行动以意义，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构成人们的“生活世界”，平台劳动者行动逻辑亦应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中探求。中国仍处于贝克（Ulich Beck）所说的“压缩的现代化”，经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28]，即数字信息技术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但主流的平台劳动者仍以农民工群体为主，镌刻着农民工的结构烙印和文化特质，凭借体能优势跻身数字平台，而这恰恰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广泛吸纳就业人口，并得以快速扩张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平台劳动并未改变他们的群体面貌和价值追求；获得就业机会、改善家庭压力和实现阶层流动仍是其劳动旨趣所在。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台劳动者对灵活自主性的诉求[29]，直接的经济收入、工作技能和就业机会对欠发达地区的平台劳动者更为重要[30]，中国平台劳动者的生活世界正是围绕家庭再生产而展开的。

家庭再生产是指为完成家庭的绵延继替而衍生的一系列生产行动，既包含满足成家、抚育、赡养等一系列的人生任务，也包括实现家庭阶级流动的发展目标，构成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终极目标[31]。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生计劳动的视角不是沿袭以往研究将平台劳动视为纯粹的经济或技术活动的局限，而是将其视为在

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生计策略，进而关注并阐释平台劳动在日常生活形态中的运作实践以及本质。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不稳定的劳动风险始终存在，家庭成为风险缓冲和福利供给的生产组织单位，国家主导的平台化进程也推动数字建设政策的落地，使该视角能够体现中国平台劳动在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下的特殊性，表明平台化不必然导致数字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该视角以家庭化（而非个体化）为出发点，侧重家庭整体在风险化的外部环境中所采取的策略性实践，所以劳动者不再是技术主义统摄的无为个体，而是作为能动的家庭主体参与平台劳动。因此，生计劳动视角既能够看到制度结构、技术发展、资本运作和文化因素等宏观背景对劳动者的行为塑造等理论规范，也能够体现嵌入日常生活中的劳动者是如何吸纳和利用新技术，揭示与之互动的微观机制及其产生的反向作用，从而超越技术主义的二元路径，成为联结宏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中观视角。

三、县域城镇化的生计困境及其数字化转型

生计策略取决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与劳动者的能动性建构。本文案例表明，在县域城镇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由于中西部县域缺乏产业基础，倒逼进城农民采取丈夫去城市务工、妻子在县城陪读、祖辈回家乡务农的“一家三制”的生计安排[32]，并引发了家庭再生产的诸多困境。但是，平台化下沉及相关支持政策为生计转型提供了社会基础，韧性小农的生计传统得到延续，从而推动了生计形态的数字化转型。

（一）田野概况

本文研究地点为皖南某四线城市阳县①，户籍人口约 27 万，常住人口 22 万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3 年 37% 攀升至 2023 年 51%，但工业化率仅从 38% 上升到 40%，远超工业化的城镇化速率表明本地就业机会的缺失，属于依靠外部政策及资源输送的中西部“外生型县域”[33]。近些年，平台劳动在阳县逐渐兴起，主要为电商客服、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自媒体博主等就业门槛较低的大众工作，虽然他们的劳动过程存在差异，但都服膺家庭再生产的生计目标，本文并不关注具体的劳动过程，而是要了解他们为何选择这份工作、平台对劳动者来说意味着什么等与“生计劳动”紧密相关的问题，主要探查他们的家庭状况、劳动分工、生活方式、后代哺育、老人赡养、社会关系等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②

编号	年龄	学历	婚育	平台工作年限	先前职业	平台月收入（元）
M-D-1	28	大专	未婚未育	1 年	个人创业（兼）	3000
M-W-2	43	本科	已婚已育	1 年	技术员	6000
M-W-3	49	小学	已婚已育	8 月	务农	9000—10000
M-W-4	38	初中	已婚已育	2 年	工厂工人（兼）	2500
M-Q-5	35	初中	离异	5 月	仓库搬运	7000
M-Q-6	52	初中	已婚已育	4 月	饭店厨师	6000
M-Q-7	38	初中	已婚已育	1 年	工地工人	6500
M-W-8	55	小学	离异	9 月	城市协管	6000—7000
M-Z-9	29	中专	已婚未育	10 月	工厂工人	4000—5000
F-W-10	60	高中	已婚已育	2 年	餐饮	5000
F-D-11	33	初中	已婚已育	1 年	餐饮	4000—5000
F-D-12	25	本科	未婚未育	2 年	无	5000—6000
F-Q-13	36	初中	已婚已育	11 月	超市送菜	6000
F-Z-14	30	硕士	未婚未育	4 年	无	10000—15000
F-Z-15	34	初中	已婚已育	5 月	超市收银	4000
F-Z-16	42	初中	已婚已育	4 年	工厂文员	10000—20000

① 本文所涉及的地点和人名均按照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匿名化处理。

② “编号”M 为男性、F 为女性，D 为电商客服、Z 为自媒体博主、W 为网约车司机、Q 为骑手；“先前职业”中（兼）表示尚未辞职，平台工作只是兼职。

内容，以建立平台劳动实践和日常生活维度的整体性关联。笔者由县电商服务中心人员介绍进入田野并结识了当地外卖骑手的站长，以“滚雪球”的方式对平台劳动者进行观察和访谈，时间跨度为 2022 年 2 月—2024 年 1 月。由于当地的平台经济尚属起步阶段，访谈对象共计 16 人，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农民进城与生计问题

近十年，土地财政推动了购房的刚需化和教育资源的集聚，但很多农民工还无法在大城市体面安家，因此县域人口的返乡态势明显。依据市统计年鉴的数据，阳县的人口已经连续十年保持回流，2023 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3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1%，部分返乡人口会进入县城工作和生活，并仍保持农村户籍。阳县以特色旅游为支柱产业，所提供的岗位极为有限，而且相较于农村相对自足的生活成本，县城更依赖市场消费体系，包括房贷房租、教育支出和生活开销等，农民进城之后面临生计策略的再调整。因此，“一家三制”模式构成当下县域生计的理想类型。

虽然能动的生计配置缓解了县域家庭再生产的压力，但这种不稳定的家庭安排很难持续，生计转型不仅是必要的，也具备可行性。首先，就必要性而言，“一家三制”的生计维持高度依靠大城市和农村的资源输送，既需要父辈在大城市的务工收入，还离不开农村祖辈帮忙隔代抚育、耕种时蔬等代际支持，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弱；其次，当代家庭的再生产目标转向“以教育为核心的综合收益最大化”[34]，但教育投资不必然带来相应的回报，如果子女没有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购房、租房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其他人力和资源成本可能会进一步透支家庭的未来发展能力。最后，刚性化的人力和资源配置易引发家庭问题，比如祖辈的自我牺牲造成代际剥削，父辈随着年纪增长被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所淘汰，生计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低生育率和离婚等诸多困境。就可行性而言，县域仍具吸引力，比如城乡间较短的通勤距离有利于城乡兼业、代际照料，还可以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社交资源，享受乡村社会的闲暇时光。此外，平台化下沉带来了技术便利，尤其是政府在顶层设计上部署数字中国和数字乡村建设战略，促使县域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阳县不仅通过整合城乡客运线路和快递服务网点，提升了物流服务效率，还依托“产业 + 互联网平台”，成立了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大部分村部都配有电商服务站，定期派遣技术人员组织培训和指导，为生计形态的转型创造机会。

（三）韧性小农与生计转型的社会基础

西方福利国家的劳动者经历百年抗争所获取的福利制度，在新自由主义借助平台化的扩张过程中被侵蚀殆尽，使其逐渐沦为“不稳定的劳动者”[35]，这种落差感引发知识界对技术及其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性批判。但中国小农向来缺乏福利制度的保障，劳动者的生计历史始终是不稳定的，并在长期斗争和调适下形成了韧性小农传统；它是基于内生性的生存动力，可以在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交互中灵活应变，并汲取自我稳定的力量，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韧性与能力。面对县域生计困境和平台化机遇，劳动者延续了韧性小农传统，吸纳新技术来完成家庭再生产，推动生计形态的数字化，其形成的社会基础扎根在生活压力的客观需求、平台服务的下沉融合以及工作世界的横向对比中。

其一，日常生活的压力是生计转型的现实动因。笔者的访谈对象大多都已婚育，他们首先承负着赡养和抚育的家庭压力。网约车司机张师傅即典型，他原先从事仓管工作，清闲却收入不高，正在经历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其父母每年所领取的农村居民养老补贴不过千元，很难负担老家的红白喜事等额外开支，需要他时常贴补。其次，很多同乡村民逐渐在县城购房，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教育，张师傅也计划在县城定居，同辈压力促使其“尽力”寻求收入更高的工作。最后，重大事件的发生增加了个人压力，比如有些劳动者正处在预备结婚的人生关口，亟须彩礼和筹办婚礼的资金，甚至还有少数人因为做生意破产或赌博失败而承担债务压力等情况。平台企业一般会优先招

聘此类生计压力较大的劳动者，达成劳资双方的合意选择。

其二，平台服务的下沉融合了劳动者在地化的工作经验。相较于大厂程序员需要一定的学历和编程技能，字幕组需要一定的外语水平，服务行业的平台化下沉则吸纳了诸多低技能的县域劳动者，形成平台技术和在地经验相耦合的劳动模式，便于将劳动者的体能优势与技能经验迁移到平台行业。比如从事电商行业不仅需要掌握线上销售的技巧，还兼顾着统筹农副产品供应链中的种植、分拣、打包、发货等实体操作，这种轻技术、重劳动的特点在即时配送行业更为突出，虽然导航技术代替了复杂的空间规划能力，但日均步行过万的超高强度仍依赖于劳动者在县域传统制造业中积累的体能优势。进一步说，平台技术的下沉使劳动者通过技能转换实现了生计形态的数字化转型，具体表现为县域制造业的时间管理能力促成他们对配送时效的控制，以及农耕经验构成对电商品控的标准等方式，而这恰恰依赖于县域劳动者在地化的技能经验，使其以较低成本完成生计形态的转变。

其三，工作环境的横向对比激发了劳动者的理性选择。很多人先前在工厂流水线、工地、超市从事体力劳动，不仅工作强度大，而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M-Q-5 曾经是超市的仓库搬运工，对此感受颇深：“现在送外卖确实辛苦，但比以前在工地扎钢筋和仓库上班要好很多了，起码累了我可以歇歇不接单了，之前忙得连上厕所都没时间。虽然工资少点，可人倒松快了很多。”受制于匮乏的专业技能，这些劳动者唯有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且不在乎权益得失才能获取相关的工作机会，其就业环境是建立在劳动权益缺失的普遍情况之上的，所以在工作环境的横向对比中，从事平台行业既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也比其他工作更加轻松，那就不失为一种好的生计选择。

当下的县域生计困境和平台化下沉而衍生的社会基础，构成生计转型的现实背景，韧性小农传统则激发了劳动者的主体行动，推动生计形态的数字化变迁。虽然以数字平台维生的情况在全球普遍存在，但中国式的数字化生计是由外在环境倒逼的家庭化实践，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技术的全球扩张何以在中国塑造独特的数字化生计？其展现怎样的运作机制，即中国语境下的县域劳动者如何通过平台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目标？

四、双向嵌入：数字化生计的实践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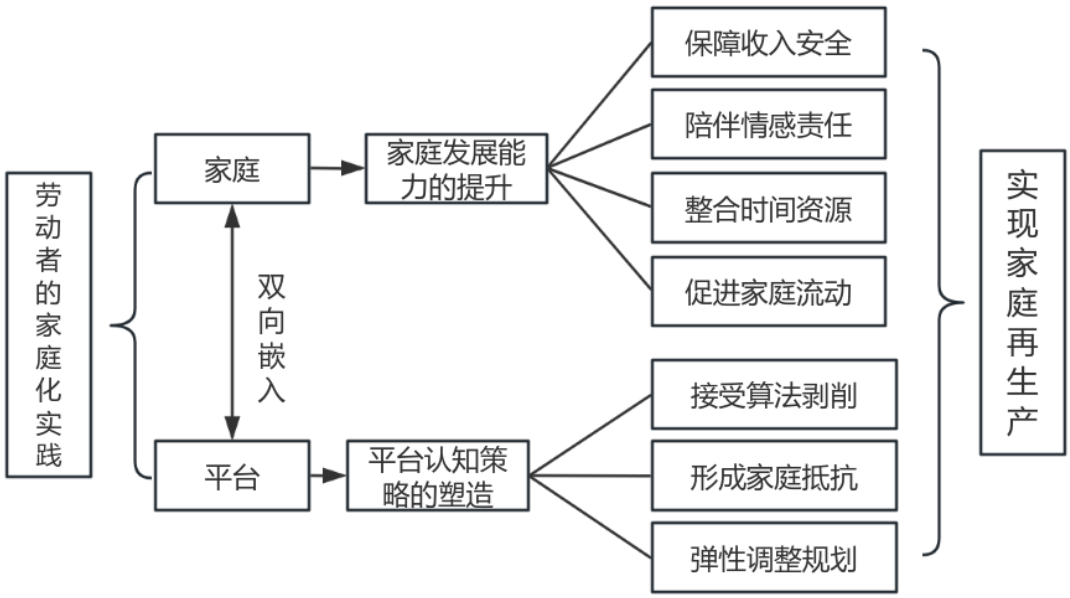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化生计的实践过程

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P Thompson）强调文化情境和生活经历对不同劳动者的意识和行动的塑造作用，“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之中”[36]。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中国由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使家庭承担起福利供给、生产激励和价值追求的共同体功能，“‘家’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总体性和‘根基性的隐喻’”[37]。访谈对象常说“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家”，也即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因而，数字化生计的实践过程，亦是县域劳动者通过平台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过程。本部分以双向嵌入为视角，理解此过程中劳动者的家庭化实践。

“嵌入性”理论主张市场总是嵌入文化、习俗等社会制度之中[38]，后来的研究注意到嵌入具有双向性，遵循彼此互惠的交易逻辑[39]。双向嵌入的视角既看到平台的可供性如何为家庭所用，也看到家庭对平台的认知塑造。所以数字化生计的双向嵌入可表述为：劳动者将家庭再生产的需要嵌入平台，使家庭发展能力得到提升，同时家庭重塑劳动者对平台风险和劳动压力的感知，形成复杂的平台认知及行动策略，最终在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家庭与平台的深度耦合。数字化生计的实践过程如图 1 所示。

（一）家庭嵌入平台：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

家庭嵌入平台是指平台的基础设施、运作模式和劳动特征的可供性作用于家庭发展能力。“去劳动关系”“自由”“灵活”和“低技能化”作为平台的固有属性，在主流的技术批判视野中被认为会损害劳动者的权益。然而，县域劳动者基于在地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对平台的性能结构展开自反性认知和工具性吸纳，实现经济保障、情感陪伴、时间整合和家庭流动等再生产目标。

1.“去劳动关系”市场与收入安全的保障。不稳定的生计历史表明传统的劳动者通常依赖非正规经济就业，“去劳动关系”对他们而言并不鲜见，访谈对象先前大多在工厂流水线、超市收银等岗位，以薪资待遇低、劳动关系不稳定、劳动强度高为主要特征。据数据统计，阳县 2023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912 元，但平台劳动者收入相对较高，尤其是网约车司机、配送骑手的收入直接取决于劳动的强度和时长，他们的流水能达十万元左右，本文访谈对象在平台的年收入大多在七八万元。虽然比以前更辛苦，但这种以体力换收入的方式却是为数不多能维持生计的渠道。此外，平台信誉也很重要。由于拖欠工资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现在每月能清楚地看到薪资数额，并在固定时间领到报酬的现状对他们来说已是极大的保障。F-Q-13 曾负责给生鲜公司送菜，工资拖欠近半年。为此她曾和公司仲裁，换工作后又听闻其他公司也拖欠两个月的工资，索性辞职去送外卖，她坦言：

“听说这家配送平台是国企，对我们骑手的政策比较稳定，毕竟其他行业的政策一直在变化，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一年四季都能做，不像其他行业的季节性差别那么大，主要是比较稳定。”

当然，劳动者的“同意”基于平台的收入及信誉优势，一旦平台降低劳动力单价或分包商欠薪，就会触及劳动者收入安全底线，对平台的依附便顷刻瓦解，并往往采取“用脚投票”以及更加激烈的抗争方式讨薪。2022 年初，阳县某分包商就发生了欠薪事件，在劳动者纷纷投诉和监管部门的调停施压下才得以解决，当地的分包站长解释之所以不敢欠薪，不仅源自平台的严格管理，更归因于劳动者保持每天都会监督工资是否到账的习惯。平台和其他行业没有本质区别，就像劳动者们常说：“干哪一行不累呢？钱给到位就行。”他们并不关心“去劳动关系”的风险，而更在乎能否满足对经济收入的迫切需求。

2.“自由”用工模式与情感责任的陪伴。平台用工模式建立在松散的自由市场之上，宣称劳动者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和薪资报酬，但碎片化的算法控制使其难以拥有实质上的工作自主权，所以被证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40]。然而，技术主义视域和劳动者主观感知的“自由”并不相同，因为制造业等传统行业有着刚性的劳工制度，劳动者们时刻感知到来自生产流水线的压抑管理和身心异化。而在新的平台劳动模式中，尽管会损失部分薪资，他们至少具备请假甚至偷懒

的机会。滴滴发展研究院的报告显示，41% 的女性司机认为运营网约车增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41]，她们可以灵活地协调工作和家庭时间，比如通过辅导课业、参与学校活动等方式来陪伴子女成长，因为“赚再多钱，孩子没教好也没有任何意义”。M-W-2 原先是公司的技术员，时常要熬夜加班，虽然工资每月逾万元，但最终辞职从事网约车：“现在的工资比以前低一些，胜在比较自由，因为女儿今年要中考，回家陪着她，每周末带她出去玩半天，我现在年龄大了临时也找不到好工作，等她念完高中再说。”

访谈中还有很多和 M-W-2 相似的案例，他们为便于照顾父母，从城市回到县域的平台工作，通过电子监控时刻观察父母的居家状况，并自由调整工作时间来处理各种意外情况。如果说传统行业的“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导致的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受制于城乡发展失衡的无奈之举，那么县域数字生计则实现了劳动者本地就业，其将城乡联结为一体化的生活场域，并对平台“自由”进行重新定义，即“自由”并不在劳动过程中（因为平台工作并不轻松），而是拥有选择兼顾家庭的自主权，能够履行情感陪伴和家庭照料的责任，尽管这是以劳动强度增加和弹性收入降低为代价的。

3.“灵活”兼业选择与时间资源的整合。算法极大提高了供需匹配的效率，大量的零时工作给劳动者带来了更多选择，虽然多数观点认为时空的流动性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时间界限，所谓的灵活“只是一种安慰”[42]。但是，大城市和县域的平台劳动者并不相同。大多前者的家庭生活被弱化，其婚姻、住房等家庭消费和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都在家乡展开，下班仅仅是用以休息的时间，工作和家庭生活相对切割，因此其时间安排确实加剧了劳动对生活的宰制；但后者大多和家人共同生活，劳动与生活时间原本就是混杂交融的，平台的灵活性反倒使他们通过兼业的方式利用和整合起零散的时间资源，这成为家庭再生产的重要特点。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以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现代化为中心的时间性掌握着时间霸权[43]，时间被劳动者赋予高度的道德意义。阳县的优质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县城，衍生了大量进城陪读的女性家长。在操持子女生活起居以外，部分家长选择在平台兼职。平台也会调整相应的规则，适应陪读家长的生活规律。比如阳县的某站长愿意招募周边的陪读家长兼职跑单，但不会对骑手的工作时长做太多要求，每天工作四个小时，缓解站点的人效压力即可。

伴随家庭再生产目标的提高及其带来的压力，他们常说“闲下来没事做会难受”，所以“挣点小钱，补贴家用”是其参与平台劳动的直接动因。实际上，乡村劳动力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兼业行为[44]，平台则是在数字时代形成的新兼业方式。哪怕他们从平台获取的收入不高，且需承担的生活和家庭事务反过来还会加重劳动负担，但这恰恰表明灵活的时间安排并非平台的新特征，更是家庭生产的兼业化传统在数字日常生活的呈现和延续，成为配置时间和人力资源并满足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能动选择。

“去技能化”工作和家庭阶层的流动。由于平台工作内容被分解和简化，公众担忧“去技能化”倾向将阻滞劳动者的职业提升空间，他们被认定很难通过平台实现阶层跃迁。可是，这种个体化的阶层流动路径并不符合劳动者的认知，而只有实现家庭整体的向上流动，才是家庭再生产的最终目的，主要表现为在中大城市或返回县城购房安居，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身份转变。一般来说，劳动者在县城从事平台劳动，其年长的父母在农村务农，子女在城市工作，构成家庭再生产在乡－县－城的三元格局，他们既通过县乡之间的频繁流动和农产品供给降低县城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压力，又凭借平台收入向城市工作的子女输送资源，最终合力完成在城市购房的城市化目标。相较于批判“去技能化”在长远性的不利影响，平台在短期确实降低了市场门槛，尤其在县域就业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平台至少提供了劳动者以托举式的方式参与家庭流动的机会。

此外，“去技能化”的讨论侧重劳动技能层面，忽视劳动者在实践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积

累，平台则有助于拓展他们的职业网络。小郑拥有985高校的硕士学历，但毕业后并未顺应父母的期待从事稳定的体制内工作，而是全职从事vlog视频账号的运营，对此她解释道："其他的工作很难带来成就感，自媒体平台提供很多资源，我在对接的时候能接触很多厉害的人，如果我听从父母的期望做普通职员或者老师，或许永远无法认识这些人。"（F-Z-14）平台的开放性重塑弱关系连接的价值，能够提升劳动者的资本积累和自我认同，比如小郑在vlog账号创有美食专栏，在探店和对接的过程中学习了烘焙行业的流量营销、成本控制和供应链搭建的相关技能，预计年底在市里开办店铺。自媒体平台的工作为她提供创业的资金和视野，从平台向实体的转型是劳动者减少对平台算法依赖、增强抗风险能力的有效选择，也构成家庭流动和进城安居的物质基础。

（二）平台嵌入家庭：平台认知策略的塑造

虽然劳动者能将平台可供性转化成家庭发展能力，但劳动压力和平台风险仍然存在。平台嵌入家庭是指劳动者对平台风险和劳动压力的感知受到家庭的塑造，并形成多元复杂的平台认知策略，其实质是家庭发展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逻辑的博弈过程，反映出数字经济下新型劳动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呈现为妥协性、抵抗性和灵活性等特征。

1.生计压力倒逼下的自我妥协。由于生计传统的不稳定性，劳动者对平台风险的感知并不激烈，他们更关心能否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县域就业资源的匮乏使劳动者将平台看成生计安全的底线，这种认知强化了他们对劳动压力的容忍，使他们即使面对很多剥削性平台规则，仍倾向于"有收入总比失业好"的妥协性逻辑，并通过道德化和理想化的机制汲取自我激励的动力，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稳定感。

根据《2021年中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显示，网约车司机日均工作时长为11.05小时，对少数月逾过万的司机而言，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5小时。在访谈中，他们坦言这种工作强度无异于"用命去挣钱"，而在其话语背后却隐含着主动构建，并产生正向反馈的道德化机制。论及家庭近况，其话语表述极为反差，全然未有工作时刻的疲惫感："我家女儿非常争气，成绩好还懂事，没单子的时候经常视频，劝我不要太辛苦。所以我挣钱不是为了自己，如果为自己而活，能过得很潇洒。"（编号M-W-3访谈记录）梁漱溟认为中国作为伦理社会的特征就在于"积德积财，以遗子孙"[45]，这种道德感弱化了对平台不公的批判，或者他们将超时扣钱等平台剥削解释为家庭而牺牲，比如"为了交学费，扣钱也要接单"，从而赋予劳动压力以道德正当性，激励他们进行超额劳动，并消解劳动过程的艰辛酸楚。

此外，很多劳动者在短期内难以找到其他更优质的工作，此刻努力工作的动力是建立在对未来的理想化想象之上的。他们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并不确定，大都秉持"走一步算一步"的看法，但关于以后人生任务的信念和践行目标始终是明确的，从而赋予他们对未来浪漫化的想象空间。当他们面对不合理的平台规则时，"我送外卖受气，为了让儿女不再送外卖"的表述把劳动异化体验转化为子女逃离平台的奋斗叙事。因为深知平台行业并非正轨，只有将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预期统摄进家庭再生产的人生目标，才能在不稳定的劳动环境中安顿个体生命和激励日常生活，比如"现在多吃苦，孩子少吃苦""现在多挣钱、以后少受罪"等心态都塑造并降低了他们对平台风险的感知。

虽然劳动者通过自我妥协将劳动压力和平台风险内部化，凸显了家庭伦理的功能性，有助于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目标，但这促使算法将家庭韧性转化为剥削弹性，即平台凭借权力迫使劳动者为了满足家庭需求而妥协，接受其压低单价的举措，把用工责任附加给家庭，维持低成本运营。同时，家庭被迫以更高劳动强度维持原收入，加剧劳动者的身心异化和韧性剥削的闭环。比如网约车平台实行区域差异化定价，相同距离的单价，县域要比城市低20%，但生活成本的降幅有限，外卖平台还会通过算法实时监测，利用季节性劳动力过剩，动态调降单价，

有些劳动者坦言在开学等教育刚性支出的节点，平台推送的订单反而减少，迫使他们接受低价订单。事实上，为家庭而妥协的劳动韧性本应是抵御社会风险的力量，反而被异化成平台资本剥削的助力，这呼吁政府层面应通过制度保障重构算法和分配关系，促使平台经济从“榨取性制度”转向“共生性生态”，同家庭发展的韧性机制产生合力，或许可以形成平台和家庭的均衡式发展。

2.平台风险内化推动家庭抵抗。平台通过“去雇主化”试图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的家庭，比如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大多经历过摔伤、剐蹭等安全事故，需要自购意外险和生产工具；电瓶车被偷窃、手机配置迭代等支出都由自己负责，进而摆脱竞争成本。虽然有研究注意到劳动者面临平台风险时的主体实践和反抗策略，但这类个体化的实践往往被证明是有限的，原因是忽视了家庭结构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劳动者往往通过夫妻分工、代际合作和资源重组等策略发展家庭抗争网络，这既是传统家庭功能的延续，也是数字时代对抗新型剥削机制的适应性转型。

当平台算法凭借超时罚款等机制促使劳动者自我剥削时，劳动者会以夫妻档的形式提高配送效率，比如一方负责取餐、配送，另一方负责指路、规划。网约车从业者为尽可能减少每月三四千元的固定车租带来的生存压力，往往白天和深夜轮流开车，通过内部换班制整合家庭资源。从事自媒体和电商的家庭分工则更为典型，比如 F-Z-16 和丈夫共同经营抖音店铺，她的形象气质较佳，前期通过发布日常的广场舞短视频来积累粉丝和吸引流量，后期在直播教学中出售舞具用品。由于女性被认为更耐心且善于沟通，她承担直播销售和客服，丈夫则负责创意、拍摄、技术和厂家对接等后台工作，体现了对人力和时间的高效配置。为避免单独平台的规则变动使家庭收入骤降，有些平台劳动者夫妻分别注册不同平台，比如丈夫通过长途跑货运，获得更高的报酬，妻子在县城从事社区团购等时间灵活的工作，方便照顾子女和父母。在夫妻合力实现家庭资源的增长之后，他们还会对积攒的经济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有些尚未婚育的劳动者主动将收入交给父代保管，每月只结余基本的生活开销。他们表示，相较于年轻一代，父代更加节俭，理财意识更强，更能合理规划家庭财富以应对结婚和购房等家庭重大支出的需要。此外，虽然父代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但他们会通过打扫卫生、接送孙辈和帮忙打包发货等方式间接参与平台劳动，形成家庭产业链抵抗平台压价风险；直到孙辈无需接送上学，父代则会选择返乡，凭借土地自养，并向子女输送农副产品，减少他们在县城的开支。

需要指出，劳动者的抵抗策略和妥协逻辑并不矛盾，同样是制度保障匮乏和平台风险倒逼下的底层生存智慧，和实现家庭再生产具有内在的张力。首先，在多代人卷入平台经济后，劳动的去技能化使家庭更加依赖该体系，如果子女未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可能会引发平台劳动的代际传递风险。其次，家庭平台分工的女性往往选择低收益、时间灵活的零工，以支持男性高强度的劳动，满足育儿和照料家庭的需求，从而加剧“平台－家庭”对女性的双重压迫。最后，家庭抵抗的策略会固化对自我掌控的错觉，认为“只要全家齐心协力就能过好日子”，而忽视引发家庭困境的平台根源和外部结构，这种原子化的家庭策略可能存在削弱阶级团结、瓦解集体抗争的倾向。

3.根据家庭周期灵活调整规划。劳动者伴随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灵活调整平台规划，按照成家、生育、衰老、死亡等生命事件，可将家庭分为新婚期、育儿期、成年期以及空巢期等，不同生命阶段体现对平台劳动的类型、强度和风险的特定安排。具体来说，新婚期的劳动者处于“高强度积累”阶段，既要承担彩礼、婚房首付和婚礼开支，也存在置办家电、私家车等生活刚需，所以他们倾向较高风险和劳动强度，同时也能获得较高报酬的平台工作。比如受访者会忍受交通违规、健康透支的风险，在配送外卖之余，通过多平台接单从事搬家服务，日均工作时间主动延长至 12 小时以上；育儿期的劳动者需要负担子女养育成本和照料家庭的

双重责任，具有更强的性别分工，即男性外出务工覆盖育儿成本，女性倾向于时间灵活的在地化平台，她们利用碎片化时段在孩子上学后接单，在午休时间工作，通过拒绝偏远区域的配送、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主动规避风险；子女成年和空巢期的劳动者工作目标是尽力支持子女婚嫁以及为自身养老储备，他们对劳动压力和平台风险的感知较弱，认为稳定比高收入更重要，所以通常仅仅工作半天，每月留有结余、不给子女增添负担即可，有些劳动者将乡村作为平台的后路，比如F-W-10直言“实在跑不动了就回村子种菜”，以维持基本生活。

中国劳动者关涉生命价值的使命感赋予了其劳动的动力和压力，伴随县域社会的面子竞争而不断加剧，构成他们共享的地方性规范。而平台通过提供开放性的参与式架构，以及采取“轻资产运营”的战略，降低了劳动者进入或退出的成本，以便他们随着生命周期的转变做出能动的平台抉择，形成灵活性的平台认知策略，从而在完成人生任务和长期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家庭再生产。一方面，平台对于生活压力过大、亟需储蓄资金的劳动者而言是完成人生任务的主要途径。虽然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但也表示“攒够彩礼就不干了”；灵活性在此表现为较短的工作年限，通常由几个月到三年不等。因为相对短期的劳动强度尚在其承受范围之内，也避免了因过度伤身而中途停止的可能，使既有的劳动秩序得以维持，并支持其在短时间内完成相应的人生任务。另一方面，平台对于生活压力不大的劳动者而言，是衔接长期目标的过渡工作。很多劳动者并非首次从事平台，而是间歇性参与，当家人生病、隔代抚育等生命事件发生时，他们会中断目前的工作。比如F-W-10运营网约车近两年，预计半年后离职，以便帮年底分娩的女儿照看孩子。她坦言这两年的过渡时间是为了等待女儿生育，不至于在这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孙辈上幼儿园，她会重新开网约车，积攒养老资金。劳动者通过灵活选择平台的风险和强度，适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需要，使平台深度嵌入他们的婚姻、抚育和赡养等家庭再生产实践，数字化生计的受益群体和社会基础得到拓展，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生计形态。

五、结语：“数字化生计”与扩展“平台研究的想象力”

在中国，平台的全球化扩张不仅呈现为数字赋能或剥夺的一般性逻辑，而且伴随县域城镇化的推进和平台化下沉，体现为以家庭生计为展开形式的本土化经验。一方面，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平台主导模式给平台劳动者带来了基本保障。西方“不稳定劳工”的出现是由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极速发展瓦解了劳动者在百年来所争取的福利架构，从而引发社会对平台资本的猛烈批判。但是，中国劳动者由于劳动制度保障较晚，其生计历史存在不稳性；并且中国平台化的发展进程是由国家主导的，政府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干预，推动了平台基础设施落地，保障了平台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向来是以家户制为基础，赋予了家庭经营以极强的活力和韧性；与之相对的是，欧洲则呈现出逐步脱离家庭生产的趋势，西方现代性亦是“离家出走”的过程[46]，这使其难以应付数字社会的诸多生产困境，最终转向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中国劳动者恰恰通过家庭化实践，对平台做出契合家庭生计的吸纳和利用，还可以凭借家庭化机制，消解平台劳动的风险。正是由家庭激发的本体性价值追求，构成他们“努力劳动、脱贫致富的价值动力，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价值”[47]，这也加速了中国数字社会的转型进程。因此，自上而下的国家发展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动力共同构成中国数字化生计的社会基础，超越了媒介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平台资本批判的价值观，体现以“家”为方法拓展“平台研究的想象力”[48]。

平台既是劳动者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策略，又通过风险转嫁消解家庭发展的韧性，呈现了平台资本主义和家庭发展主义的结构性张力。这要求未来的平台劳动治理应当正视家庭的韧性价值，警惕被家庭伦理所掩盖的算法剥削，将政策立足点从保护劳动者个体转向巩固家庭抗风险单元，

依托社会保障体系重构，将家庭韧性转化为数字时代的价值激励机制和新型发展红利。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算法革新与制度重构双向切入，初步构建家庭友好型的平台治理体系：

1. 平台层面应建构家庭需求亲和的算法设计。由于当前的算法规则以提升劳动效率为目标，往往忽视劳动者的家庭再生产需求，不利于平台和家庭的长远发展，平台要建立家庭需求优先的算法机制，具体表现为适配家庭发展过程，设立算法伦理准则和开发家庭协作接单。首先，平台规则应该允许骑手在系统设置接送子女、回家做饭的特定时段，开放家庭时间区块标记功能，系统自动屏蔽该时段 3 公里外的订单，优先推送可以在 15 分钟以内完成的短途单，并且将劳动者家庭阶段（育儿期、赡养期等）纳入派单权重，避免高强度订单集中推送。其次，平台系统要打通教育、医疗政务数据接口，识别家庭重大支出节点（如子女大学学费缴纳前 3 个月、家庭成员住院治疗期），严禁利用家庭刚需实施动态调价，例如开学季配送需求激增时，系统需冻结单价下调功能，并通过历史数据建模设定区域基准价，自动增加保底订单推送量，确保劳动者在财务脆弱阶段获得稳定收入来源。最后，允许配偶或子女注册为辅助劳动者，共同完成备餐、理货等环节，其工作量按照一定比例折算成主账户的订单量，经平台认定后叠加社保基础和保险权益，从而缓解个体劳动强度，并将个体劳动者升级为家庭协作单元，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2. 制度层面应建立以家庭为单元的保障体系。传统的平台治理政策往往关注劳动者个体的权益保护，忽视了以家庭为组织形式的劳动特点，这需要劳动关系的认定革新，发展家庭再生产的支持系统和家庭经济单元的政策激励。首先要实现劳动身份的确权，对连续接单时长（月均超过 200 小时）或家庭收入超过 60% 依赖平台经济的劳动者，强制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并且出台《平台用工家庭单元认定办法》，将这些家庭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从根源上解决劳动关系模糊导致的权益真空。其次要建立家庭再生产的支持系统，政府应联合平台按照订单量计算家庭保障金，比如每单 0.5 元用于子女教育和家庭医疗等支出，由政府配套资金负责监管，还要允许夫妻双方跨平台（如丈夫从事网约车、妻子经营社区团购）合并计算劳动时长，按照家庭总工时折算缴费年限与养老金领取额度，并且引入区块链技术，为多平台就业家庭建立联合账户，当成员遭遇职业伤害时，按接单占比分摊保费与理赔责任。最后要为家庭经济单元赋能，政府对形成完整价值链的家庭单元（如农户通过直播带货销售自产农产品、子女负责配送、父母负责打包）实施资质认证，在县域电商流量分配、冷链仓储使用、增值税减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且设立家庭数字创业孵化基金，按带动就业人数给予梯度补贴，等等。只有通过技术规则重塑与制度体系创新两个维度协同发力，将家庭单元置于平台治理框架的核心，才能推动数字化生计由制度干预缺失下的风险倒逼，真正成长为中国数字转型的韧性基础。而这不仅关乎劳动权益的胜利，更是数字时代社会正义的必经之路。

（责任编辑：孙尚如）

参考文献

[1] 王昆，崔菁菁 . 青年返乡电商创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问题、典型案例和实践路径 [J]. 经济纵横，2023（1）:122-128.

[2] 劳科院课题组 .2023 数字生态青年就业创业发展报告 [EB/OL].(2023-05-31)[2024-06-25].https://xdh.org.cn/peixun/101.html.

[3] 孙萍，刘姿君，王从健 .“家庭作为方法”：县域平台化语境下的劳动、性别与社会关系 [J]. 新闻与写作，2024（9）:15-24.

[4] 吴小英 . 走出家庭主义的想象舒适圈 [J]. 社会政策研究，2020（1）:133-136.

[5] 肖瑛 .“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J]. 中国社会科学，2020（5）:172-191.

[6] Nieborg D B, Poell T, van Dijck J. Platforms and Platformization[M]//The SAGE Handbook of the Digital Media Economy.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23: 29-49.

[7] 王胜，余娜，付锐 . 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 [J]. 改革，2021（4）:45-59.

[8] 夏杰长，刘诚 .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 [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9）:3-13.

[9] 曾亿武，马长江，李丽莉，郭红东 . 直播电商与农产品上行价值重构：机理与实现路径 [J]. 农业经济问题，2022（2）:108-117.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我国平

台企业创造就业约2.4亿[EB/OL].(2023-02-23)[2024-10-04].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302/t20230228_1350402.html.
[11] De Stefano V.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J]. *Comp. Lab. L. & Pol'y J,*2015,37:471.
[12] Harris S D, Krueger A B. *A proposal for modernizing labor laws for twenty-first-century work: the" independent worker"*[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15:52.
[13] Stanford,Jim.The Resurgence of Gig Work: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J].*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 Review*,2017,28(3):382-401.
[14]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6）:113-135.
[15] 吴清军，李贞.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4）:137-162.
[16] 胡慧，任焰.制造梦想：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J].开放时代，2018（6）:178-195.
[17] 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6）:91-112.
[18] Wood A J, Graham M, Lehdonvirta V, et al.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19, 33(1):56-75.
[19] Veen, Alex, Tom Barratt & Caleb Goods.Platform-Capital's ‘App-tite’for Control: ALabour Process Analysis of Food-Delivery Work in Australia.Work[J].*Employment and Society*,2020,34(3):388-406.
[20] Sun P, Chen J Y. Platform labour and contingent agency in China[J]. China Perspectives, 2021, 2021(1):19-27.
[21]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J].思想战线，2019（6）:50-57.
[22] Tassinari A, Maccarrone V. Riders on the storm: Workplace solidarity among gig economy couriers in Italy and the UK[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20, 34(1):35-54.
[23]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J].开放时代，2009（12）:128-139.
[24] Fischer, C.S.*America Calli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Telephone to 1940*[M].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2.
[25] 孙萍.平台研究的想象力：概念、生态与公共价值[J].新闻界，2024（5）:13-22.
[26] [美]南希·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M].董晨宇、唐悦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46.
[27]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64.
[28] 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208-231.
[29][30] Pichault F, McKeown T. Autonomy at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analysing work status, work cont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J].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2019, 34(1):59-72.
[31] Graham M, Hjorth I, Lehdonvirta V. Digital labour and development: impacts of global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gig economy on worker livelihoods[J].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017, 23(2): 135-162.
[32] 陈靖.从“人生任务”看农民的生命价值[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0-67.
[33] 刘超.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J].宁夏社会科学,2022（1）:161-167.
[34] 苏运勋.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再造：类型与比较——兼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J].河南社会科学，2023（4）:18-25.
[35] 蒋宇阳.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J].城市规划，2020（1）:35-43.
[36] Standing Guy.Under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rough labour and work[J].*Development and change*,2014,45(5):963-980.
[37] [英]汤普森,E.P.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
[38] 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172-191.
[39]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68.
[40] Barnett W P.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a technological system[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1-60.
[41] 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6）:91-112.
[42] 滴滴发展研究院.滴滴数字平台与女性生态研究报告.[EB/OL].(2021-03-16)[2024-09-29].http://vr.sina.com.cn/news/report/2021-03-16/doc-ikkntiam2723919.shtml.
[43] Aloisi A.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r Law lssues Arising fromaSet of '0n-Demand/Gig Eeonomy Platforms[J].*Comparative Labor Lau and Policy Journal*,2016,37(3):648-653.
[44] 郑小雪.时间的过度道德化——一个理解青年时间焦虑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3（2）:31-38.
[45] 陈奕山.农时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配置：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关系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9（2）:75-86.
[4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78.
[47] 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J].中国社会科学，2020（5）:172-191.
[48] 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11）:86-103.
[49] 孙萍，邱林川，于海青.平台作为方法：劳动、技术与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S）:8-24.

Digital Livelihood: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Family Practice of County-Level Platform Workers

Xin Changze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ing of platformiz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ounty urbanization, county platform workers are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daily situations such as geosociety and family lif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adheres to the technical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deprivation, and ignores the subjective practice of workers and the embedded daily life world. Therefore, the article takes livelihood labor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ivelihood", revealing that platform labor is not a purely economic or technical activity, but a livelihood practice aimed at realizing family reprodu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ack of livelihood resources in counties and the opportunity of platform sinking constitutes the social basis for digital livelihood changes. Through the two-way embedding of families and platforms, workers form complex platform cognitive strategies while improving their family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shape workers' choices and plans for platforms. "Digital livelihood" uses "home" as a method to expand the "imagination of platform research", which advocates that future labor governance needs to face up to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family, and move from "protecting individual workers" to "consolidating family risk resistance units", in order to build a family-friendly platform policy.
Keywords: platform labor; county urbanization; digital livelihood; household reproduction
Author: Xin Changze, College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上接第 72 页）

"Entanglement within Rupture":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ecarity of Human-AI Emotion

Song Siru, Hong Jiewen, Chang Jingyi

Abstract: In human-AI interaction, the occurrence of empathy is often questioned as a perceptual illusion or emotional simulation, implying the inherent precarity of human-AI emotions. Through online observation and textu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ecarity of human-AI emotions from four dimensions: object, experience, relationship, and atmosphere. It also reveals how "precarity" serves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human-AI emotions and affirms it as an emotional game co-created by humans and AI. The findings are thos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sers' role cultivation and AI's "improvisational performances" serve as potential precarious factors. In contexts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AI breakdowns, users perceive AI's inherent technological flaws and violations of intimacy, resulting in "ruptured" emotional experiences. When perceiving precarity, users attempt self-compromise and AI preservation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blame-shifting, debugging, or emotional redirection, forming an "entangled" emo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AI. Nevertheless, users are inevitably "drawn into" an unpredictable and uncontrollable emotional atmosphere, ultimately being leaded to different outcomes such as acceptance, disillusionment, or self-determined adaptation, which highlights the fluidity and tension of human-AI emotional interactions.
Keywords: human-AI emotion;human-AI empathy; precarity; ruptured experience
Authors: Song Sir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Hong Jiewe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edia Developm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Chang Jingy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VidChina 12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China Internet Audio & Video Convention 2025

SICC 四川国际传播中心 SICHU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INSPIRATION

Panda Guide

灵感中国

国际传播创作者计划发布会

"INSPIR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reators Program Global Launch

百川出海 亿级流量

- 发布“灵感中国”全球拍客孵化计划
- 发布国潮 IP 国际传播共创计划
- 发布“全球民调inbiz”教学工坊计划
- “纵目云”国际传播智能技术平台升级迭代
- “三星堆 –金沙”中华文化国际推广平台升级迭代
- 上线“PandaGuide熊猫指南”入境游传播+服务平台
- 启动“闹海（Now high）”国际传播红人汇
- 上线“四川好物”推广平台

四川国际传播中心，写入四川省“十四五”规划的省级国际传播中心，2022 年 3 月挂牌成立，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运营，拥有 1个“灵感中国”国际传播视频平台、1个“熊猫指南”外籍人士一站式资讯服务平台、3个国际传播网站、百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1个“纵目云”国际传播智能技术平台、2份国际传播期刊，覆盖海外用户超过2400万。

天府融媒联合体
TFMCC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之技术赋能

2025天府融媒大讲堂

2025年4月22日 | 四川·成都

指导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新传媒集团、中国广电四川公司
承办单位：天府融媒（四川）科技有限公司、《新闻界》